

青年叢書  
第一一集

# 革命的四大主潮

第一種

馬鴻綱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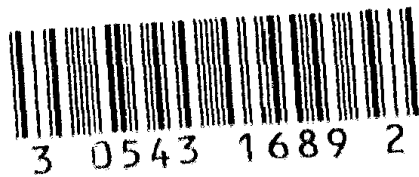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571.  
794

集 二 第 書 叢 年 青

種 一 第

潮 主 大 四 的 命 革



A 233399



## 原序

一切的人都是願意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即在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都跳不出這享樂的範圍。至一般仁人君子，不但歡迎他們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且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們，使他們能達到那享受的目的。原來一人的心，即千萬人的心，這樣的享樂心理，在我們之中可以說是無人無之。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怎樣才能使我們得到那最高的物質享受。

在過去二年中，我曾到各處講演，所遇到的一般聽衆，都是優秀分子。但他們對於現狀都表示不滿，且覺得別的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改進方面，都較美國爲佳。美國的經濟恐慌和生活上的困難，使一般民衆發生了以下兩個問題：（一）我們要到何處去呢？（二）我們將怎樣去作呢？

有的團體告訴我們說，美國應當走向社會主義。有的團體告訴我們說，美國應當採用蘇維埃制度。也有的團體認爲美國早應當實行法西斯獨裁制。這樣的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使一般人很感恐慌，不知怎樣是好。他們都很懇切地願意知道，在這樣的世界經濟恐慌之下，除美國以外，別的國家是否已找到解決的方案。有很多的人都急切地詢問，美國對於在德國、蘇俄和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到底有什麼可以效法之處。本書著作的用意，就是要敘述斯大林、莫索里尼、希特勒和羅斯福到底在那裏作些什麼，他們各人的目的、原則、方法和結果到底有何異同之處。本書不過是一個大綱，讀者欲知其詳，應細讀各參考書。又本書

的內容注重描寫和解釋，不用辯論和判斷。

本書所討論的題目，多半限於：（一）緣起與目的，（二）權能與政黨，（三）經濟學說與組織，（四）勞工問題，（五）農業，（六）教育，（七）家庭，（八）婦女與青年，（九）社會利益與保護，（十）宗教，（十一）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十二）國際關係。

第四篇是述說美國的經濟復興，以及與共產黨、法西斯黨、國社黨的根本不同之處；經濟復興與革命的異同之點；而最後則論到我們應當向別國效法的是什麼。我們盼望本書不但能滿足一般人的知識慾，更能對於人們的實行有所裨益。

本書的讀者應當注意以下的問題：（一）對於營業的競爭，盈餘的分配，物價的規定，以及政府的營業，管理和統制到底要走到什麼程度呢？（二）我們將採用工人組織，集體合同，合理生活的薪金制度，婦女與兒童的保護法，以及工業的民主政策，和社會的保險制度嗎？（三）工業，農業，商業，財政，以及職業對於國民的經濟應如何分配呢？（四）在我們的國外貿易政策中，我們對於關稅，外交，和軍備等應如何處理呢？（五）我們的生活將何所歸依呢？將歸依我們自己嗎？大多數嗎？武裝的少數嗎？官僚政治嗎？獨裁者嗎？

按照美國的國民性而論，似乎應當走向集體安全的社會政策。即一般急進的分子，也認為這是唯一的途徑。雖有少數領袖口擊時艱，振臂而呼，跑到了羣衆之前；然曾幾何時，又被那羣衆拉回來了。所以美國民衆必須自己選擇其所應當走的道路。讀者把本書讀完以後，就會看到兩個問題，要自己去解決：（一）我

應當只顧自己的利益呢？還是應當只顧我的階級的利益呢？還是應當只顧我的國家的利益呢？還是應當把全世界的利益都兼顧到？（二）我將在別人的指導之下走向改進的路呢？還是應當在別人的武力壓迫之下不得不向前走呢？

達凡波爾特 (Frederick M. Danvenport) 曾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向美國的商會演講，並引證了一百年前阿姆茲 (Fisher Ames) 的話說：『專制政體就好像一條商船，在旗幟飄揚之下，得意揚揚地駛出去，但未幾即觸礁而沉了。民主政體就好像一個小筏，你的腳雖然時常立在水中，但却永遠不會沉沒的。』

本書在著作時，因搜集材料，費了不少時間。但引證材料最多的，要算以下的幾部書：（一）Leninism, By Stalin (11) Through Fascism to World Power by Munro (11) My Battle, by Hitler 最後，我應當向我的秘書和我的摯友肯納 (S. M. Keenly) 致謝，他們實在給了我不少的幫助。

——著者——

# 目次

原序

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蘇聯

第二章 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

第三章 國社主義的德意志

第四章 經濟復興的美利堅

— 四三 —

— 九三 —

— 五一 —

## 第一章 共產主義的蘇聯

### 俄皇的繼任者

俄國的帝制因爲絕少顧及一般平民的幸福，以致爲革命所摧毀。舊的制度既漸漸失其效用，於是衆散親離，國基也就日趨於不鞏固。加以世界大戰的壓迫，這早已衰弱的政體，只好沉淪於滅亡了。

政黨漸興，而暗中破毀的工作業已進行了數十年之久。以人數衆多而佔優勢的，要算左右兩派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黨員。他們的領袖多半是知識階級的分。他們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得到最大多數民衆的擁護。而其他的施政方針，是含有溫和的社會主義性的。他們於一九一八年不順利的立憲議會會員競選中，大獲勝利；這是證明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他們是創立臨時政府的主要人物，那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間才推翻俄皇而正式成立。在他們獲得政權之後，他們仍繼續以前的政策去參加歐戰。這忠於協約國參戰的結果，雖未立刻招來該政府滅亡之禍，但也適足以促成一九一七年十月（舊曆）他們的政府的傾覆。從此這革命的領導權就落到布爾什維克的手中了。

除了在農民中活動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外，同時還有規模較小的工人社會民主黨，正在工區中領導着工人革命。他們的口號是：「工廠歸工人。」

參加這種工作，實在是危險的事業。他們和在農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黨員們是一樣的受盡了鞭笞，禁錮，充軍和處死的刑罰。這些刑罰就是他們見義勇為的報酬。被放逐到倫敦的政治犯，在一九〇三年的會議席上，因受了尼古來烏里亞諾夫（Nicolai Danov）（列寧）的壓迫，這工黨就分成兩派。這兩派政黨習慣的名稱，就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他們都是立在反對君主專制和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陣線上，但他們的方法却是不同。布爾什維克的黨員們在列寧的指導之下，主張團體貴精不貴多，要受比軍隊還要嚴格的訓練。他們對於民主黨的一切方策，不但認為無益，而且加以蔑視。他們煽動民衆，用武力攫取政權，摧毀政府現有的一切機構，並創設完全由勞農獨裁的政體，藉以貫徹他們的嚴格的主張。這一主張是他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得到政權後，所始終堅持到底的。

在尼古拉第二（Nicholas II）傾覆之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左派和布爾什維克聯合起來，而與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右派及孟什維克相牴觸。那立憲民主黨黨員，多係俄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革命政策，只限於政治改革方面。他們在第一次的臨時政府中，努力與布爾什維克為難。

列寧極明瞭俄國民衆心理的，而他的戰略更足以先發制人。這足使他的敵黨窮於應付。他的黨綱是適合當時一般民衆的心理。俄國的農民們從來就不知道歐戰為何物；他們只看見他們那親愛的兒子，被兵車一車一車的載去了。他們的牛馬被軍隊逼迫得賣掉了。那些參戰的軍隊已傷亡殆盡。而前線的新兵非但未受訓練，且器械不良，以之與敵軍作戰，不過自討死亡罷了。列寧瞻前顧後，遂立刻應許民衆以『



和平麵包和土地』這樣的政策，實足以置其敵黨於死地。

俄國的農民久已垂涎於土地。在革命之際，政治的領袖們告訴他們：革命成功之時，就是他們分得田地之日。等到革命業已成功，而臨時政府已告成立，但那些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袖們却說：『等待着，你們一定會得到田地，不過，必須先由我們制定憲法，組成議會，再對於土地問題施以立法手續後，才能按次分配。』而列寧却說：『這還是一套老的應許，他們是特意來愚弄你們的。田地即在目前，你們就拿去好了。』如農民一得到田地，他們就大權在手，至於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問題了。於是列寧同過激派的人們就不顧一切，努力衝去。那溫和派，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雖然努力前進，去維持殘局，但大事已去，成功殊少。自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至十月，俄國的社會就從此瓦解了。於是那列寧的『一切大權均歸蘇維埃議會』的要求，就得以實現。（蘇維埃議會即農、工、兵的代表大會。）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就用這種戰略攫得大權，所以他們就稱為共產主義者。

我們要知道共產黨的這種舉動，並不是盲目的，無意義的，只以破壞社會為主旨的。他們有整個的人生哲學和人類社會組織。他們有他們一定的和精詳的推進技術。他們是十二分的真誠，要使那一切民眾在生活中得到較好的機會，而他們的初步的戰略是從工人方面着手的。他們為他們的主張而拚命，為實現這主張而不惜任何的犧牲。其實他們整個的戰略，一言以蔽之，就是鬥爭。他們所主張的鬥爭，既不是舌戰，也不是筆戰，乃是槍戰與屠殺。

「階級鬥爭的起源，是由於勞農和資產階級的利害衝突。他們二者間的利害之不能調和，正如同豺狼和綿羊之不能並立一樣。」

「無論資產階級是如何的狡滑，工人們早晚必和這統治階級發生劇烈的衝突。工人們要把他們打倒，把他們強盜式的政府毀滅，而爲自己去另創造新的制度，這新制度就是工人的共產制度。」

資產階級就是共產者的豺狼，而凡支配一切貨物的生產和分配的人們都是資產者。凡工廠裏的男工、女工人以及一切手工工人，都是勞動者；凡勞動者都是羊。那些律師們、新聞記者、教育家、和牧師們，都是資本社會中的人，應當列在資產階級中。至於那些小康的農民，也在被反對之列。其餘的人們，就暫且置之不理；因爲在革命初創之秋，不要使他們參加敵對的戰線。還有那些小資產階級——店主、作小事的人和玩手藝的人——都被視爲「烏合之衆」。他們認爲這些人是附屬在大資產階級中，他們爲謀自己的利益起見，決不敢對於統治者加以反抗。

蘇俄的共產黨與世界各國的工黨不同，他們拒絕和一切業已成立的民主政體合作。他們認爲這種國會制的政府，很容易爲資產階級所統制；且從他們的經驗看來，這事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於是政府就不能持其公正的態度，對於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利害衝突加以評判，而完全變成榨取階級的工具了。所以決志奮鬥的工人們之進攻的第一步，就是要打倒一切掌權的政府，非把政權完全放在勞工的手中不可。

列寧告訴他的政黨說：「不可一仍舊慣，非要把一切舊有的政府機構打碎不可。」直至牆基上連一塊石頭也無所存留而後已。」斯大林（Stalin）在他的列寧主義（Leninism）（註二）一書中，曾詳述他的原則說：

「資產階級的革命，只是把舊的權取者打倒，而使新的權取者上臺；究其內容，不過以暴易暴耳。但無產階級的革命，却是把一切權取階級完全推翻，而使一切工人的領袖，一切被權取者的領袖，和一切無產階級的領袖，握得政權。所以，除將舊的政府機構完全毀壞，而易之以新的組織外，就沒有其他的善法。這就是共產黨在蘇俄的成功。」

## 大權之所在

共產的國家就是一座金字塔，建築在以職業為單位的地方蘇維埃會議上。選舉人不可不居處計，而以工作地點為標準。無論男女，一到十八歲，即有選舉權。凡共產認為不及格和有危險性的階級，都取消其選舉權利。茲將一九三四年前被取消選舉權的階級列下：一切私自營商的人，雇用別人而藉以漁利的雇主們，尚未打倒的敵人階級，牧師及其他的宗教工作人員，因罪而被褫奪公權者，和有精神病的人。那些反對集體農場的農民，以後也被取消了選舉權。最近他們有一種議案通過，即那些被褫奪選舉權的人，如在過去五年中曾作過於社會有益的工作，就可恢復他們的公權。

那高等蘇維埃議會議員，由地方的選民所選出。那最高議會的議員，是由高等蘇維埃議會所選出。這大權就像金字塔一樣，一層一層的建築起來。那最底的一級，就是共產黨以外的民衆。他們雖然在國內佔了最大多數，但因共產黨的勢力業已構成，他們的地位就無關輕重了。

無論在什麼事上，佔少數的政黨皆統治一切，與佔多數的政黨毫無區別。這小小的政黨，是凡事都對，永不會作錯的。他們任性處理，而隨意主持。無論別人信服與否，必須加以贊同。從地方的蘇維埃議會，直至全國的聯合議會，一切政治團體都是肆意武斷。他們甚至連解釋都不加分說。他們如同執行機關的橡皮印章，一任他們的指揮，而唯命是聽。這些執行機關都是由政黨嚴格選出，而一手包辦的。凡事都由政黨獨斷獨行。於是這『勞農獨裁制』業已構成，並把它『當作槓杆，去推翻舊的經濟制度，而易之以新的組織。』

（註二）

當共黨攫得俄國政權時，它的黨員共約十萬人。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皇勢力傾覆之時，共黨的黨員從隱密之處，從西伯利亞的充軍區域以及世界各方，出而正式作政治的活動。那位崇信自由主義的克倫斯克（Kerensky），想去實驗他那政治自由的主張，就名其國為自由的俄國。他對於一切的政黨都不分此

註一：在紐約的國際出版公司出版。第二十一頁。

註二：列寧主義第二十頁。

疆彼界；直至臨時政府業已被共黨暗中破壞，想再起而謀補救時，其大勢已去矣。在歐戰的時期，德國爲要擾亂他的敵國，它就爲列寧預備了一輛火車，使他得安全的往來於瑞士和俄國的邊界上，而自由作政治的活動。久已隱藏在紐約的特維斯基（Trotsky）也應時而出。他就聯絡他的同志，努力去作煽動軍隊，工廠，和民衆的工作。那政府中之毫無經驗的溫和派人物，處此風雨飄搖之際，實無立足之餘地。臨時政府的內閣束手無策，只有坐以待斃而已。那時的共黨人員，業已增加到二百餘萬。再要加入就十二分難，而退出却極其容易。每次的清黨，都有數萬人清出。

在蘇俄是不准有第二黨的存在。每隔二三年共產黨舉行會議一次。這會議的期間只有數日之久。在這會議中，他們舉出一個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約七十人左右，此外還有少數的候補者。他們把全權都交托給這個委員會。在這中央委員會中，又成立了一個政治部，約有十個部員和幾個候補者。這個小小內部的組織，就是蘇俄全國的咽喉。它有全權去支配那在蘇維埃統治下的一萬六千八百萬民衆，而這些民衆是佔了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

共黨的黨員尚不及蘇俄全國人數的百分之二，但能控制全國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民衆，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究其原因，就因民衆缺乏活動能力，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且又毫無政治經驗，只知無條件的服從。他們散居各處，而無聯絡。他們藉以來往的一切交通機關——鐵道、汽車道、郵局、電報、電話、航空、無線電、和出版——都在共黨的手中，加以偵探制度組織的嚴密，連私人的家庭秘密都不能保守。這種

偵探組織，是在政府的政治警察（O.C.P.D.）指導之下。他們的偵探普遍全國。其技術之精巧，與心術之殘忍，實出乎人類思想之外，久已使其反對的人喪膽亡魂。但在現在，不經過法院的審判，即自行治罪的權業已被取消了。

在共黨指導之下的民衆組織，如同天羅地網般的遍佈全國。工人聯合會有二千一百多萬會員，差不多把全國的工業團體都一網打盡了。航空、化學、與防禦聯盟中共有一千二百萬會員，在各地方都有分設的機關。以武力作後盾的無神團體，約有四百五十萬人，而分作數千組，專在各城、各鎮、各村、各家和各集體農場中，作破壞宗教的工作。青年共產團差不多有七百五十萬團員，組成了青年敢死隊，而遍佈於遠近各處。從中央直至最小的區域以及最遠的邊疆，共產黨員無在而非發號施令和監視一切。這就是以少數有組織的人，便足以控制多數的烏合之衆。

共黨之所以有控制全國的能力，全恃它那聰明而嚴密的組織。即反對者的一言一行，亦不能隱藏，而馬上就報到司令部去。反動的行爲，絕無立足之地。人民於無意識中，偶一涉及反革命行爲，都要處罰。他那最健全的組織，就是全國上下在交通與執行上的聯絡。故中央政治部命令一出，就立刻通行於全國。

弗大林在名義上雖稱爲共黨的祕書長，而實際却是蘇聯的獨裁者。他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共黨會議席上，曾作以下重要的聲明：

「任重道遠，而負責之心自必更要加增。共黨既然對於蘇俄負起全責，其成其敗，全在我們共黨身上。」

……蘇維埃議會權勢之大，不但現在普世無匹，亦為全世界空前所未有，世界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極有勢力的政黨，像是我們的政黨，像是我們的共產黨。」

斯大林曾在列寧主義一書中說：「我們的政黨實在有無上的監督權。在蘇俄各地，凡我勞農獨裁勢力所及之處，一切蘇維埃議會和民衆團體所決定的重要的政治或組織問題，非經過我們政黨的指導不可。」（註三）

政府的立法議案之通過，必須時常得到政黨的應許。遇有重要的案件，須由共黨中央委員會聯同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共佈法律，藉以施行最高的批准權。但有時共黨却不必得政府的同意，即有全權頒佈最重要的規章。黨權高於一切。政黨有全權去處理一切立法、司法、和行政諸權能。

共黨議會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授權於兩大機關，去掌管全蘇維埃議會的一切活動。斯大林呼之為「加緊監督，使議決案得完全實現。」此二機關之一，即是蘇聯的蘇維埃議會之人民代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各地地方都有它的直接代表，且在內閣的指導下進行工作。這些代表對於地方政府是獨立的。委員會的會員是由共黨議會提出，而經內閣通過。他們的責任是對於一切負責的工作人員加以監督。

其第二個機關，就是全共黨聯合會的中央委員會之掌理政黨的委員會。它是在共黨和中央委員會的指導之下進行工作。它在各地也有分設的機關，而與該地政黨不相聯屬。共產黨的祕書長曾對於這個委員會加以評論說：「那是毫無疑問的，這樣的負責組織，必須有大權在手。它既然有了大權，就可以對於

一切的負責工作人員施以監督，即中央委員會亦在其監視之下。……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必須由共黨的最高機關加以選舉和罷免。簡言之，只有共黨議會才有任免之權。」這就是說，凡在蘇聯的人民，都在它的統制之下。

### 實際的計劃經濟

共產黨經濟制度的最初宗旨，是主張凡一切生產的和分配的財產都歸國有。也就是把一切土地、礦產、森林、大工業、銀行、鐵道和航業都歸政府掌理。蘇聯的國有財產政策風行一時，甚至將城市的房屋和私人銀行的賬簿和保險箱等都加以沒收的。他們聲明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凡一切私有的財產制度都完全剷除。

那『工廠歸工人』的實行計劃，不久就走不通了。它使一切工廠的產額大見降落，差不多一切的人們都要絕食了。列寧目擊心傷，就於一九二一年馬上改換了新經濟政策（NEP）。他的意思是，因為事實的需要，不得不暫改方策，去維持城市中民衆的飲食。待時機成熟，立即實現進一步的經濟政策。

於是這新經濟政策，就准許私人去經營貿易和設立小工場。而那最重要的是，許可農民們得自由在市場上出賣其出產品。於是那城市中的生活就漸行恢復。但在此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求私人營業的安全，



是不可得的事情。市場上的信用日益減少，而致人於死命的重稅，又加到一切私人的營業上。因此就使私人的貿易日減，而政府的營業日增。於是在政府統治下的合作社就遍佈各處了。他們用各種方法去逼迫農民不得不放棄自由貿易，而走上徵糧制度。

蘇俄的五年計劃是在一九二七年開始的。這五年計劃的宗旨，分爲幾項。然其最要的，不外乎要藉這計劃，而達到完全的集產經濟制度。他們認爲這五年的計劃，是可以使全蘇維埃民衆都把他們的生產能力集中在社會統治之下；而再把他們所生產的，按照着各人的需要分給各人。列寧的最後目標是：『一切的公民都作了政府的雇工。』他們相信，要想實現這目標，非一日之工所能完成。

他們這五年計劃之最大的努力，是要使全國工業化。政府努力於大規模的營業之建設，要設法增加鐵、炭、油、電力、化學、紡織品、各種的機器、食物、和一切國民生存的需要品之生產量。他們的最高目標，並不只是去建設工業和恢復昔日的設備，也是要在這計劃的時期內努力生產。

這五年的計劃，後來改成了四年零三個月。在這四年零三個月，建設的計劃逐步推進，而預定的貨物生產量也繼續的生產。他們預定的金屬、炭、和運輸的產量雖沒有達到，而油、木料、以及其他的生產量却超過了預定的計劃。他們的建設成績表，實在是能使人注意的。其成績之最佳者，爲聶伯（Donbas）地方的電力火車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道，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莫斯科，高爾基（Gorki）和車里雅濱斯克（Cheljabinsk）的四大自動機廠，在馬格尼高爾克（Magnitogorsk）和古斯諾（Kuznetsov）

（F）地方的鋼鐵製造廠，與現今正在建造的莫斯科地道，該地道按最初所計劃的，為八十三零十分之三啓羅米突。

在一九三三年黨務大會上，他們提出了一個生產比較表來。這表是用蘇俄自一九二九年生產量的進步，去對照美、英、德、法諸國的生產量的退步。從這表中我們就可看出蘇俄於歐戰後的生產數量，實有驚人的進步。

工業生產量數表，以歐戰前的百分數為準。

紀元	一九一三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蘇俄	一〇〇	一九四・三	二五二・一	三二四・七
美國	一〇〇	一七〇・二	一三七・三	一一五・九
英國	一〇〇	九九・一	九一・五	八三・〇
德國	一〇〇	一一三・〇	九九・八	八一・〇
法國	一〇〇	一三九・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紀元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蘇俄	三五九・〇	三九一・九		
美國	九一・四	一一〇・二		

英國 八二·五 八五·二

德國 六七·六 七五·四

法國 九六·一 一〇七·六

蘇俄在工業方面缺乏經驗與訓練，而管理人、工程師和機器都不充足。今工業之進展忽而一日千里，實不免操之過急，其結果是出產品的質料欠佳，而生產費用過多。這實在不得不嘆為美中的不足。有數百萬工人，從沒有受過技術上的訓練，忽然把他們從三代而上的社會中拉到新式的工廠裏，欲求其成績之佳，不亦難乎！

但這樣應用機器生產而在蘇俄發生的困難問題，不久就可以解決了。那裏已有很多的人業已開始受訓練。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中，女工人之在夜校內讀書的人數增加了九倍，在工廠中的學徒增加了五倍。技師與工程師之在蘇聯高等學校畢業的，已有五十八萬之多，差不多比前增加了三倍。

其費用高而物質劣之最大的問題，還是由於管理不良所致。茲引下文以詳述之：「數百工廠的最大缺點，都是由於計劃與組織之不良所致。因此就徒費光陰，以致大受損失……其最困難的問題，就是俄國原先的工人對於工作，自始至終都由一人負責。但現在的工廠，却與以前大不相同。現在已有很多新的設備，新的計劃，新的機器，和新的原料，管理的人不但不知道新舊二者的不同，而且也不願去學習研究，這實在是一個難問題……」（註四）

工人的薪金制度，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已經過了不少的改革。那無經驗的共產主義在初次實施時，是主張取消一切的薪金制度的。但後來改用「口糧」制，就按照紅軍、工人、書記等階級加以增減。他們發給口糧的多少，並不以各人的生產能力而定，而是有他們所規定的數量，因此就有很多人覺得不夠用。這種分配不當的制度，使生產力大為降落，而只施行了四年的功夫，就置城市於萬劫不復之地了。於是他們就不得不施行新經濟政策，而把薪金制度的基礎改成了一律平等。

但這種薪金一律平等的辦法，依然是失敗的。那五年計劃，即受了它很大的影響。在一九三一年六月，斯大林曾在一個經濟工作人員大會中，對於這薪金平等的制度大肆攻擊說：「這種制度適足以使笨拙的工人，沒有向前努力的心思。他們一點也沒有昇遷和上進的必要。這種制度的結果，可以說是使工人們看他們自己就是管夏令營的人。今天在此地賺了很少的一點錢，明天又不知游蕩到什麼地方去了。」而現在的薪金制度並不一律平等的。例如在克爾高（Kharkov）地方的電力廠，根據他們經理的報告，司機者的薪金從一百五十盧布起至五百盧布止。這足證明因技能的不同，而薪金就大有區別了。

## 工人的訓練

註四：(1)工業化刊物(For Industrialization)九月六日。

(11) Pravda 九月三日至六日，一九三三年。

自一九一七年起，工人薪金制度的改變，不過是蘇聯整個工人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在名義上，共產黨的大權雖以工人選舉區為基礎，但實際的說起來，那些胼手胝足的勞工不過是傀儡而已。共產黨的創造者都是知識階級的人。馬克斯是位哲學家，大倡其學說於十九世紀的中葉。列寧是俄國的智慧人，從事其事業於二十世紀之初。工人們在共產黨的戰略下，不過是唯命是聽，根本就沒有獨立作戰的能力，我們這樣的說，並不是過甚其詞，凡對於工人表同情的人，無不加以贊同。

共產黨的根本學說和實施，就是要將工人完全約束在少數人的統治與指導之下，工人本身完全沒有自動的權能。斯大林對於這種理論，曾在列寧主義一書中發揮詳盡：「工人階級如無革命政黨加以指導，就如軍隊失掉了將領一樣。我們的政黨就是勞農軍隊的戰時委員會。」「政黨要統一，不可有任何派別和勢力的分歧。」而列寧也曾說：「現在我們已成了有組織的政黨，而團結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使政黨下級的組織去服從高級的組織。」

共產黨將俄國的工人加以組織和指導，而這些工人就造成了民衆的力量，使共產黨於一九一七年得登上舞臺，且幫助它從容渡過了那多事之秋。自從那「工廠歸工人」的理想實驗歸於失敗，政治的要人們一時頗感棘手。他們迫於必須增加生產的需要，就不得不把工廠的管理權從工廠委員會的手中撤回。其實這工廠委員會也是由政黨所委派的。

共產黨統治工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一切的工人聯合會都歸到政黨的管理之下。於是那工人聯合會中

的孟什維克分子，就全體總動員與共黨相牴觸。但至終是孟什維克分子失敗，有很多的人都被放逐到遠方去了。於是政黨與工人們就着手去試驗他們的計劃，而工廠中的工人訓練也就着手進行了。改良的工作，並非一日之功所能完成。其成功之期不知尚須經過幾多時日。工廠的管理權，就交到了工人的工廠委員會，工廠中的黨務委員會和經理部三方面負責管理。那以前曾握大權的工人委員會，現在只不過有協商之權而已。黨務委員會會在一個時期內獨攬一切管理之權。

嗣後因為五年計劃急待推行，經理部的管理權益須增大，而政黨的統治工廠之權，就直接屬於中央了。他們對於工人的管理和紀律愈加嚴緊。他們為每個工人規定了一種至低限度的生產數量。如工人的生產數量不到預定的標準時，就得按照其比例數而減其薪金。如這種失敗是由於他個人的錯誤，那他所受的刑罰就毫無限制了。如果這種過失與他個人無關，他的薪金就至多不能減過三分之一。這與昔日在資本主義下的工廠相比，還要嚴格得多了。

然而他們對於工人施行這樣嚴格的紀律，並不是他們對於工人的利益漠不關心，而任意摧殘。無論何處的工人，共黨依然加以優待的。共黨的勢力本來就是建築在工人的身上，工人的入黨是最容易的。在軍隊中和一切國防的團體內，他們最依靠的是工人。工人的子弟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優先機會。工人對於薪金的制度和工作的情形，也都有相當的影響。工人聯合會和人民勞工委員會並合成了一個政府行政的單位。

工人聯合會對於工人的社會、教育、文化和娛樂各方面的生活，都施以不少的服務。在地上的工作時間，每日以七小時為準。而在地下的每日工作時間，尚不到七時。在假期中，依然發給薪金。至假期的長短，則按其工作的性質而定。凡受傷或生病的工人，都可免費在醫院中療養。這樣的制度，工人自然要承認是與他們有利益的。無論遇到國內或國外的攻擊，他們必須努力保衛這種組織。

城市中的住宅，一時頗感不足。新屋雖然日見增多，而工人區域雖也大見改良，但城內居民陡增，以致人數過多，而房屋不夠分配。民衆之所以羣集於大城市的原由，是因為受了工業發達的影響。在城市中的生活，自然較諸鄉間的集體農場容易得多了。工人在宿舍方面所享的特權，就是住那些新建的房屋。新房自然比舊屋好。工人們如住舊屋時，也選擇那最好的去住。這華麗的舊屋，本是資本家、大地主和有高等職業的人所居住，現在都讓給工人們去住了。有時他們也同工人們一起住在裏面，結果就時常有三五家擁擠在一處住房之中。有一位很著名的高等職業紳士，原先曾發過財，在他的住宅中就有十家人家搬進去住。他本人雖然無權獨佔其住宅，但他却能和這十家人共同住在一起。

工人的生活較前大見改進，這自然與五年計劃的經費問題大為不利。根據政府的報告，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所支出的資本，共有六百萬萬盧布之多。這樣的鉅款是由何而來，那不是借自外債，因為直至一九三四年終，蘇俄的外債一共還不到二萬萬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元之多。也不是由於內地的投資，因為一切都收歸國有，私人無投資的可能；更不是由於國外貿易的盈餘，因為自從蘇維埃統治俄國以來，國

外貿易根本就入不敷出，尚須賠款，何能提款充作經費。

它那唯一的經費的來源，就是由於人民的薪金收入。借用民衆的薪金，也是這經費來源的一部分。經濟生活刊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曾刊登說：『蘇俄經費的制度之最驚人的成功，就是由於他能使全國民衆的經費認勳員。』這『民衆』二字，是指着工人，雇工，和集體農場裏的農民說的。他們對於國內的出產品加十分之一的盈餘稅，而這十分之一的盈餘稅早已按數繳納了。他們新興的實業，多借舊有的生產盈餘作資本。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他們國內的公債票總數已達一百四十萬萬盧布之多。

重稅至終是歸到消費者的身上，而使他們的生活程度降低，以致蘇俄全國的人口都發生了嚴重的問題。他們的預算表上，很多這樣的標語：『要在工業上加重稅。』『促進政府的收入。』『加重壓迫在都市和鄉村中的資產分子。』『課麥酒以重稅。』他們這種完全的經濟統制政策，便作了他們全國經濟計劃的柱石。

他們除限制『口糧』制度以外，還有一種加倍價格的辦法。在這兩種混合辦法下，政府得到了不少的收入。每位雇工，每月都收到一本賬簿。在這賬簿中記載着本工人所限定的食糧和貨物，這些限定的東西，他可以到指定的官立低價店或合作社中去買。該店即在他的賬簿上記明，他所買的一切貨物數目，不得超過所限定的『口糧』的量數。

這『口糧』限定的數目，是以一個人的最低的生活程度為標準。而這最低的生活程度，以能使他負



起一天的工作爲原則。他所得的薪金，如超過了限定的「口糧」的價值，便要設法收歸國有。他們把收歸國有的一部分，再藉着政府的社會保護制度和工人幸福機關，從新分給工人。

機巧工人的薪金是時常在中人以上。他那限定的口糧，自可至官立的低價貨店中去買；而他那餘剩的金錢就只能夠到官立的高價貨店中去購買東西。在高價的貨店中，那是毫無限制，只要願主有錢，就可隨意去買。但價碼却非常高。例如一塊黃油，若是在低價貨店中買，也不過價值五角錢；而在高價貨店中買，則非三五元錢不可。這樣的巧妙方法，實在是蘇俄的新發明。設若民衆不願意在這最底的生活綫上掙扎，那就只有用高價買貨物，而使政府從中漁利。這樣的制度，如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榨取民衆」。但在蘇俄的共產黨就告訴工人說，他們是特意「建造一個工人們的新的集體社會」。

這一種最低的生活，和政府從中漁利的制度，其大意是在節省國內的消費，而將餘剩貨物運輸到外國，藉以換得建設工業和農業的主要原料。有大量的食物原料，從國內市場提出運到外國，去交換國外的貨物。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的一份真理報上曾報告說，莫斯科每日需要一萬四千罐牛奶，而所收到的只有五千五百罐；每日竟有數百噸用牛奶製成的黃油運到外國去。蘇俄有大批的貨物在英國市場上傾銷，而其價格尚不及蘇俄官立低價貨店所銷出者。那時蘇俄的糖業不振，低價貨店中時常缺貨，但在一年中運往外國去的糖就增加到兩倍。

因爲振興工業，以致民衆的生活程度減低。那第一次五年計劃所得的結果就是如此。張伯倫 (W.H.)

Chamberlin) 曾用長時間詳細觀察蘇俄的經濟。他在蘇俄計劃經濟中曾說，生活程度的確是因而減低，特別在城鎮中看得出來。他們應許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就可使生產和消費的平衡恢復。

凡到蘇俄遊歷的外國人，都看得出蘇俄貨物的缺乏。在蘇俄只有塔爾森商店(Talson's)能夠使用外國貨幣。塔爾森商店的售價是和伯林、倫敦和巴黎的價目相等，而比官立的高價貨店的價碼要賤得多。這種商店的特別用意，是作外國人的買賣；大概是比其他商店的貨物更為齊全。這種商店並不很大，大概每歲的收入只能雇用兩個店員。他們貨單上所載的貨物，是很不齊全的；有的貨物價碼太高，有的貨物則一時在低價貨店中買不到。他們普通在貨單上所載的貨物是：肥皂、糖、簪、寫字桌、鉛筆、電燈泡、剪刀。但在某日即缺少了糖。

政府對於民衆的窮困頗表同情，且時常安慰他們說：「你們的生活實在是苦，但只有現在的苦才能得到將來的甜。我們一定要改進你們的生活，我們一定努力去作。當那新的工廠建設完竣，而生產豐富時，當那些農民滿意，而工作效率增進之際，你們的生活便要富裕了，到那時，一切就成了你們的了。」

他們的言語是誠懇的，他們的宗旨更遠大。他們知道，他們所盼望的結果，不是一日之功所能完成。恐即再經過十七年之久的預備，也得不到最後的結論。他們的應許，即再等一二代之久，亦恐不能實現。蘇俄領袖的蓋棺論定，就是只等着他們的最後的成功了。特羅斯基曾寫道，他們很知道「那歷史上的定律是：凡提高社會經濟的制度，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 使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共產化

共產黨的最後企圖，是在農業方面。他們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農民社會化。」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口號是：「耕者有其田；」他們應許農民，要使他們的田產加增。他們增加的方法，是把那些地主、皇室和教堂所有的田地，再分發給農民，或歸作村有。那時村有和私有的財產，已佔全國土地百分之八十二了。但共產黨的共產方式却與此大異。他們主張剷除一切私有和村有的土地制度。大地主的田地固然要收歸國有，而小農的所有權也要交給國家。農民們所有的，只是一部分動產和房屋。關乎土地收歸國有的法律條文中，並未附有任何的保留條件。茲將其條文錄下：

「土地私有權，要永遠取消。一切田地都不准買賣、出租、或讓渡。一切的土地，無論是屬於政府、以前的皇族、以前的俄皇、修道院、或教堂，都要無條件的收回。其土地所有權的獲得，無論是由於契約或承繼，都歸於無效。而一切的公田、私田、或農民之田，亦都收回。所有的田地，都要放在全體民衆的手中，而使人人都有使用與耕種之權。」

他們第一期的共產辦法，就是把每村的田地，按照着每家人數之所需而加以分配。農民們把他們一家中一歲的食糧，飼養牲畜的糧草，第二年種地的種子，以及購買其他必需品的用費，從他們每年收穫的籽粒中扣下外；其他的一切盈餘都要白白的交給政府。農民因終歲勤勞，毫無積蓄，便把工作荒廢，以致第

二年的出產，盈餘極少。至於城市的飲食亦因此缺乏，運輸到國外去的貨物也就沒有了。政府依然強迫民徵發食糧，以致暴動的行為各地均有，殺死官吏的事件亦在所不免。列寧目擊時艱，為實際需要計，不得不翻然有所改圖。

於是他就改用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加在農民身上的稅率，並不十分的嚴酷。所以農民除了納稅之外，便把餘剩的運到市場出售，而藉以自肥。於是城市的饑荒立刻解除，而麵粉、黃油、雞蛋、肉、木料，便如同長江大河般的湧入。政府自然是大不高興，因為它得不到大批的食糧，去作軍隊和國外貿易的後盾，且更無隔宿之糧以備不時之需。政治亦因此受了不少的創痛。但農民却日見富裕，不久即變成了很多的小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求社會主義的實現，真是難如上青天了。

於是政府就不得不用法律限定食糧的價目，並強迫農民將出產送到政府的收買處出售。但那些私商和消費者却出重價收買，與政府相競爭，並藉此得以從中漁利。政府又出於不得已，用武力去徵收食糧，各村中的暴動，又相繼而起。於是農民們又把耕種來荒廢了。政府迫於萬不得已，每當耕種時期，即出榜安民，揚言減輕徵收，以資鼓勵。但一到收穫時期，政府便盡食前言，而且變本加厲，徵收食糧。其結果是政府和農民都兩敗而俱傷。此時的共產黨如要貫徹他們的主張，非設法打開一條出路不可。

他們所用以打開一條出路的，就是那集體農場。農民的私有農場，和自由處理出產品，是完全與社會主義相矛盾的。自從蘇維埃政府在蘇俄掌權以來，即努力提倡集體農場，使農民們自動的加入；但收效極

少，於是那共黨的過急主義就不得不見諸實行了。這問題在共黨中引起了很大的辯論，而至終是武力強迫的政策大獲勝利。

蘇俄農村的舊制，是把農場劃作長條。這實在是太不經濟了。它昔日的土地村有制度，是把周圍數英里之地劃歸村有。因土地的肥瘦不均，為使其平均起見，不得不把每家農民所耕種之地劃作極窄極長之條，而中間以茅草地作界，以致地多荒廢。集體農場有鑑及此，便廢除了一切阡陌，而使全村土地合併，成一個經濟單位的農場。且不止一個農村，也常把數個村莊合而為一。他們合資去購買一切牲畜和機器。按集體農場的規定，每家農民本來可以自己養一頭牛。但因那組織集體農場的人過於熱心了，以致不僅把他們的牛歸作公有，即連他們的羊、豬、雞等也不給他們存留。於是全國的農民大起恐慌，復繼之以憤怒，便把他們的牲畜都屠殺了充作食物。

這次的用武力去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引起了一場出乎意料之外的風波。雙方所死傷的人數，約有數千之多。而集體運動的進步，亦非常之速。在一九三〇年的四月，斯大林即下令停止強迫行為；那時他認為已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

因為他們的壓力大，而其成功亦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共黨議會席上，根據政府的統計，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業已加入了集體農場，又有百分之七十三零九的田地已經作為集體之用。集體農場的辦法，實在更為經濟。政府籌備了數萬億的盧布，專作購買種地機器之用。又為集體農場中的種子和肥料設

立信用借款的辦法。他們從事訓練機器管理員，其人數共有一百九十萬之多。約有十一萬一千農業專家，專供集體農場技術指導之用。此外還有農業機器所，專作指導和組織農場服務之用。在一九三三年之末，這樣的機器所已分設了二千八百六十處。他們計劃着要增加六千，而每處就可服務幾個農場。

那些不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只有礮瘠之地可以耕種。他們得不到機器所的服務。他們沒有信用借款。他們所納的稅較集體農場為高。那些富裕的農民，因為反對集體農場的緣故，政府就把他們所有的田地完全沒收了。其沒收的財產，據斯大林統計的數目，約有四萬萬盧布之多。這一切被沒收的財產，都分發到集體農場中去，而被沒收的家庭約有一百萬。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是被政府送到北邊線的森林中去強迫服務。他們如不服務，便只有死的一條路。

在集體農場中，農民不但失掉了土地所有權，即連一切的工作行動亦都在政府的指導之下。農民是願意按每家之所需去分配報酬，但政府却要按工作的數量和內容去分配。自集體農場成立以來，出產數量雖未增加，但政府的按官定價格所收的糧，每歲已增加了二倍之多。於是政府和人民的衝突，依然有增無減。

一九三〇年是蘇俄自革命以來的最豐收之年。那年的農產品較之一九一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七。但以後的出產數量即大減，同時人口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共產黨目擊時艱，大為震怒。於是就在那些不勤勉耕種的區域，強迫徵收最高率的官糧。烏克蘭 (Ukraine) 和北高加索 (North Caucasus) 是最荒

廢的耕種區域，以致饑饉連年，人民流離失所。按照張伯倫的統計，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冬春兩季，只在烏克蘭地方，因饑荒而死的就佔全人數的百分之十。他認為這次的荒年，政府實為禍首，因為那年的政府的出口食糧，竟多至一百五十萬噸。

至政府對於怠於耕種的農民的懲罰，尚不止此。祇在北高加索地方，就有數萬農民被處以充軍之罪。政府看到了農民之難以處理，便規定無論農民們的收穫多少，每歲必須給政府以一定數量的出產品。徵收的額數既然限定，則勤儉的農民自可稍有積蓄。於是集體農場的出產量復見提高。同時一九三三年的農產收穫，又較諸一九一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按照經濟生活刊的記載，集體農場中的出產減退的大原因，是由於管理不良，費用太大，而人員過多所致。要想使集體農場成功，非對於農民加以社會主義思想的訓練不可。

自從集體農場成立以來，一切牲畜的數量大為減少，茲列表於左：

蘇聯歷年的牲畜百分數比例表

	一九一六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馬	三五·一	三四·〇	三〇·二	二六·二	一九·六	一六·六
牛	五八·九	六八·一	五二·五	四七·九	四〇·七	三八·六
羊	一一五·二	一四七·二	一〇八·八	七七·七	五二·一	五〇·六

豬 · 二〇·三 二〇·九 一三·六 一四·四 一一·六 一二·二

斯大林於一九三四年曾論到集體農場說：「我們的蘇維埃農場，由我的眼光看來，還算是沒有成功。……假使我們把政府的投資和農場的出產二者比較一下，我們就知道入不敷出了。其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由於農場的指導員沒有管理這樣大的農場的才能，以致管理不良。蘇維埃農場是太專門化了。……我們大概必須要把農場縮小，而使其不致太難管理方可。……」

### 實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訓練

蘇聯的第二步成功，就是在於教育的施行方面。用教育去培養布爾什維克主義，比一切物質的建設要收效更速，而且根基鞏固。他們全國的教育標準，可分作七級。一九三三年受教育的兒童，共有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九千人。這比在羅曼諾夫主政（Romanoff Regime）的末葉，受教育的人數只有七百四十七萬八千，多得多了。因擴展太速，以致學校的設備和教員的訓練都感不足。平均四個兒童只有一本教科書。至在較遠的地方，則一個學校中只有一本書和一個教員。

大半的學生尚未讀完第四級，而內中有百分之二十一零五業已達到中學的程度。約有百分之二的人數是在高等學校中。在高等學校的學生，於一九三三年共有四十九萬一千；而在一九二九年則只有二十八萬四千。在一九一四年的高等教育機關只有九十一處，而現在業已增加了六倍半了。至科學研究的



工作亦大見進步，現在已有八百四十處科學館的建設。

他們對於除文盲的運動也是十二分的努力。在一九一八年中，男子的文盲數為百分之二十零九，而女子的百分數則為五十五零九。但到了一九三一年，男子中之不識字的只剩了百分之三，而女子中之不識字的則僅餘百分之七零二。此外他們還在那些較為落後的莊村和工業區域中設立讀書室、俱樂部，並裝置活動電影和收音機等。這些設備雖尚未普遍全國，然其進步却極為迅速。他們不但可作為推廣教育文化之用，亦可作為宣傳政黨之利器。

外國的教育家如約翰杜威，認為蘇俄的科學教育實較昔日帝王時代進步得多了。他們的教育制度，有的地方且比外國還要好。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喬治，認為蘇俄的教育能使青年人在實際方面適應他們的生活環境。蘇俄教育的方法，是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在中學裏，他們就施行團體教育，動則大家一齊動，不准一個人單獨前進。這足以養成學生的集團生活和習慣。蘇俄對於高等學校的課程，近來亦已提高。在歐戰時的醫學是三年半畢業，現在却改為五年了。

出版事業是蘇俄教育的媒介品，內容充滿了共黨宣傳的作用。其進展之速，頗足令人注意。新聞紙於一九三三年，每日刊印三千六百五十萬份；這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三倍。差不多在每個大城中都有他們自己的出版刊物。在克爾高地方，由食料工人們刊行的報紙，就有九萬份之多。在各處都有壁報張貼出來。至書籍、小冊、雜誌等，亦復各處流行。一九二八年所刊行的書籍雜誌等，只有二十一億本，而在一九三二年

則增到三十五億，這可見其進步之速了。

出版界既完全在共黨的統治之下，因而它的言論要發生極大的效力。所以斯大林稱一切的出版物爲政黨中之『最銳利且最有力量的兵器』。每一種刊物的主筆，都由黨員充任，而在他上邊，復由政黨加以監察。一切的思想行爲，都由政黨操縱，而對於任何人或團體，都可以隨意的揚之欲其升天，抑之欲其入地。教育本來是一國的命脈，他們對於全國人民的思想，凡與共黨不利的，即完全除去，而把共黨的主義，方式和程序灌輸在他們的心中。這樣一來，就會把民衆的腦筋佔住了。

從小學一直到高等學校，都設有共產主義化的電影、收音機、和舞臺。一切的書籍都由共產黨員編輯。新馬克斯列寧百科全書成了普通常識的基礎。一切的研究工作，都不准與共產主義相反。每位學者必須對於共黨効忠。有很多的專家已被放逐，因他們的思想是與獨裁不利的。凡涉有反革命嫌疑的學者，都被監視。只有提倡共產主義的言論，才准流行於全國一萬六千八百萬的民衆中。

### 共產主義者的家庭

家庭本來是社會的基礎，但蘇俄的共產主義者却加以否認。他們看資產階級中的家庭有兩種危險：（一）保護私有財產；（二）有礙於政府的統制教育。共產主義者認爲，設若准許父母把他們傳統的思想習慣傳給兒童，那舊社會制度就永遠不會剷除，而新的建設將終無成功之一日。所以那些激烈的共產

主義者就主張凡滿了三歲的兒童，必須和他們的家庭完全脫離關係。這主張在初版的共產主義ABC中曾加以宣傳，但以後就刪去了。

他們那些新寄宿舍的建設，就是要去改組舊的家庭。在那大寄宿舍中，可容一百多家人家居住。寄宿舍中的一切住戶，有一個公共的食堂和廚房，一個公共的洗衣房，一個公共的育嬰堂和幼稚園，以及體育場。到了兒童長大，便送到學校讀書。政府用這種方法，就無須使兒童和家庭完全隔離，而得在兒童身上施以訓練了。在他們這政策的後面，尚有重要的用意。據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新聞報」刊物所載，他們努力主張：「設若兒童自出生至老死即與父母分離，而由政府撫養，其成績必較前大為進步。」至共產青年日報（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則大事吹噓說：「剷除一切資本制度的餘孽，攻毀一切個人主義的堡壘。」

凡預備加入共產黨的兒童，無論男女，一到八歲，就必須由共產黨施以紅軍先鋒的訓練。至不加入共產黨的兒童，則只能受到劣等的教育。他們共產黨的紅軍先鋒刊物曾說：「這種兒童先鋒隊的運動，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兒童組織，乃是在政黨指導下的一種兒童戰鬥團體。」兒童加入先鋒隊時，必須宣誓說：「我是青年的先鋒，我在我的同志面前宣誓。我決意擁護一切工人的利益，而與全世界的工人和農民共同奮鬥。我決意服從列寧的命令，且在紅軍先鋒的紀律下，盡了我的本分與義務。」

這種先鋒組織，不下三四百萬兒童之多。他們對於兒童的娛樂、健康和補習教育，都有相當的裨益。他

們有很好的心理學家與教育家爲之計劃一切，務要使兒童凡事負責，而勇往直前。高克伯（Goldberg）曾在婚姻權上主張說，共產黨必須把父母和兒童的家庭關係取消，因爲這樣的關係適足以養成兒童的自私心。

列寧認爲非把婦女們從家庭中釋放出來，而到社會上去工作不可，於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城市中之從事工作的女子即增加了二倍半以上，差不多有六百二十六萬三千人了。她們佔了全部工作人員的三分之一。（參閱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的提倡工業化的刊物（For industrialization））女人之擔任工作，自然會增加家庭的收入。而政府的最大用意，也是要使她們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完成了政府所預定的制度。她們的薪金並沒有什麼區別，且可以在晚上停止工作。工廠中附設着育嬰堂，母親下班時可隨時育養孩子。有多半的女子是在重工業中工作。計在炭礦中工作的，有百分之十七零六，在鐵礦中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一零五，擔任冶金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零四，在機器室中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二零九。至擔任電氣技術的，有百分之三十三。她們中間有百分之九的人是充任工程師和技術員的。她們工作的範圍很廣，有的擔任科長，有的擔任店主，而專門人材、高等程工師、科學與實驗室工作人員，以及軍隊中的領袖，亦所在多有。在一九三三年之末，她們之中有三百零五個人是充任工廠中的經理。在實業學校中，女學生的人數有五分之一。

在新時代刊物（*Smerna*）上曾有一段說：「……那些工作的婦人，原先都是家庭中的婢女。自從一

九三〇年起，莫斯科的婢女爲之一空。於是有很多廚房爐竈無人管理……一般家庭的主婦，復步婢女的後塵，但勞工介紹所還是供不應求……有些婦女因過着結婚的生活，把她們原先謀生的技能早忘到九霄雲外了；但現在也改變途徑，加入了工作。有的女子因技藝不佳，只能作些粗笨工作。總而言之，她們都一致起來，從事各種的工作。有的正在受訓練，有的重新受訓練，有的只能稱得起普通工人。從此家庭的主婦爲之一空了。」

斯大林看到在第十七次政黨議會中的報告，就認爲滿意。有六千女子，在充當集體農場的主席。有六萬女子，是農場管理部的會員。牛奶場中的女經理，有九千位之多。有七千女子在農場中開機器，有二萬八千女子是在農場中充任女工頭。至在社會服務的團體中，女子的活動力更爲顯著。

共黨中的黨員，有四分之一是女子。政黨鼓勵她們，使她們在政治上擔任工作。有數十萬女子，是充任黨政機關的工作。而女子中也有在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和國會中任代表。內有一位女子，被派爲駐某大國的公使。但尚沒有一個女子能充任內閣的閣員。至於列寧的夫人同另一位女子，則曾充任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在蘇俄的婚姻制度很不鞏固。從共產主義的立足點來看，男女同居完全是個人自己的事，與社會、國家、宗教、和鄰居無關。但這並不是說贊成亂婚制度。他們依然是主張一夫一妻制。他們提倡結婚登記的辦法。但這登記並不發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不過是認爲結婚的事實成立而已。無論男女雙方登記與否，他

們所生的子女都必須負責。他們的登記手續很簡單。新婚的夫婦一同到登記室中，在那裏只有一位年輕的女書記招待他們。他們如同領護照一樣，只在表格上回答幾個問題，便由新郎、新婦、和女書記三人共同簽名。新郎再付兩盧布的結婚費，於是結婚的大禮就告結束了。

至離婚的手續更是簡單。無論那一方面，只要不高興，便可請求離婚。離婚雖然容易，但小孩却必須扶養。設若有一個小孩，父親的薪金便須扣去三分之一。設若有一個以上的小孩，那父親的薪金就得至少扣去一半。每個離婚的案件，只須四分鐘便可審理完結。而在莫斯科，差不多在兩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離婚的。在小城中和鄉間，離婚的比例數很低，但把全國的離婚案件統計起來，尚不及美國離婚的比例數之多。

在蘇俄的墮胎並不算犯法，而以墮胎為職業的醫院，也所在多有。他們認為墮胎是一種最經濟的辦法。在一個大工廠醫院裏，有一位產科醫生曾報告說：在大城中和工業區域內，用解剖術墮胎的，每三個產婦中就有一個。以後因墮胎的結果，有礙於女子的健康，其比例數就漸漸減少了。

共產黨將來的力量之大小，全靠它的共產青年身上。在蘇俄的每一個機關中，到處都見到些活潑健壯的青年，他們都把他們的身心交託在這共產主義的運動中，而努力直前，忘記一切。但青年人最怕喪志，一看見事情不容易成功，就要灰心了。所以斯大林為鼓勵青年起見，使用最堅決的言語來告訴他們說：「我們的計劃之實現與否，完全在乎人類的努力——完全在乎我們，在乎我們是否願意苦幹，是否願意打開一條新路，和我們是否決志去實現我們的計劃。肯幹與否全在乎我們，我們有全權操縱我們的

意志力。所以我們那生產的計劃必有成功的一天，且必定能達到目的。」

### 蘇維埃最先的成功

蘇聯對於民衆生活之改革，雖然一時引起了不少的波折，但終於能證明它爲民衆利益的苦心。按照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的新聞報所記載，蘇聯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的社會幸福的預算案頗有可觀。他們所以這樣努力社會幸福的緣故，是想使民衆不靠私人的進款，而慢慢的都能依賴國家的庇蔭。茲錄其社會幸福的預算案如下：

一、恤金和養老金	一，五一四，二〇〇，〇〇〇盧布
二、醫藥補助金	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三、兒童養育金	三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四、休息室與療養院	二一五，三〇〇，〇〇〇盧布
五、殘廢養育費	五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
六、教育費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七、投資	八八四，九〇〇，〇〇〇盧布
八、勞工調查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九、行政與組織費……………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總數……………四，八七九，九〇〇，〇〇〇盧布

據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紅醫藥一書（Red Medicine，在紐約的Dunblady, Doran and Company出版），對於蘇俄的醫藥社會化的事業，調查頗詳。有兩位醫藥專家充任調查員，一位是英國人，一位是美國人。他們在該書中的摘要的一部分是：

「蘇聯……把醫師營業之自由競爭制度取消，於是就把那些卑劣的施醫之來源堵絕了。那些官費的醫院之設備極為完善。在城市之中已足夠大多數民衆之用；而現在又在鄉間推行得很快。他們這種醫藥的制度，刻已由施醫而轉到社會醫藥的預防方面來了。」

本報告認為醫藥的設備之進展雖速，但求其完全，則非十二年的經驗不為功。其最大的缺點，就是醫藥的設備，除大城而外，則極不完善。離城愈遠之處，其設備愈壞。但統觀蘇俄全國人數的死亡率，較諸革命以前却大見進步了。在蘇俄不但施醫免費，而住院亦免費。工人因病停工，照常支給薪金。但那些被共黨反對的人們，却沾不到一點的利益。

在大城市中，一切民衆的娛樂建設都相繼而起。例如平民住處、公園、公共浴場、遊戲場、競技場、電影院、戲院、和俱樂部等，是所在多有，且日見進步。而鍛鍊體格的團體不下數萬，在其數百萬會員中施以體格的鍛鍊。他們的會員，多半是工廠中的工人。在一九三三年的開始，有二十二位體育專家對於五千人施以體



育的訓練。在蘇聯的國境中，有兩千處健身房，而運動場則不下四千之多。蘇俄在學校中的體格鍛鍊，是寓有尚武的精神的。

自來水的設備，原先只限於省會中，而現在已擴展到五百三十二處城鎮中了。以前在全國的城鎮中，只有百分之十八有電燈，但現在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一了。

蘇俄在扶助母親和嬰孩的成績方面，也頗有可觀。每歲都有數萬萬盧布的撥發，專供育嬰堂、幼稚園、和兒童療養院等等之用。

### 以武力作後盾的無神論

在共黨中有兩位很佔勢力的作家，曾在共產主義 A.B.C. 中說着：『無論在學理方面，或在實際方面，共產主義和宗教都是冰炭不相容的。』然而蘇俄共產政府並未下令去取消一切禮拜堂、會堂、和清真堂等。他們要使一切的宗教團體在無形中自行消滅。他們反對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即：（一）讓那些已信的信徒去從事他們的崇拜和儀式；（二）不准對於青年人施以宗教教育；（三）在教育中要教訓一切的兒童反對宗教。

他們雖然反對一切宗教，但對於俄國的希臘教會却特別加以攻擊。美國艾迪博士曾和戰鬥無神團的執行委員長雅洛斯拉甫基（Yaroslavsky）會面。艾迪博士謂現在的宗教信徒和共產主義當有共同原

則的根據，使雙方可以諒解。但雅洛斯拉甫基却說，二者的基礎完全不同。茲將其言論撮要如下：

「我們永遠是宗教的仇敵。我們是無神派，我們是馬克斯和列寧的革命信徒。我們的武力無神主義，是絕對以我們世界革命的主義為基礎。這種無神主義，並不是隨着蘇聯環境變遷的一種附屬品，而是我們全世界革命的基本要素。」

「我們唯列寧的馬首是瞻。他認為宗教和共產主義是完全不同……所以我們對於一切的宗教都努力加以反對，並無好壞之分。且我們對於較好宗教的敵視，更要嚴格。因為列寧曾說，好宗教與壞宗教的區別，不過是像青魔鬼與紫魔鬼的顏色的不同而已。」

被放逐到極北地方的斯維登基(S. S. S. S.)的俄國主教們，於一九二六年年上書於蘇維埃政府，請其不要干涉宗教問題。主教們承認政府有全權處理政治經濟事務，並請求政府使教會能夠自由宣傳教義。茲將政府的觀點錄下：

「教會承認精神存在的原則，但共產主義却否認。教會相信有一位活的上帝，他是宇宙的創造者，他管理宇宙的生命和命運。但共產主義却不承認有一位上帝的存在。他們相信世界是自己造成的，且它的歷史之沿變，並不受任何原則和旨意的束縛。教會相信道德、正義和法則的原理是永不變的。至共產主義則認為一切的道德公義等，都是由於階級鬥爭的結果而定出來的，道德問題之是否有價值，端在乎它是否有用處。教會教人要謙卑，只有謙卑才能增進人類的靈性。而共產主義却使人完全屈服在驕傲之下……」

「教會認為宗教不只是使人上達於天的動力，也是最能增進人類關係的泉源——是世界幸福，人類快樂，和國家安全的基礎。至共產主義却認為宗教是麻醉國家的鴉片，它適足以使國家的能力消滅，而成了國窮民困的來源。教會要使宗教倡盛，而共產主義却要使宗教滅亡。教會同國家的基本原則，既如冰炭之不能相容，欲求二者之彼此調和接近，實有所不能。二者之不能妥協，正如同反正之不能並舉，是非之不能同論一樣。教會的唯一精神，教會之一切存在的事實，以及教會所主張的理論，在在都是共產主義所絕對否認的。」

共產黨對於教會和宗教團體絕對施以高壓手段，但並不給以自由競爭的機會。它把教會的一切財產收歸國有。它要用這種方法，使教會在無形之中歸於消滅。凡向未滿十九歲的青年宣道的，要處以徒刑。一切主日學校都被政府禁止。有很多的善人，只因爲在自己的家中組織宗教團體，以致被政府所放逐。一切青年男女宗教團體的活動皆爲法律所不許。他們近來對於新教徒特別注意，因爲新教徒的人數日見增加。共產黨限制他們的牧師，只能在一定的教區內工作。至一切宗教學校都被封閉，一切宣道報紙都被禁止。於是凡預備宣道人才的事工，都毫無存留。一切有才能的牧師和信徒，都非被下獄，即遭充軍。在不久的將來，必有數百萬希臘教徒、耶穌教徒、和天主教徒，失掉了牧師的牧養。他們用各種經濟的方法，對於教會施以壓迫。他們於一九三二年施行一種護照制度，不准宗教師在大城中居住。每逢舉行禮拜時，他們必須

從很遠的地方前來赴會。設若那些主教和牧師們，經過了各種經濟的壓迫，而仍不喪志時，他們便再加以重稅，處之以罰款，直至使他們灰心短氣而後已。

政府的統治教育，其目的在使後起的青年完全變成無神派。在一切學校的課本中，把神聖的名詞完全除去。他們那青年的先鋒隊，每逢排隊遊行時，便高唱道：『剷除，剷除，剷除一切的宗教師；我們要登上天宮，而把一切的神聖拋出。』他們爲灌輸兒童的無神思想起見，特別爲兒童創辦刊物和文學作品。有數千萬頁的非宗教刊物，從官立印刷所中發出。至那些宗教的團體，却没有地方去刊印他們的宣傳品。他們把舊有的聖經和宗教書籍用破之後，就得不到新的來替代了。

他們着手去訓練專家，而對於宗教下總攻擊令，其成績之佳，頗足令人驚異。茲將一九三三年六月間戰鬥無神團之中央部的報告撮要錄下：

「按照多數省縣和戰鬥無神團聯合會的各地蘇維埃組織之最後的記載，現已有五千零二十處非宗教團體在各地成立。（有一百二十五處工人非宗教團體，有二千六百七十一處集體農場團體，有一千一百七十八處學校團體，和一百四十六個紅軍團體等。）在這些團體中，曾受過非宗教教育的人，有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人。而其間曾受過各種課程和討論會的訓練的人，約有四千一百三十五人。除此而外，還有二十六處反宗教的工人大學，和一處紅軍大學。在各重要的區域，我們還有六個反宗教的高等教育機關。而反宗教的函授學校共有六科，業已教育了三千七百九十九人。」（錄自 Antireligiozhenk, No. 4, 1933）

除此而外，他們還用各種的方法，對於宗教加以攻擊。在各種紅色的集團會議中，都討論反宗教的問題。在工廠中、辦公室中、集體農場中、和機器房裏，都有無神派的組織。至各處的博物院裏，常把宗教的各種缺點和罪惡陳列出來，任人觀覽。每到宗教節期的時候，共產黨便千方百計，從中搗亂。於是有很多的禮拜堂就漸漸倒閉了。據一九三二年雅洛斯拉甫基的報告，其倒閉之數共有百分之二十，但此數恐太低了；因各教區多因為經濟的恐慌，而無法維持。據一九三〇年猶太人的報告，只在烏克蘭一處，就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的會堂關閉了。（見 Jewish Daily Bulletin, April 17, 1930）

但其結果如何，則未便一筆抹煞。宗教的真正意義，自有它永存的價值，決非由於反對即能消滅。俄國希臘教會之過於奢華，偏重儀式和迷信等等，皆為人們所共認，而今次自然受損失不少；但耶穌在俄國民衆中的真正精神，却未見受若何重大的挫折。即就戰鬥無神團的報告而論，其成敗之數目也頗有出入。按一九三三年的無神團之團員人數而論，已增至五百萬。然而他們的機關報反宗教報之銷售數目，却大為減少。該報於一九三二年發行二萬零七百五十份，而於一九三三年則減至三千五百份。按該團的統計，一九三二年之活動的教會和獨立教派的祈禱室，共有四萬六千處之多。

但無論如何，要想大量地向青年人去灌輸宗教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事。據真理報的報告，在四年前，曾在一個大工廠中向一萬二千工人作了個關乎宗教信仰的調查。雖然在表格上無須記名，而填回來的仍為數寥寥，一共只有三千人。這自然很難據以為憑。在五十歲以上的人數，有百分之三十五零一是相信宗

教的；在從四十歲到四十九歲的人數中，有百分之二十二零四；在從三十至三十九歲的人數中，有百分之十；從二十二到二十九歲，有百分之四零六；而從二十二歲以下的人，有百分之二零七。在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的蘇維埃議會，曾調查了九百一十九處的農民家庭。這些家庭是分散在三十處集體農場中。在這些家庭中，有百分之七十七的農民是藏有天主教的神像；有百分之二十三承認宗教於人有益的；有百分之三十是覺得宗教並無害處；只有百分之十八才相信宗教是有損無益的。

對於共產主義的道德觀點，也頗難加以定論。他們認為道德的立足點，並不是個人的，乃是團體的。至在他們的刑罰方面，也是以此為根據。一個殺人的囚犯，最高的徒刑不過十二年；但對國有財產的竊盜，却處以槍決。在共產黨初登舞臺之際，男女中的淫亂行為盛極一時。其結果是團體沒法維持，故不得不在兩性上取嚴格主義。彼雖名之曰「建設社會主義的兩性觀」，然究其實際，却與資產階級和宗教的舊道德觀念無異。從他們的經驗中，他們知道兩性的縱慾和不負責任，是於政黨大有不利的。他們近來又從教育方面着手，去反對一切醉酒的事。然而酒的消耗量却依然很大。

在蘇俄的不道德和犯法的行為，依然是所在多有。據報紙的登載，各處都有很多的執行槍決案件發生。因盜殺案而處以極刑的，只在司木林斯克（Сибирск）地方附近，在一次就有八位之多（一九三四年十月）。共產黨認為這一切犯罪的原因，都非由於不道德和罪惡而來。他們名之為「階級的敵人」，「社會主義國家的叛賊」，和「資本階級的餘孽」。他們認為要剷除這一切的叛賊，非根本從教育方面着

手，拔除他們對於財產之佔有性的根柢，不可他們還以為改良民衆的生活，就可以減少叛賊的引誘。

## 『工人的祖國』

以共產黨的主義而論，它是立在反對國家主義的戰線上。它主張蘇聯是國際勞工的祖國。這已經成了共黨的中心主義。他們這種主義的推行，早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恐慌和憤怒。至其詳細的內容，我們將在下章蘇維埃的外交政策中再行補敘。

自從帝俄顛覆，而蘇維埃政府繼任，俄國內部之民族的區別，不下二百餘種。例如大俄羅斯人（Great Russians），烏克蘭人（Ukrainians），白俄羅斯人（White Russians），猶太人，鞑靼人（Tatars），亞美尼亞人（Armenians），佐治亞人（Georgians）等等，為其榮榮大者，至其較小者，此處不能盡舉。列寧有見及此，欲得到全國民衆的擁護，便運用其聰明的政治手腕，而標榜出『俄國全體民族的權利宣言』來。這宣言的意義是包含着：（一）一切的民族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二）關乎國家的獨立等，民族有自決權；（三）各民族的自由發展；（四）取消一切種族的特權。

其標榜的政策雖然如此，然究其實際，則成千古的笑談。茲錄其政黨的原則如下：『共產黨不但承認民族有自決權，且甚至許可民族有退出之權。但其所謂的民族，乃係指大多數的工人而言，並不把資產階級包括在內……』（見共產主義 A.B.O. 110-116 頁）這樣一來，就把一切的政權都放在少數共產黨

員的手中。而這共產黨的大權又直接由莫斯科政治部全權操縱。至這共黨中央政治部之執政掌權的人，却不是由共產黨員選出，乃是由共黨司令部所委派。簡而言之，就是全國大權操諸一二獨裁者手中，而求其民族自決，不亦難乎？此所以當着佐治雅人請求獨立的時候，共產黨政府不但不加許可，且派大軍，用一切殘忍手段施以鎮壓。

但我們上面的言論，却不能把共黨給予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自由一筆抹煞。共黨業已准許各民族有自由使用其言語文字之權。且共產黨的中央出版所，把報紙、雜誌、和書籍等印成五十八種之多的混合文字。但除了在文化方面的自由外，所謂「民族的自決權」，即等於零。蘇聯全境的工業、商業、財政、交通、農業、勞工、郵政、電報、外交、武備、和偵探等，都由在莫斯科的蘇維埃聯合會中央機關所一手操縱。本來以施政方針之便利而言，以上的種種，應歸地方政府辦理。

但從蘇俄的國內建設方面來看，它對於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的應許，並未曾食言。它於社會化的工業建設之下，在那少數民族的境內，也有同一的發展。這實在是那些少數民族自己所無能為力的事。且共黨有見於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其文化建設的經費自不得同年而語。至比較落伍的地方，應給以較多的建設費。

蘇俄本以世界主義為標榜，但從它的生活與政策方面來看，却脫離不開國家主義的自豪，與帝國主義的狂妄。所以當着蘇俄和英國在某一案件上談判決裂時，蘇俄青年的愛國狂熱，一時簡直達於極點，使



他們把世界勞工主義早已忘記了且即以蘇俄與日本的遠東問題而論還不是把國家主義的神氣表現得十足嗎？

且蘇聯擁有在歐洲最大的軍隊。它的軍備要和它在歐洲鄰邦之兩國合起來的兵力相等。它的常備軍額爲六十萬，此外還有四十五萬，每隔二年，便正式受五個月的軍事訓練。且如遇戰爭爆發，必須全國總動員時，能夠衝鋒陷陣的戰士，當不下數百萬之多。這些軍隊的立場，多站在勞工方面，其軍官多係共產黨黨員。他們的衣食之佳，可稱爲蘇俄之冠。他們的紀律，也頗堪嘉許。他們在二年的受訓時期，除軍事以外，還加上共產主義的教育，和軍事以外的服務。其用意是要使兵士們於退伍之後，可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健將。

至其軍事的設備亦極精良。其步隊的設備，與世界列強無異。而在精良的騎兵後，復加之以機關槍和大炮。其大小坦克車於一點鐘內，即可行過五百輛之多。至於高射炮、探海燈、和描準聽音機等，都在在足以證明防空的實力。至其轟炸機和攻擊機上，復載着從天空降落的戰鬥員，乘敵人的不備而施以攻擊，更足以令人驚奇。根據蘇維埃戰事委員會的報告，紅軍是世界上最機械化的軍隊。而最近有一位法國人，從蘇俄參觀回來說，蘇聯的空军實力，要有法國的兩倍之多。這樣的戰備，在俄國尚不足爲奇，而最能令人注意者，即蘇維埃政府之假「自衛」爲名，而實行使全民衆的思想都軍事化。

蘇俄的學生從小學起，即施以軍事訓練，並逐步漸進，直至高等學校，便以訓練學生成爲軍官作目標。

了。據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的新時代刊物所載，認為「最忠實的將軍」是從大學的學生中產出。每個學生必須加入軍事訓練班。而除了普通軍訓之外，每個學生尚須有一種軍事知識的特長。那數百萬共產主義青年，除了嚴格的受軍訓以外，還須兼長航空、化學、戰爭、和軍事工程等學科。

青年的女子也是一樣的負起戰事的責任來。杜伯欽（Toberskin）是一位生在蘇俄的作家和通訊員。他在他的斯大林之梯（Stalin's Ladder）（在一九三三年紐約的 Ninton, Balch and Co. 出版）一書中，曾作了以下的記載：

「……在一九三三年，差不多有二十五萬婦女，是在軍事學校中受過軍訓。她們之中，有五萬五千人，是成了來福鎗和機關鎗的專家。另有一萬多人是對於軍用化學特別見長，而其他的女子則或精於礮術，或長於航空，種種不一。在列寧格勒有一隊著名的女子剪刀手。在莫斯科最近有大批的軍用電報電話婦女專門人才畢業。……在鄂木斯克（Omsk）地方，有一處女子射擊訓練學校，從本校畢業的學生，多分發到西伯利亞和蒙古利亞去組織婦女團體。有二十五萬女子義勇軍，是同男子們一同加入夏令營與秋日操演的訓練。直至女子受了相當的訓練後，即和男子合編成隊；而在這混合隊中的女子，數約佔百分之三十，男子人數約佔百分之七十。」

在全國的民衆中，共有六萬多處軍事組織。這種組織差不多在每個鎮中、製造廠、官立農場、大商場、和公務所裏都有。他們的會員是常常荷槍操演。在村莊中多有守望樓的建設。有很多的民衆，都參加防毒面

置的演習。在沿莫斯科河的公園中，時常看見十一二歲的小孩，而帶防毒罩，手執上了刺刀的槍，作軍事演習。一切國民，一到二十一歲，便是徵兵入伍的時期。全國民衆所受的一切訓練，都能使他們獻身行伍，作國家的干城。

蘇俄一方面加緊軍事訓練，而另一方面却派遣代表，在世界軍縮會議中提倡，各國都要在海陸空各項的軍備上減縮。至於所以加緊全國軍事訓練的原因，在下節中再行討論。

### 蘇維埃的外交政策

事實證明，蘇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很難融洽。在列寧領導下的共黨二元外交政策，根本就自相衝突。共產黨原有兩臂，第一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是共黨的政府機構，用以禦馭全蘇聯民衆的。第二就是共產國際（或第三國際）。這是共黨世界革命的工具。共產黨、蘇聯和第三國際，名稱雖然不同，而其領袖則都是一樣。此三團體的領導權，都操諸共黨少數領袖之手。

在共產黨初得到政權的時候，政府在國外的代表機關，都是努力在該國從事煽動革命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共黨專為外交代表機關在外國從事世界革命工作，而籌備了二百萬盧布。那時的列寧和共黨都相信，在大戰以後的歐洲各國，快要為世界革命所吞食了。於是他們就向世界各國大肆革命的鼓吹，而世界各國為反抗起見，便與之經濟絕交。有的國家，却正式用武力加以干涉，於是蘇俄便成了世界各國的公

敵了。

自從他們立刻使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歸於泡影後，他們就願意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言歸於好。但半路出家，談何容易，且求得各國的諒解亦非易事。第三國際和蘇俄的共黨本來是二而一的東西。所以第三國際的主席於一九二二年曾正式的報告說：『從我們共產主義的立足點上看來，第三國際之對於蘇俄的重要，自不言而喻。二者本不相上下，這是人所共知的。其彼此連帶的關係，正如屋頂之與牆基的不可分離一樣。』故世界各國對於蘇聯外交的新動向，實難驟然相信。

自從五年計劃開始，蘇俄的黨政要人便要把世界革命的企圖，暫時置之不論。他們相信，他們歐戰後的世界革命政策，不免操之過急。斯大林與特維斯基二人的分道揚鑣，即由於在此點的意見不同所致。斯大林認為應先努力國內建設，使共產主義在蘇俄根深蒂固，而後再從事世界革命的努力。這並非放棄世界革命主義，不過在程序上有先後的不同了。

蘇俄對於外國的武力干涉，時生戒心。他們知道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冰炭不能相容，且終必出於用武力解決之一途。如蘇俄不先作準備，恐有後顧之憂。於是他們就急於擴充軍備，去充實武力。在這五年計劃中的大部分，其用意是在武備。至烏拉爾（Ural）背後的重工業建設，適足以阻止歐西與遠東的強敵。此外又復與鄰國簽訂彼此不相侵犯的公約，且提議東方的羅卡諾（Locarno）非戰公約。

蘇俄怕遠東的強鄰來犯，已早有戒備。故在滿洲邊界增兵頗多。其陸軍與空軍的設備皆極精良。蘇俄

又將那些忠心的農工遷往西伯利亞，藉以鞏固前防。凡在該處的工廠都有武備。蘇俄之在遠東增兵，並無侵略的野心，不過要保持西伯利亞的安全而已。他們的標語是：「既無進佔他國領土的野心，亦無退讓尺地寸土的意思。」

蘇俄既無領土的野心，爲何不作徹底善意的表示呢？那是因爲世界各國，尙有五十多處共黨，要步蘇俄的後塵，而從事推翻政府的工作。至其一切的活動，却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指導之下。他們所努力的工，是促進各國勞工革命，去煽動組織和武裝起工人來，而實行叛變；去惡化工業的鬥爭，去分化各國的軍隊。在這種情形之下，求其徹底的善意的表示，實在有所不能。但他們實現革命的最好計劃，是要分化一切敵國的武備，而修直工人革命的道路。

蘇俄的共黨和領袖們，從未有一字的聲明，要放棄世界革命與階級鬥爭的政策。他們對於一切和平主義與和平工作，都深表厭惡。布哈林（Bukharin）曾在一九二八年的第三國際議會中，聲明和平主義完全是「腐化、頑固、虛偽、狂妄和錯誤。」嗣後，大農民公報（The Great Peasant Gazette）宣稱：「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的妓院。」但繼因遠東與德國對於蘇俄的態度日見惡化，於是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就不得不重新加以考慮，同時蘇俄就必須加入國際團體，以冀爲本國在外交上打開一條出路。

各國軍縮斷難實現。而蘇俄的擴充軍備，並不在任何國家之後。但它依然是遵循着斯大林的政策，要在經濟方面獲得勝利；直等到資本主義完全崩潰，共產制度深入勞苦的民衆中時，再談世界革命。這樣，就

可以使各國的工人同他們的政府慢慢地把宿仇舊怨一筆勾消了。

蘇俄對於世界勞工革命的最後盼望，是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但他們却不捲在戰爭的漩渦中，而只靜看那些交戰的國家勞民傷財，直至政府已財盡力疲，而人民荼毒不堪，則羣衆即不謀而合，揭竿而起了。於是各國的共黨便領導着工人，去抓到政權，建設新的蘇維埃政府。換而言之，他們最怕的，是戰禍臨在他們自己的頭上；而最慶幸的，是願意別人陷在戰爭的烈火中，而罹於萬劫不復之地。

根據共黨的基本主張，他們必須用兵力和財力，去輔助其他共產主義的政府。在蘇俄革命成功的十週年紀念日，曾有論列第三國際的言論，茲將其草稿節錄於下：

「蘇聯是世界勞工反抗資產階級的堡壘，和藉以獲得最大成功的中心。」

「凡要在其本國企圖攫取政權的勞工，蘇聯必傾其全力以相助。任何國家的勞工革命之成敗，都與蘇聯的命運發生密切的關係。」

「蘇聯如遇世界各國的農工對政府叛變的事件發生時，自必予以武力的援助。但此種援助行爲，不能當作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解釋；而當視爲一個休戚相關的勞工政府對於世界勞動階級的服務。」（本段見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Vol. 81, November 21, 1928, P. 1548）

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份的外交上，曾刊登一篇文章，標題爲：「蘇維埃外交政策的基礎。」本文係政府機關報『新聞報』的主筆拉狄克氏（Radek）所著。大意謂：「蘇聯外交之中心的問題，是在使蘇聯

保持它的安全與中立地位，而不致捲入世界大戰的漩渦中。他又堅決地發表意見說：『那已經陷到戰禍中的民衆，應當力圖解救，快快援一九一七年蘇俄勞工階級革命的舊例，而爲自己打開一條出路。』他的結論是：

『我們是十二分的相信，無論那戰爭的原因是什麼，無論那禍首是何人，那戰爭的唯一勝利者，却是領導世界工人的蘇聯。因爲只有蘇聯的旗幟才能於大戰爆發時卽一變而爲全世界民衆的旗幟。』

---

潮 主 大 四 的 命 革

---



## 第二章 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

### 爲什麼要有法西斯黨？

莫索里尼（Mussolini）的政黨，正和列寧的政黨相反，它在光天化日之下與廣衆之中得到了政權。它公開地用文字和講演向意大利的政局挑戰，而其殘酷與勇敢尤足以先發制人。法西斯主義者在大街上拿着旗幟結隊遊行，並攫得了政權。

那時意大利的政局，已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期。國家擾亂已久，愛國民衆都渴望平安，而對於老的政治領袖都失掉了信用。民主政體已破碎無餘，自由政黨已失掉了效用。國家的利益在在都遭失敗，而英雄爭霸，戰禍四起，政府更無力維持，以致社會秩序大亂。且罷工風潮與工廠倒閉相繼而起，於是工業生產量頓時減低。加以鹵莽之輩，結隊四出，深入鄉間，對於禾稼及其他的財產施以破毀。其結果是生靈塗炭，國幾不國了。

在歐戰爆發之時，莫索里尼是社會主義黨左派的一位極有力的主筆。他公開地反對意大利參加戰爭，但不數月之後，他忽然變了論調，而主張參戰。於是正統派的社會主義黨便把他開除黨籍了。他於是就一變而成國家主義者，在他的報上發表說：『設若意大利依然主張中立，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頹廢的而且』

被呪詛的國家了。這樣的國家，是既無自治能力，而又無前途可言的。若坐令那些玩手琴的人，飯店主人，和擦皮鞋者去作意大利的世界代表，則世界人類將復加我們以白眼和蔑視了。我們的國家就只好坐以待斃，未生先死了。」

意大利從事歐戰，被遣散的軍隊回到本國，就協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而肆意搶掠破壞。於是在一九一九年，恐怖主義充滿了工廠和城市。暴徒任意轟炸鐵道、旅館、和戲院。政府對於寧列的示威運動者稍加禁止，赤化分子即報之以總罷工。他們在大城中封閉商店，又在赤化的紀念日撕裂國旗。紅旗飄揚於大工廠之上。工人議會正預備步蘇俄的革命後塵。波倫亞地方的工會，甚至對於不加入赤色革命的人，拒絕一切麵包的供給。一時罷工之多，遍及於三百多城市。他們大喊着「打倒意大利」的口號。設若有人呼「意大利萬歲」的，就被槍斃。凡他們所佔領的工廠，如有逃跑的工人，就用機關鎗掃射。

於是莫索里尼就挺身而出，招募兵丁，組成黑衣團；而以暴易暴，向暴徒宣戰。可憐的政府，除了袖手旁觀，躊躇兩可而外，毫無制止的能力。於是這自行組織的法西斯軍隊，就代替了政府，去維持治安。武裝的黑衣團員不久就增加到三十萬。當這法西斯大軍向羅馬進兵時，爲要推翻在立憲黨手中的現存政府起見，就作了以下令人注意的言論：

「……法西主義並不違犯一切公共秩序。它所進兵反對的，乃是那些昏聩無用的人，這些人盤據政府有四年之久，尚不知如何處理。那些中等生產階級，知道法西主義是維持國家治安的，所以凡

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幸福的力量，它都予以輔助。那些在農場、工廠和公事房的工人們，更不必對於法西斯主義有何懼怕；它一定要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我們對於那些非武裝的反對者，是以寬大為懷的；但對於那些武裝的敵人，却必殺無赦。

『法西斯主義要把戈福安（Gottan）網縛和麻痺意大利生活的結，一刀割斷。我們請上帝和那五十萬戰死者在天之靈作證，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只有這一個目的燃起了我們那火熱的情腸，這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一切，拯救我們偉大的國家。』

當時的內閣之唯一反對的表示，就是由首相聲明，其所以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受困於大軍』所致。但經過意皇的反對，這種命令業已取消，而內閣亦行辭職。於是就在協妥的辦法之下，重委首相，而使莫索里尼充任閣員；但莫氏却加以否認，說法西斯的勝利，決不可任人摧殘。意皇就正式請他出而組織政府。莫氏許可於是這一齣四十萬黑表武士的總動員，就此閉幕了。

### 一人獨裁的政府

法西斯黨認為共和黨、民主黨和保守黨都是徒擁其名，而無其實。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完全不同。它對於一切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加以否認。即那些所謂『國會』、『大多數』和『輿論』等等的民主基礎，它也完全一筆抹煞。它認為這些都是『不合時』、『無謂的』、『陳腐的』、『愚笨的』、『因循

苟且的』『軟弱之源』『和狡猾之具』所以都是『危險的。』

莫索里尼認爲民治是十九世紀的陳腐東西；它對於社會政治的一切改革，都不敢染指。但法西斯主義却反是。它否認『大多數』的民衆就能指導社會。它認爲所謂民治政體者，只不過是拿主權去蠱惑民衆，而其實操縱主權者却不負責任。法西斯主義看責任內閣制，只不過是引誘民衆的妓女；他們所無力處理的議案，才交給國民決定，其實政權是操在少數人的手中，這少數的人都是拿政治作他們的飯碗。這樣的制度，其見地既低，自無甚價值之可言。設若用此方法去管理一種商業公司，這公司就快要破產了。因爲如一聽輿論的吹毛求疵，或一味的符合民衆心理，而求政府之能勝任愉快，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尼采 (Nietzsche) 班斯 (Barnes) 同莫索里尼都認爲：『民衆必須在少數人領導之下，這是一定的真理。所以少數貴族的專制政體是必需的。集全國少數的精英，而授之以政權，彼等方知如何使其社會盡善盡美。』所以那最好的制度，便是『把政權交在少數品學兼優的特殊階級的手中。』於是這政府的人才非特傑出，而且主權也從此鞏固了。

法西斯對於政體的主張既如上述，但『決定政體之權究將操諸何人之手？』法西斯主義的解答是：『誰能因時制宜而予社會以最大的發展者，誰就能操決定政體之權……所以主權的問題，就是能力的問題。誰有能力去處理時艱，誰就有權決定政體。時變境遷，攬權之人自亦互易。』所以莫索里尼認爲『那最好的政體，乃是在某國家的某種情形下，而貢獻最大的政體。』

以法西斯主義的眼光看來，政黨和「少數人的專制」是不可分離的。在法西斯統治下的第一個內閣，是由十五位法西斯黨員和十五位舊政黨的代表所組成，內中並無社會主義黨分子。至法西斯黨之下議院中的代表，尚佔少數。但莫氏的首次講演，就早已目空一切了。他說：「革命本有其自主之權。所以我要領導着我的黑衫革命者奮鬥到底。我本可以掃蕩羣雄，而大獲全勝，但我不願意這樣的斬草除根……：我有三十萬武裝同志，唯我的命令是聽，我豈不能處罰那些誹謗法西斯主義的人。我豈不能把這蒼白的會議廳變作我的軍營。我豈不能立將議會封閉，而換上我的法西斯黨員。但我的最低限度是現在不喜歡這樣作。」

莫索里尼不只在下議院中這樣的目空一切，即在上議院中也作了同樣的演講。聽衆只有低首下心，而莫可如何。於是不久就把全權交托給他了。

不久法西斯黨就對一切的異己者大施排斥。凡政府中的工作人員，非其同黨，即遭驅逐。敵對的行爲，不只限於文字上和議會裏，而各處暴動亦所在皆有。並解散一切政黨，使其敢怒不敢言。凡稍加抵抗的，即不惜以最嚴酷的手段相對待。而這種壓迫行爲，至現在依然不息。於是風波大起，明鬥、暗殺、復仇、逮捕和鎗決等等，極盛一時。而莫索里尼的性命也有數次瀕於危險。於是就成立了「護衛政府的法庭」專處理一切反動的案件。

法西斯黨即下令通緝一切敵黨的領袖，且沒收其財產。他們就不得不逃往國外，而在國外從事破壞

其本國政府的種種行動。且在國外組有暗殺法西斯外交代表的團體。這就是意大利皇太子在布魯塞爾(Brussels)遇刺的原因。有一千多名犯法者，被「護衛政府的法庭」定罪。因革命愈推進，死的人數亦愈多。雙方因敵對而犧牲性命者，不下四千餘人。及至法西斯的十週年紀念，暴動的行為業已大減於昔。於是政府便有特赦政治犯之舉。據其報告，業已受感化的反法西斯罪人，不下一千二百名之多。在這一千二百人中，有五分之二是獲得大赦，有五分之一減刑，差不多有半數得到自由。

法西斯黨對於其黨員的紀律亦極嚴格。那第一次設立的禁錮營中的罪犯，多係法西斯黨員。凡對於黨有反動行為的固被排斥，即那些過於熱心的黨員，亦必須受相當的教訓。有很多的黨員，是因暴動而下獄，而對黨綱持異議者，亦在不赦之例。成千的法西斯黨員，因為一兩次過犯而被囚禁。被開除黨籍的人，亦有數千之多。只因爲要將黨國大權集於一人之手，以致犧牲了不少黨的實力，且因此而把多年患難相共的老友情誼，也都置之不顧了。甚至把前任的法西斯黨秘書都處以死刑。但莫索里尼雖心如鐵石，有時也不能無動於中。有一次，他有一件重要的議案，爲少數黨員所否決，他就辭職。直等到三月後，的法西斯黨大會，議決給予莫氏以全權，以便命令一切，這場風波才告一段落。

因爲要使黨權高於一切，意大利的憲法自不免多所修改。他們把行政的全權，都集中在政府的一位領袖之手。下議院本是意國昔日的立法團體，而今則不過尸位而已。它好像橡皮印，唯莫氏的命令是聽，自己一點也沒有商酌的餘地。莫索里尼在政府的地位，比首相還高。他只對於意皇負責。其他的閣員，都對他

一人負責。他有隨意任免開員之權，且可隨意自行兼職。有一次，他一身竟擔任了八種職務之多。

在法西斯統治下的下議院，議員選舉方法是先由各地地方有選舉權的團體中選出一千人來，而後將其名單交給法西斯黨的評議會。這評議會再從一千人中選出四百人來，而將這四百人的名單交選民去選舉。選民除填寫「是」與「否」二字外，別無他事。其實這下議院實在是等於有若無。莫氏於一九三四年年的議員選舉時曾說：「下議院是永遠不合我的口味。它已是不合時的東西，連它的名也無人敬重了。……它是擁護多黨制度的，但自從我們取消了多黨制以後，它已失掉了它原來被創設的理由了。」

莫索里尼對於上議院則頗表示好感。上議院的分子是從王公而學者，而文人，而科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少數著名的軍事、外交、政治和富裕階級的人們。他們大部分不從事實際政治的活動。他們對於法西斯的革命雖不無批評，但都非常的溫和，故莫氏對於他們也較為客氣。且他們都是一國的名人元老，頗與社會鞏固有關，故莫氏亦待之較寬。

莫索里尼對於意大利帝國（即皇室）曾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作了以下的言論：「我認爲我們可以

把政體完全刷新，而無需與帝制作難。我們有很多更重要的事去作，最好把它置之不論吧。設若我們干涉帝制時，意大利有很多的民衆要對我們懷疑。……我不相信帝制會對於我們法西斯的革命有何妨礙。這完全出乎它的利益之外。設若它加以干涉時，它就成了我們攻擊的目標。既成了我們攻擊的目標，就不能跳出我們的手中；因爲我們對於它一定要拚一個你死我活。……帝制的歷史已久，與國脈相關。……

得過且過，不必使我們法西斯主義凡事都要挺而走險。我們千萬不要給民衆一種印象，使他們誤認我們必須對於一切事情先加以破壞，而後建設的。」

行政權上自首相，下至庶民，是一貫到底的，並無任何的選舉團體介乎其中。每省的提督，都是由意皇（其實即首相）所委派。他好像一個縣知事，掌理行政和維持治安。他有指揮全省重要經濟議會之權。鎮長（Podestà）是由提督所委任，而向提督直接負責。在小城鎮中，他在提督的許可下處理事務。在大城鎮中，他還有助手。但鎮長是沒有薪金而盡義務的。除鎮長而外，還有一個具有代表性質的顧問委員會，和一個秘書。至於大城中的市長，却由政府所直接委任。市長不斷地將城市中的一切情形報告內政部。

全國上下如遇官吏缺乏，只有法西斯黨的黨員有權補充。這顯然是黨權高於政府了。法西斯黨員男女老幼一共約有二百五十萬。法西斯黨藉着他們，便能對於大學、官吏、鐵道、郵政、軍事、遊戲和餘暇等加以統治。每逢黨員入黨，必須宣誓說：『我宣誓去無條件地服從元首的命令，且盡全力去從事法西斯革命；如遇必要時，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中央、省、和地方黨部，各設秘書，去傳達對於黨員的一切命令。復由各省法西斯黨的秘書組成全國議會。至在全國議會之上，復設最高參議會（Grand Council），而元首却高居其上，指導一切。元首的發號施令，多有黨政秘書相助。黨政秘書不只是內閣的開員，也是元首以外的最重要人物。

最高參議會擁有最高的權。它除了指導黨政而外，更是政府的良師。它的行動秘密，完全不受下議院



立法手續的拘束。它有直接立法和草創命令之權。凡關於一切外交、教會、勞工、實業、和皇室繼位等事宜，都由它一手操縱。它還可以向意皇推選黨政元首，和首相的繼任人，——黨政元首和首相本來是一個人。此外關於法西斯黨員的訓練法庭和那三十餘萬的黑衫警察，也都是不可忽視的機關。莫索里尼所以能應付裕如，就爲了多憑着這兩個機關的幫助。至於其包羅萬有的經濟機構，在下章中將再加詳述。

### 一種革命經濟的結構

這種新的經濟機構，是出自法西斯的計劃經濟。其組織是自下而上，有一貫的系統，故最好先由下層述起。

第一級職業會是由一分區或數分區組成。工人和雇主都各有其不同的職業會。至各種職業不同的人，又各有其職業會。如其區內的某項工人職業會，得到該區內該項職業的全體工友的百分之十作會員，即得向政府備案。一經備案，即爲合法的機關，而有權與雇主訂定勞工契約，且向全體工友收費。每歲向每位工友所收的費，不得超過他一天所得的薪金。該會雖不強迫工友去加入，但其所訂的各種契約，無論已否加入的工友都必須遵守。本會除經濟事務外，尚有政治的、教育的、和各種社會幸福的工作。非會員無選舉職員及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之權。政府只准在某區內和某種職業下有一個第一級的職業會。

在各分區中，除工人職業會外，尚有雇主的職業會。雇主職業會的會員，必須有該區該項職業的工人

數的十分之一，方得向政府備案。備案後即成爲合法團體。它有代表一切雇主，去訂立契約和徵收會費之權。

工人和雇主職業會的職員資格，都受政府的嚴格的限定。其審查之點，以該職員的品行、能力、經驗、愛國、和忠心於法西斯主義而定。一經政府許可，它們在實際方面就成了政府的機關。無論工人或雇主的職業會，每歲都要開一次全體大會。其董事會每歲至少要開數次。其幹事會的會長，是該會的祕書主任。在其區域內的一切薪金、時間、和勞工標準等問題，都是由他過問的。

在工人和雇主的第一級職業會之上，尚有三重機關。省職業聯合會就是第二級職業會，它是由各種不同性質的職業會所組成的。它必須按法向政府備案。在它屬上的一切職業會必須納費。第二級職業會有權制訂各會的勞工契約，並傳達上級的旨意。此外它還有監督、指導、和調解各分會之權。它用函件和各分會來往。

第一級職業會除參加第二級職業會以外，還可加入它的同行職業之全國聯合會。全國聯合會代表它的全國同行的利益，和別種的職業團體也有來往。它也是第二級職業的一種。

全國職業聯合會就是第三級職業會。它是以上兩種第二級職業會所組成的。按照一九三四年的法律，第三級職業會共分爲以下四種：實業、商業、銀行、和農業。每項又分作工人和雇主兩種。再加上美術，便共分成九個第三級職業會了。按照新規章所訂定，是使第一級職業會有自由發展能力的爲主。以原則而

論，第二級和第三級的職業會，不過粗訂第一級職業會之大概方針而已；至於事務和人員的處理問題，那是非所過問的。

除以上第一、第二、第三等等的職業會外，尚有全省社團、全國社團、全國社團參議會和政府社團部的設立。以上各社團和各職業會的區別點有二：（一）社團是由工人和雇主合組而成的；（二）社團中有政府的代表。茲將各社團略論如下：

全省社團是由各省中的工人和雇主的職業會代表所組成，而由各省提督監視一切。全國社團共有數個，是由全國各種職業界中的工人和雇主的代表所組成。它們的規章、會費、職權和行政等，都由政府社團部所規定。它們一切的活動，都是以全國利益為前提，並無此疆彼界之分。它們實際說來就是政府的機關，一切的經費除職業會捐助外，也由政府負責。社團的功用分經濟與社會兩種。它們能訂立勞工法規，亦能調解一切糾紛。至於它們所不能調解的案，才由勞工法庭加以處理。

失業問題亦由各社團負責。按照法律的規定，勞工介紹所是由工人和雇主雙方合組而成。勞工介紹所是由全省社團管理。它們除介紹工人而外，還負責訓練工人和監視學徒的待遇情形，並且關心工人的健康等問題。關於社團的活動範圍，法律業已有明文規定。其條文為：「調和與改進生產的組織。」它們除了調和與改進私人的生產而外，並無直接管理私人營業之權。這就是與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國家主權有大不同之點。其所謂的「調和與改進」者，即激發私人營業的生產能力，免去其同行間一切危險的競爭，

改良落伍的實業，宣傳新的知識，聯絡同業工會，並增進工人工作的興趣。

全國社團參議會是工人和雇主雙方的同等的代表人數所組成。凡全國的一切重要職業團體，都有代表在內。它有權決定一切的經濟生活，並規定勞工生產的立法行為。它有權調和一切契約的衝突之處，並作各種社會事業的活動。它調節一切職業團體，工人與雇主，生產者與商人，生產者，商人，與消費者，以及實業和銀行的種種衝突。所以這個全國社團參議會，乃是政府的最得力的機關。政府藉它去施行其全權，並監督全國的經濟生活（全國的法西斯的經濟生活）。全國參議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處理一切行政事宜，如遇緊急要事發生，可不必召集大會而逕行獨斷。其一切中央委員係從參議會中選出，而以意國的首相充當主席。

全國社團參議會的權限，業已超過了經濟範圍，而步入了立法境域，把下議院的工作替代了。芝加哥新聞報的通信員杜愛拉（W. R. Duell）謂這參議會幾成了「議會的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機關了。」但莫索里尼認為，如謂代替下議院，似未免操之過急。他曾在上議院中對於這事加以批評說：「我們不要性急，因為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是絕對的有把握，且因為以我們法西斯革命的立場來說，我們的成功至少還有一世紀之久。」

政府社團部的功用是去監督和指導一切社團的活動。它干涉一切社團所處理的糾紛，刊印和批准一切社團的計劃，而對於其實行復加以監督；統治社團的一切服務；調和社團與社團以及全國參議會的

的一切關係。社團部已成為勞工與生產最高的訓練機關。它的重要職責即在干涉和完成全國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

在每一種「生產的循環範圍」以內，就組成了一個社團。茲舉紡織業為例，解釋如下。各方代表在社團中的人數之分配為：(一)法西斯黨三個代表；(二)棉花工人和雇主的代表各三人；(三)羊主的代表各一；(四)毛織業代表各一；(五)產絲者代表各一；(六)紡織絲者代表各一；(七)紡光線者代表各一；(八)織光線者代表各一；(九)亞麻與大麻的生產者代表各二；(十)黃麻工業代表各一；(十一)織染業代表各二；(十二)地毯業代表各一；(十三)紡織品商業代表各三；(十四)農業專家代表一；(十五)美術家代表一；(十六)合作織染廠代表一。

各社團在其生產範圍以內，有權去限制其工業的出產量和禾稼的種類及其產量。至黨政的首要原則便是有權發施命令，去干涉一切的薪金制度、稅則、國際競爭與團稅。所以倫敦時報的通訊員批評意大利的新經濟制度說：「該制度對於實業家和資本家未免有些失望，而對於過去的社會主義者却有點表同情之處。」他又說：「民衆對之日增其信仰，至一班意大利的民衆，都認為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已到了末路，因它已使世界經濟破產，而無挽救的方法。」

他們對於以上的見解，認為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已不能解決現在的一切問題。舊經濟制度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而新經濟主義是要剷除一切專以私人營利為目的之企圖。生產問題必須高出乎一切階

級之上，而決不應放任勞資雙方的爭鬥，以致犧牲國家的利益。爲要貫徹這種主張起見，政府必須直接加以干涉，而決定一切經濟組織的原則、大綱和規章等等。除此而外，其一切營業管理則完全自由。

但工人聯合會的會員 (Trade Unionist) 和社會主義者等，却責斥法西斯的這種經濟機構，是完全擁護資本主義而保全私產，使勞動階級無以施其伎倆。約翰斯他齊 (John Stachey) 以後改信了共產主義，他對於法西斯的經濟制度曾批評說：『我們必須認法西斯主義是保護私有生產工具的運動者，它爲貫徹它的主張，不惜用暴動的手段去犧牲一切。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真正宗旨……法西斯主義不過是那最大資本家的武裝臂膀，他們早已得到權勢了。』

在卡門海德爾 (Carmen Heider) 所著的法西斯主義的意義與其重要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Fascism) 中曾說：『莫索里尼之所以能夠在意大利得到大權，是因為實業家和地主們看到自己無力去制服那些民衆的擾亂的緣故。因爲懼怕共黨的煽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才聯合起來，去維持社會現有的制度。去維持社會現有的制度，就是去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權。而且這也是其他的團體所歡迎的，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避免那未來不可知的危險。』

私人的財產和營業，國家是予以保護的。不過他們所以受保護的大用意，無非是要『有益於國家』。政府的力爭之點，亦卽在此。莫索里尼相信，私有財產是在人類人格以外的事，故必須把它看作一種社會的功用。如果有財而不利用，便歸政府沒收。生產品加增，而生產費降低，是必然的事情。只因爲生產的效率

好，政府才出而在管理方面加以干涉。

工廠的停業是不合法的。如雇主用停止工作的方法去壓迫工人，是必須受罰的。如再不服政府機關的命令，卽下獄。任何營業的開張與倒閉，非經政府的批准不可。例如有一家商店因破產而要清算，但按契約所規定的日期，尚欠工人六百萬意幣，則非繼續還清不可。一切營業的擴張和清算，都必須經過政府的批准。按照財政部的報告，有一百五十二家商店在同一時期內請求許可營業，而得到批准的只有八十八家，有四十一家是被拒絕，而二十三家則被批回查清再呈。如得不到政府的批准，無人敢私自營業。雇主和工人處處都是受到一樣的待遇，這較以前的經濟放任主義，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

意大利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經濟建設，較諸蘇聯大為遜色。究其原因，蓋以意大利早已成爲工業先進之國，而無須積極地施以工業的建設。它的工業、商業和農業之技術的訓練，與工作的效率，早已很有可觀。鐵路與汽車道的服務，在歐洲業已列入頭等的國家中。最新式的軍艦和船隻業已下水。在歐戰前所消耗的電量爲十七萬八千五百萬瓩，而一九三三年所用的電量則增至五十一萬零五百九十萬瓩。它雖然還需要輸入生金屬原料，但其鋼鐵產量已足以自給。它近來電力的發展很速，不久就可不用舶來的煤炭。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油產量卽增加了十倍。它現在在國內所出產的糖量，已頗足供給本國的需要。刻已有大量酪餅、菜蔬和水菓運輸到國外。一九三三年，食料的國際貿易之出超數量爲八萬萬三千二百五十萬意幣。（一元意幣『Lira』約值美金八九分之多。）一九二八年，它在國際貿易方面所賺的

錢，只以製造品計，就有二，三四五，八〇〇，〇〇〇意幣之多；至於一九一三年則賠了一九二，四〇〇，〇〇〇，這足見其進步之速了。

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意大利亦受極大的影響。其國家的稅收和預算，以及民衆的生活，都處於窘迫之境。新舊半官立的借貸機關相繼而起，去扶助各地的一切實業、農業和工程。至一九三四年的工業生產量，雖較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但其失業恐慌則有增無減。又一九三四年八月間的失業人數爲八六六，五七三，而於九月間則增至八八七，三四五。在一九三四年，歐洲的中東部因受了經濟恐慌的影響，以致麥的生產量減至消費量的水準以下。

國家預算截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爲止，已短少三，七六六，〇〇〇，〇〇〇意幣，而又加上三十萬萬意幣的工程費，其不足之數益見脹大，故不得不發行四十萬萬公債票，以稍謀補救。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第一期預算案，即短少五六五，〇〇〇，〇〇〇意幣之多。至一九三四年的九月三十日止，政府所負的公債已增至一〇三，二五一，〇〇〇，〇〇〇意幣之多。

從一九三四年的三月起至十一月止，意大利銀行的現金已短少了一，〇三四，四〇〇，〇〇〇意幣。這足使全國貨幣的流行的量數，較法定的最低限度減少了百分之四。只在本年度的九個月內，國際貿易就虧欠了一，八三〇，八二〇，〇〇〇意幣，而在一九三三年的虧欠則祇有七六四，〇〇〇，〇〇〇。至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因國內貨幣的不穩定，以致影響了國外的信用，至是否去維持國內貨幣，



已成了嚴重的問題。莫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保證說：『最後的一口氣，和最後的一滴血。』在這樣的種種困難之下，雖尙未至絕境，然人民的生活已困苦不堪。但法西斯主義者，却堅決地認為他們的制度已能防止社會的崩潰了。

### 既無罷工亦無閉廠停工

勞工和雇主是一樣沒有自由的。工人的罷工和雇主的閉廠停工，都爲國法所不許，違者輕則處罰，重則下獄。勞工的特許狀，規定工人們的種種利益。工人職業會的聯合契約，強迫雇主去執行。工人的薪金和待遇，以最高的標準爲原則，經政府嚴格地施行監督。工人如在夜間或工作時間以外工作，必須另外發給薪金。每禮拜的休息日和每年的休假日，都照常發給薪金。規定薪金標準的一切參考資料，都用科學的方法施以搜集。國家的監督機關是專爲防止失業、不測事件、和工人疾病而設，它們用強迫的立法手續，爲一般工人謀利益。

政府勞工僱傭局有權去更動各地工人團體的職員。工人職業會之能否備案的條件，是以政府之是否認可其會員名單、目的、會所經費，以及和其他團體的關係而定。政府有權干涉其會員的加入和退出，更換其職員，和解散其團體。其秘書時常由上面委派而來，且不一定是工人。但雇主的職業會則有權選舉其行政人員。爲保證勞工契約起見，工人的薪金有十分之一是被扣留的。

工人法庭在其領域內，如遇閉廠停工的事件發生，對於勞資雙方都施以法律的制裁。法庭的判決，雙方必須遵行。法官有兩位專家作顧問，一位是出自雇主，而另一位是出自勞工。每遇勞資雙方的糾紛，很易和平解決，蓋因政府對於任何一方並不加以輕重之故。所以皮提林尼（Pittaghi）在意大利社團政府（The Italian Corporative State）第八十三頁上說：「勞資雙方都知道政府是毫無偏私的仲裁者，它對於兩造的一切糾紛，都以極公平的態度處理。」

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政府的社團部共收到了四百九十七件勞工的糾紛案。內中有三百三十九件是用訂定契約的方法解決的。有六十二件尚未得到雙方的同意；而其餘的九十六件則須從事調查證據，故暫為延期。該案中有三百四十六件是屬於工業，有七十四件是屬於農業，有二十五件是屬於商業，有二十一件是屬於交通，有十八件是屬於銀行，有十三件是屬於海上與空中運輸。在七年半之中，只有三十六件工人糾紛案未得和平解決，而交法庭處理。

意大利的經濟組織，既不是「大權全歸工人」的制度，而又不是「資產階級榨取工人」的辦法。其唯一的宗旨，是去維持社會的正義，而其大權在於政府。法西斯主義是以社會幸福為前提，對於有益的社會主義加以保護；但對於階級鬥爭的原則和政黨的戰略，却加以否認。法西斯之對於整個的社會，是立在公正人和警察的地位上。

在法西斯的經濟組織中，最卑微的工人也有發言的權利。知識階級的人們也有他們合法的職業會。

下自地方的職業會，上至全國的專家，與藝術家的聯合會，所在多有。這些知識階級的人，也有他們全國的社團，去代表各種不同的職業的利益。他們的全國聯合會中共有二十一種不同的職業：會計師、農場監工、工業、商業的估價者、建築家、藝術家、化學家、藥劑師、經濟與商業專家、工程師、新聞記者、律師、法律助理員、產婆、音樂師、公證人、醫師、教師、社會調查者、獸醫和著作家。以上的專門職業人才，在意大利全國共有一五九，四四二人，而在一九三三年加入全國聯合會的，共有一〇五，四八四位。

意大利民衆之是否加入職業會，完全聽其自便，但一切的會費和契約却必須交納和遵守。因職業不同，而各會的會員亦不同。實業界工人，全國共有二，九九四，九六一位，而加入其職業會的人數爲一，八一三，四六三位。至在一九一四年之加入各種勞工組織的工人，則只有五三四，二二九位，但加入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的人數就有四六〇，二〇八位之多。但現在實業界的工人們却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數是加入了合法的團體。在各種職業中，工人加入職業會的人數之最多者，要算是交通界；它的會員佔它的全體工人數目百分之六十八以上。（見Fatti Fira Year XII, December, 1933）

### 補足農業生產量的短少

在法西斯主義之前，意國的農場主人和工人曾發生過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在大多數的農民中早已從事活動。在社會主義黨的指導下，農場工人的團體即從事激烈的暴動。不久這種暴動即醞釀成功。那

些從歐戰退回的兵士，便效法蘇俄而大喊其口號說：「耕者宜有其田。」至於最吃苦的却不是大地主，乃是小康之家。因為大地主多住在大城中，使暴動者鞭長莫及。於是小地主們即結合起來施以反抗，但因組織不堅，而政策無定，不是暴動工人的敵手。後來他們就加入了法西斯的鬥爭，而以武力去制止武力。

幸農村的治安恢復較早，而全國農工和場主的職業聯合會都各自成立起來了。政府又強迫地主、工人和專家組成社團，以各方權利平等為原則。過去因暴動而禾稼多被毀壞，現在都已恢復了。這種新的組織，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兼顧到工人和地主各方面的幸福。意大利全國地主的人數為二，七四二，七六三，而加入地主職業聯合會的人數為六六二，六九二。全國農場工人數目為二，八一五，七八八，而加入工人職業聯合會的為一，九二六，九三一。

皮提林尼曾作擁護法西斯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黨的言論說：（見 Italian Corporative State）「主張小農場，即是說榨取階級的言論是早已不合時了，且與農業的利益和人道的進步有礙。」他又作了以下的言論去擁護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的運動並不和赤色的工團主義一樣，專以組織起農場工人去提高薪金為宗旨。它的大用意乃在於代表全體工人，去謀全國經濟生活的發展。所以職業會組織的職責，就是要使全國的農作物足以自給；去開發池沼的荒田，使農民得耕種與居住；使居民得在國內移殖；改良農業耕種法……」

他說農場的薪金制度，是以社團理論（Corporative Theory）的原則為根據。他認為其宗旨是「它

是專為那些經濟情形不佳的農民提高薪金，務使其薪金適合於他們現在的需要。但其薪金的多寡，須按照其服務的好壞而定，只有這樣去作，才可以使他們的農業日見進步。」

莫索里尼對於意大利的農村有以下的願望：「法西斯政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努力去增加意大利土地的生產力，和努力去提高數十萬勞苦民衆的生活程度。」「土地為人類活動的萬有之源。」「工業在大城市的集中發展，對於全國的人口有所不利，因為大城市中人口的過於膨脹，使周圍的土地變為荒蕪，而在這荒蕪之區人烟已絕。只要人們知道怎樣去調和日光、水、人力和科學，則意大利舊有的山河，就能今天、明天，以至永遠供給它子子孫孫的食糧。去改變一個地方的水力、土質和衛生，原非短時間所能成功，政府應當用它全部的力量和人工，長期地努力工作。」

莫氏的主張立刻就見諸實行。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農業破產的最大原因，是因農產品價格降低所致。其價格降低的原因，則由於農業生產過剩所致。至意大利却早已見及此，加以避免了。美國現有的農田，已認為生產過多；而意大利却除舊有的田地外，又開發湖沼，而增加了數百萬英畝的土地。他們刻下正在開拓羅馬附近的蓬丁湖澤（Pontine marshes），預備移殖一萬居民，現在該處的居民已有六千了。

他們的著名的「穀米戰爭」就是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中，求其生產量的加增，其加增之法無他，即改良肥料、種子和耕種方法而已。其結果是意大利現在出產的糧米已足自給，而在一九二五年，則由外國輸入的糧米尚有六五，五〇〇，〇〇〇「百磅」（quintal）之多，足見其進步之速了。生產量既然加增，

而農產的價格亦復提高。其提高之法不外增加外來糧米的關稅和減低麵粉業的稅率。政府爲維持現在的糧米自給而不使價格低落起見，就廣設義倉貯蓄民穀。這樣就可以免去投機商人的操縱，而使米價不至忽高忽低。

政府爲提高農業的利益起見，又提倡用福勒汽犁（Fowler Steam Plow），因汽犁的力量頗大，其犁溝足有二尺多深。且其購備的價碼可由政府代爲預付，而於一季後再行償還。於是那昔日牧羊場，今日已成爲肥沃之田，其收利自較前多了數倍。原先只能供給八家人口生活之地，現在因機器犁之故，已足供給六十家人口了。除此而外，尙從事振興水利，以灌溉田地，並到處剷除蟲害。其最近的開墾計劃，要比現在耕種的土地再增加百分之十四。

農場中也漸漸地有了電燈和電力的設備。藉着政府的監督和壓迫，禾稼就按照着意國的氣候、土壤和需要而大見改良。在新開發的區域以內，都是些小的模範農場，在農場中有令人可愛的學校、禮拜堂、運動場、和浴室等等的設備。這一切的建設費用，都由政府的準備金中暫爲撥借。在政府的指導之下，出產量即大見增進，往往增加十倍至二十倍之多。在某一個地方的出產品，由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意幣，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而其稅收則從四十萬增加到六十萬。

### 教育由國家統制爲國家而設

自從法西斯黨專權，昔日自由的意大利，今已歸烏有。在法西斯統制下的教育，有四大特點：（一）要努力得到創造的精神；（二）身體的生活力（包含着軍事的意義）；（三）熱烈的國家主義；（四）對於一位領袖要有捨生取義的決心。其對於青年人的教育，實已獲得很大的成功。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教育費爲九二二，四〇〇，〇〇〇意幣；而到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預算案，則增至一，七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意幣之多。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小學校中，學生數目爲三，三五〇，七七四；而十年以後即增至四，五四四，三六八人之多。自法西斯掌政的十年中，已有一萬一千處校舍建築起來，可容六十二萬兒童。兒童的強迫義務教育年齡已增至十四歲。全國青年中約有百分之十是受過中等教育的，與美國的高中和德國的高等學校（Gymnasium）相等。

意國教育的理想和原則，頗足令人注意的。佐凡尼貞特利（Giovanni Gentile）是在莫索里尼治下的第一任教育部長。他刷新了學校的一切舊制度。他的教育宗旨是：『不應當再把教書事業只看作一種知識的傳播，應把它作爲一種精神生活的動力，而藉以激發創造的能力。』昔日學校中教師與學生成功的標準，是以書本的灌輸爲原則；他現在把它改成以思想、品行和行爲的成熟，作爲成功的標準了。他所最注重的，是學生現在能夠作什麼，至於其以往的成績却是次要的。昔日之以讀書爲求官的思想，今已蕩然無存。現在多數畢業的學生，只是作些普通商店、農場和家庭的工作；他們注重工作的本身，毫無畏難苟安的思想。他們負起了法西斯革命的使命，而在意大利民衆的生活中以身作則。

他們教育的第二個重要點，就是軍事化的體格鍛鍊。兒童一到六歲，即起始加以訓練。這樣的組織有四個，內中有兩個是為男孩：(一)少年團 (Balilla) (二)前衛隊 (Avanguardisti) 至於幼女團 (Piccole) 和少女團 (Giovanni Italiane) 是為小女孩預備的。這四種組織，都在教育部管理之下。兒童之加入與否，完全自由，且必須得到父母的許可。至一九三三年為止，加入的男女兒童共有三，四五四，〇六九人，於此可見參加者人數的踴躍了。

這種少年團的組織，是法西斯黨的一個重要機關。法西斯黨的元首，對之頗為重視。其中央會議共有二十六位會員，係由元首提名呈交意皇，而再由意皇下令委任。意皇於一九二八年下令解散了一切不相關聯的青年團體和俱樂部。於是就在各大城中建築房屋，作為少年團的會所。至小城鎮內，亦在計劃分設之中。會所中的運動場和健身房，是兒童活動的司令部；其中包含着招待、娛樂、教育的訓練和道德的指導，而其經費係由政府所供給。

少年團的組織，係採取古羅馬軍隊的編制。十一位兒童編成一小隊，三小隊為一分隊，三分隊為一連，三連為一營，三營為一團。其教師多係法西斯軍團的團員，好使兒童的教育與操練並進。此外還有醫師和牧師們，從事義務的工作。其主要的課程是體格的鍛鍊，法西斯主義與實行之宣傳，為激發兒童的尚武精神和身體鍛鍊的興趣起見，更有競技比賽之舉行。競勝者有獎品的鼓勵，由黨政元首親自發給。在意大利每個大城中，都有兩處夏令營之設：一處設在山上，一處設在海邊。全意國工人的子弟，有四分之三的數目，



每到夏季總有兩禮拜之久去加入夏令營。內中有十萬兒童，曾經過醫師的檢驗，認為對於其身體的健康要特別注意。為防免加入兒童之意外危險起見，特預備了三萬意幣的保險金。他們認為發展兒童對於航空、航海、汽車、腳踏車和滑雪等的興趣，是最為重要的。

前衛隊完全是輔助軍隊的一種編制。一切的領袖都有軍官的職分。他們的營房與普通兵士並無區別，其唯一區別之點，不過是他們較為年幼吧了。軍事的管理、設備、敬禮和操演時的全副武裝，都與兵士無異。男孩於六歲加入少年團，再等八年，方可加入前衛隊，那時他們的年齡業已十四歲了。他們加入時，必舉行很隆重的禮節。等他們的年齡滿了十八歲，他們就可畢業，而成為青年的法西斯武士，每人都發給一枝來福鎗。再等二年以後，即可成為正式的民軍。我們從他們的日常的騰辭中，就可以看出他們那種法西斯的精神：

「上帝啊！你要使我愛意大利的熱情日日更新，你要燃燒起我那心靈之火，你要使萬衆的心如金石的堅固。……你要用你的智慧澆灌我的思想，你要用你的旨意指導我的行為。使我的眼光銳利，使我的脚步穩固；使我在我國家的神聖路上邁步前進；要走遍它的大道，它的海邊，它的森林，和它的北阿非利加。北阿非利加本來是羅馬的故土。將來兵士整隊進軍之日，你必使我配得起那跳動的效忠之心。將來在旗幟飛揚之時，你必使我配得起去承認我們的祖國。我們把我們各人對於祖國的忠心獻上，必使我們的祖國日見偉大。主啊！求你用十字架和旗幟在我們的軍團大旗之前引路。求你藉着我們的元首去拯救意大利。」

利使意大利脫離了軍事的一切危險，阿們。」

他們這樣的祈禱，實寓意不淺，並非偶然之舉，乃自幼即培養而成。他們要使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的青年中根深蒂固。他們的各種知識、文化和情緒的作用，都要加增法西斯黨員的信仰。全國的教育都是法西斯化的。非法西斯黨員不能充當教員。至教師的宣誓是：『要使一切公民都能誠實，為祖國和法西斯制度犧牲一切。』學校的教室中的牆壁上，掛滿了莫索里尼和意皇的像片。課本中充滿了『莫索里尼永遠無錯』的格言。

現在一切的中等學校中都教授拉丁文。一切的歷史博物館中，對於古羅馬文化大加宣揚。他們為法西斯的和歷史上的一切勝利規定紀念日。現在教育部所用的一切言語，都是要為後起的青年造成一種政治思想，務使法西斯主義能普遍於一般民衆中。莫索里尼的目標是：『一切都在國家的範圍內，不准有任何反對國家的事，除國家而外別無他物。』

### 增加意大利的人口

法西斯對於家庭的主張，可以說是『運生貴子』主義。意大利從一九二一年起，全國的人口日見減少，這使莫索里尼的心神為之不安。在一八七六年間，每千人中生出三十九個多孩子，而在一九二九年，每千人中祇有九個多孩子。於是莫氏乃決志於意國現有的四千萬人口之外，再加增一千萬人。因為加增人

口，就不得不提高全國工業的生產量，使國內的食糧足以自給，使城內的失業者可至鄉村工作。政府又振興工程，救濟失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貿易運輸加速。

莫索里尼認為如將意大利的人口增加一千萬，「則其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亦必增加。」但要實現這種計劃，就必須籌募鉅款去廣築道路和模範村，統制食糧，灌溉田地，與改良土地。他們認為意大利所增加的食料，足以養數百萬的民衆，於是政府就決定試行增加人口一千萬的計劃。莫氏有子女六人，自然有資格去提倡「連生貴子」主義。但德國的希特勒至今尚守獨身，也出而提倡「連生貴子」主義，未免有點不合式了。莫氏處罰一切守獨身的人以重稅。政府公務人員如生七子，得免納所得稅。如非公務人員，能生十子者，亦免稅。凡守獨身的男女都不容易找事情，而人口太少的家族，在居住方面也有些不利。

別國的法律尚未對意大利的僑民加以禁止，而意大利却頒布了禁止民衆移殖國外的新法。意大利過去每歲往國外移殖的人民，約有五十萬之多。但現在却很少的能夠到外國去了。每歲有二萬海外青年僑民，在假期時加入少年團和夏令營，以表示其對祖國的忠心，而其加增人口的政策尚不止此。莫索里尼認為家庭是社會的中心。在我的自傳中，莫氏把家庭看為振作精神的根源。他看私產和家庭是維持文化的兩個石柱。教會對於他的這種主張，非常的贊助。

法西斯主義所造就出來的青年，頗有令人嘉許之處。他們的身體精神都很好。在法西斯主義的普雷一書中，著者曾作了以下的言論：「……意大利現在的青年，是具有英國學校兒童的運動、公平和俠義

之氣，而其智力敏捷、負責任、宗教性和藝術才能，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歐戰後新起的青年，令人看見發生無限的美感。他們實比我在歐戰前所看到的青年好得多。他們的飲食既佳，而身體自健；他們的教育既良，而知識自高。他們의思想和行爲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敢爲主張奮鬥，好勇而且忠誠，忠誠復能好勇。」

### 更優秀的意大利人

法西斯黨認爲社會必須使民衆脫離意外的危險，且提高其生活，使之無損於人類的尊嚴。於是法西斯政府即用立法的手段，強使這種主張普遍在一切社會和經濟的組織中。它在全國各處設立機關，要爲整個社會的幸福努力。但意大利的政策却和蘇俄的不同。蘇俄是由政府一手包辦，而意國却由官民合作，其一切經費也多由人民供給。

法西斯政府認爲本國對於疾病、意外危險、和老年人的保護不足，所以現在對於因職業而生的疾病和肺癆等的保險，都是強迫的。全國意外危險保險基金是在法西斯黨掌權以前早已成立，但那時是自由加入的，而現在却成爲強迫的了。無論雇主或工人的職業會，都要爲它們的會員保險。該保險基金幹事會中有六百位醫師，專管保險人的健康事宜。他們除了正式工作以外，還研究勞工問題和社會改良方策。

社會保險的經費係捐助性質，有一兆意幣之多，內雇主納百分之六六·六，工人納百分之三三·二，政府只納百分之〇·二。這樣的較爲自由的辦法，其成績頗有可觀。如只就肺癆一項而論，在近十年來已

減少百分之三十六。

莫索里尼一得到政權，即批准了一九二三年的華盛頓條約，而採用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凡世界勞工會議在日內瓦所議決的案件，意大利多首先執行，而其未經批准的不過少數。例如工作時間、失業問題、婦女兒童夜間工作問題、實業農業的工人和救火員的年齡問題、工人每星期的休息問題、最低限度薪金的決定方法、對於有害健康的資料之使用問題、因職業所生的疾病而強迫保險、和對於海員的保護問題等，意大利政府都早已批准接受了。

意大利對於一切改良方面的努力，都以下二者為原則：（一）避免一切階級鬥爭的行為，而顧全一切工商業和農業的利益；（二）以國際勞工立法為標準，避免一切扇動騷擾行動。在其社會幸福的各種組織之中，以全國業餘聯合會為最顯著。按其章程所規定，是要「調和與鼓勵各種團體的知識和勞動分子，使之在業餘之暇，去從事體育的、教育的、和道德的各方改進。」至一九三二年，在七千二百四十九處市鎮中，已有百分之八九·七有業餘聯合會分會的成立；而加入的團體已達一萬七千八百零九個。至一九三三年，其會員人數已增至二百萬，而工業、交通、商業、銀行、農業、和公務員等，各界的分子都有。其經費多由職業會供給。

在業餘聯合會的娛樂、職業、指導、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法西斯的教訓寓於其中。其經費除了由雇主與工人的職業會供給以外，還有各大公司的資助。而政府的營業機關也有津貼。業餘聯合會的性質，是兼

青年會、運動場、和民衆館等等各方之長。它的活動實在是形形色色，包羅萬有。就其最著者而言之，爲遊戲、收音機、電影、戲院、和音樂、技術文化、和通俗班、家政、器具、和經濟、衛生、醫藥、和看護，以及手工和針工等等。在該會初創之時，其最難的問題即缺乏領袖，而其最成功之點，即在遊戲和體育方面。

全國慈母與慈幼會（National Maternity and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是社會幸福機關中最著名之一，它有九十二處的省會分會，在每個市鎮和鄉村也有它分設的委員會。它重要的工作是：（一）保護與扶助在生產前後的母親；（二）幫助乳兒的母親與嬰孩；（三）在健康和道德方面保護未到期學年齡的兒童；（四）保護一切反常的、被丟棄的、和犯罪的兒童。此外它還必須和各公立私立的機關發生關係，對於它們要加以調查和統制；要使各機關遵守關於母親和兒童幸福的法規；又使教育的程序切合時代的需要。

從一九二五年起，嬰兒的死亡率已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四；而自一歲至四歲的兒童死亡率，則減少了百分之十九。因生產而死亡的母親，也減少了百分之七。對於未結婚女子所生的私生子，也施以保護。在南部和海島的落伍民族中，設立了一千五百多處的施診所，去幫助懷孕的母親和斷奶的嬰兒。除施診以外，還供給她們的飲食。

對於一切因不良的環境而惡化的兒童，都加以保護。他們爲培養兒童的道德觀念起見，便設立兒童法庭；犯法兒童的家庭，特別法庭待審所；婦女監獄中的母親家庭，使兒童犯罪減少的立法研究；習慣不良

的兒童之特別藥房

讀者讀到這裏，或將發問說：這種法西斯制度的中心目的究竟是什麼？在這裏，我們對於它的政策和方法等，不過略舉其一二而已；至於它對於兒童犯罪、醉酒、白人奴隸和娼妓等的改良善政，則不勝枚舉。要想用一言以蔽之，而回答一切，實有所不能。不過我們却敢說，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是要用財產私有權去永遠剝削平民，也不是甘心樂意去作資產階級的工具。雖然各方面的宣傳是於它不利，但這不過是因為派別的不同，而互相攻擊吧了。其實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國家主義。

### 教會的地位

羅馬教皇的地位問題，引起糾紛已有兩代之久，但一到了法西斯黨執政，竟急轉直下，解決了一切，這實在可說是法西斯黨的一種重要成功。教皇與意大利政府的爭執點，在是否取消教皇在羅馬的政權。這問題已有六十年之久找不到解決的方法。但事過境遷，就將政府和教會慢慢的引上了和平解決之途。其解決的動機，自然彼此不同。只就教會而論，自大戰而後，奧國的勢力業已減弱，勢必需要一個天主教的強盛國家作其後盾。法西斯黨雖把意國的天主教黨打敗，但它却努力反對與宗教為敵的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且莫索里尼和他的政府對於基督徒家庭、宗教教育和道德問題等，都與教會深表同情。這幾個就是教會的重要基礎。

莫索里尼自幼即受了不少天主教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影響。而且在政治方面，他也需要教會的扶助。莫氏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民治和自由的勢力，實多賴教會之助。意大利的民衆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自經過了殘忍的大戰，他們就深深覺悟，而對於宗教的認識也更進了一步。有數百萬的民衆，以政教的糾紛已久，頗以無所適從爲苦，而願雙方早日言歸於好。因爲時代潮流之所趨，雙方就不得不除舊更新，重謀前途。適值那時雙方的領袖——如莫索里尼和教皇本尼提克特第十五（Pope Benedict XV）——都是一時的俊傑，他們自然要應天順人，而謀雙方的合作了。

拉泰朗協定（Lateran Agreement）是在一九二九年訂定的。它把在意大利中心的羅馬改成了教皇的自由城。意大利政府給了教皇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意幣，作爲昔日霸佔的賠償費；且承認天主教爲意大利的唯一教會，而對於其各級教牧和宗教儀式，都特別予以優待。在初級和中等學校內教授天主教教義，已獲得法律的許可。在會堂中舉行結婚，已成了天主教的義務。雙方規定各不干涉其獨立主權。至於是否容忍其他宗教的問題，則未在協定中提及。但在實際方面，對於一切的宗教，並不加以干涉。意大利政府不過作它們的監督吧了。

法西斯和天主教對於青年的教育問題，又發生很大的衝突。法西斯黨全權統制一切。它對於青年的教育，是以養成極端的國家主義爲宗旨；這實在與天主教的精神大相背謬了。於是彼此各執一端，而相持不下。最後，他們才得到了一個解決方案。這方案就是在法西斯組織中的宗教教育，都由一部分特別的教



牧主持，但實施宗教教育的時間不可與民衆的時間相衝突。

有數千宣教師到學校中去教授天主教的教義，對於不信天主教的學生並不加以強迫。這使一般普通的教員起了很大的反感，而反對最甚的是那些哲學教授。他們爲維持哲學起見，對於一切呆板的教條竭力否認，但宣教師們對於教條却堅決維持。

在法西斯主義者與天主教中的另一衝突問題，就是各種團體的組織。教會對於社會上的一切組織要加以干涉，而法西斯主義者却竭力反對，且禁止天主教的大學生集會。法西斯黨的祕書曾聲明說：「天主教的社會團體活動，不是無用處，就是有危險性。」而教皇却堅持天主教的一切活動，要「打進社會和工業的範圍內。」到了一九三一年六月，這種糾紛的局勢即愈行惡化。有的意大利報紙竟宣傳說，在天主教活動的旗幟下，充滿了反法西斯的組織。於是就惹起了法西斯青年的反動。凡天主教青年男女的團體，都被警察所封閉。有很多的團體竟遭法西斯黨的攻擊和劫掠，會員更受了侮辱和鞭打。甚至連宣教師和教皇，都受了不少的侮辱。各種報紙、雜誌和文學，都對於天主教施攻擊。

雙方的祕密談判進行了很久，至終才簽訂了協定。該協定的大體內容是意大利天主教的一切活動，都由主教們施以監督，意大利的天主教要以意大利的國旗爲旗幟，把它的一切活動都限制在宗教範圍以內。天主教青年的活動，亦受同樣的限制；他們活動的範圍，不外乎娛樂和教育的性質，而以宗教爲最後目的。於是這一場風波即告一結束，而政府可以說是大獲全勝了。天主教的團體完全失掉了政治的活動，

而政府却有全權處理意大利青年的教育組織和訓練問題。

一切糾紛既告結束，教皇只得把基督的勳章賜給意皇和皇太子，而把金錫馬刺的勳章（The Order of Golden Spur）賜給莫索里尼。這一場風波的爭執點，是偏重在政治方面；至於雙方對於道德的觀念都無大出入，然而二者之間尚有深淵阻隔，將來的前途未可樂觀。其最顯著的，即貞特利教授的著作多為天主教所禁閱。貞特利教授不但是法西斯主義的哲學家，而且是當時的傑出教育家。他就是改革一切教育舊制的法西斯教育部長。

在法西斯黨中的一切重要領袖，對於教會的利益都不很有同情。而那最令人發生疑問的，就是法西斯對於青年所訓練的教會意義既如此，而教會本身的行動却如彼，其將來如何，殊難預料。然而在法西斯治下的教會的境遇，却比以前好得多。至新教徒的地位，也有清楚的規定，且得到法律的保障。

### 『意大利萬歲』

法西斯黨對於國家主義有一貫的主張。凡和自己的主張不同的，即行剷除。莫索里尼因爭執要參加世界大戰，以致與社會黨和社會主義的同志決裂。他從此即以國家的利益和光榮為立足點。這實在和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大相反對。他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已經崩潰了。他經過了蘇俄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急進的與溫和的社會主義、產業革命主義和其他的共和主義，而至終走上了愛

國之途。他把馬克斯黑格爾（Hegel）和索勒爾（Sorel）的著作放在工人的背上，而置諸羅馬的展覽會中，去表示它們都是勞動階級的贅疣。

莫索里尼認為意大利未用很大的犧牲即獲得平安，這實在是意國的特別成功。羅馬的政府亦放棄了它那有生之權。莫氏的勢力之所及，已越過了阿爾巴尼亞（Albania）。在他的自傳中曾說：『我現在才承認只有一種傳統的勢力方能拯救意大利，因為在這不完全的世界中，只用公義的靜止力量是不夠的。』他認為『去拯救意大利』，只有『法西斯鬥爭』之一途。他就用這種方法去解決本國的一切基本問題。至周旋在這法西斯的鬥爭中的，則有二十七個政黨之多。

社會主義者以為他們已看清了他們前途的路線。於是他們就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發表了他們革命的政策，要去成立勞工專制的政府。自從歐戰歸來的兵士便橫加誹謗和肆行劫掠，於是就激怒了莫索里尼。他大聲疾呼說：『你們這些社會主義的虎狼，快退後吧！戰死的人是不分彼此的。他們並不屬於任何黨派，乃是整個國家的民衆。』『光榮的靈魂們，你們不要懼怕。我們一定要作你們的後盾，甚至在我們城中的大街上和廣場中掘戰壕，亦在所不惜。』

法西斯主義是不主張任何階級鬥爭的。別人稱它為『雖佔民衆的少數，却擁有宣教師的熱誠和規律。他們一着手先用武力攫得政權，而意大利多數的民衆却默加承認，於是舊的制度即由病而死了。』（

參閱 Universal Aspects of Fascism, P. 15)

無論外國人或意大利人，都承認意大利業已煥然一新。其精神之改變，在在都足以證明。它早獲得了美滿的成功，而「是與否」的問題業已成爲過去的了。它不只是公正的驕傲，而對於意大利確有偉大的建設。它的代價是統一、負責和努力工作；且使數百萬的意大利民衆放棄了原有的權利思想，而換上了負責任的觀念。莫索里尼把那安基的典禮改成了建設的柱石，而在國家的建設上大獲成功。有一位蘇格蘭人認爲莫氏業已改變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這種改變不只限於個人方面，而亦普及於團體中。（見 *MORRO Through Fascism to World Power*）

在莫索里尼的自傳中，我們看出他對於國家的熱誠竟變成了宗教的情緒。他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那最偉大的生活和文化，使我的國家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最深的希望。」他這以下的祈禱，早已引起了民衆的信任：「我的上帝啊！求你使我沉淪，使意大利能在世界的面前和你的眼中，日見偉大。」

莫索里尼的野心和願望，尙不能限於他的一國以內。他要把他治意大利的宗旨施諸全世界。在第十一屆法西斯政府的紀念日中，他表示他的願望說：「要給意大利國一種艱難而偉大的事業，使它在天下地上唯我獨尊。」「要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稱得起世界第一。」

### 權力的競求

莫索里尼攘臂一呼，好似暮鼓晨鐘，使世界震驚。他的國家主義日益擴張，自不免使別人加以揣測。它

到底是一種自私的帝國主義呢？還是於人類有益處的一種國家主義的昇華作用呢？關於這問題，參考的材料自然很多。莫氏早已口如懸河，把他對外的主張發揮殆盡了。

法西斯主義者對於復興和布散「羅馬古代的精神」頗為熱烈。「普遍羅馬文化的委員會」業已成立。它對外所發表的宗旨是完全慈善性質的。政府對於它備極優待。至於其內容，可參看司法部長阿爾夫杜羅扣（Alfredo Rocca）的言論。他在「什麼是法西斯主義而且為何要法西斯主義」中曾發表言論說：「法西斯政府」是對於世界負起了文化的使命，要向國外一切的民族去宣傳偉大的文化和遺傳。」

從以上的言語看來，所謂向世界宣傳者，並不只限於羅馬的古代文化，如法律、歷史和藝術等等；乃是要使世界各國步法西斯的後塵，而聯成一種的文化建設。莫索里尼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曾表示意見說：「我現在要憑良心對你們說：二十世紀就是意大利第三次作人類文化導師的時期，因為除了我們的原則而外，不但個人無得救之道，而各國更無自救之方。」他的這種文化侵略主義，是主張用和平方法的。

在莫索里尼未發以上的和平言論以前，因為凡爾賽會議對於意大利不利，他就怒髮衝冠，而劍拔弩張，使一時的空氣緊張到不可言狀。在凡爾賽條約快要成功的時候，他曾公然地斥責法國的忘恩負義，威爾遜的言不顧行，和英國的帝國主義。他就挺身而出，要把地中海的外人完全驅逐出境，而驅逐之法「先自英國人始。」他也曾提議去幫助埃及的革命黨黨員，因為「埃及是古羅馬的屬國，而且是意大利的國家倉房。」至於法國，他認為它必須放棄了它那地中海的統制權，而「先自突尼斯始。」「那四大獸子（

克雷孟梭 (Clemenceau) 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奧蘭度 (Orlando) 和威爾遜 (Wilson) 的議決案，意大利人民決不予以批准。」

自從莫索里尼擔任首相以後，他的對外政策就漸漸的不似從前那樣的強硬了。他在意大利上議院的首次講演中曾說：「我們的政策，並不和帝國主義者的政策一樣。他們的政策未免太不實際了。但我們的政策也並不是說，凡事都不用武力。」「我想我業已使同盟諸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知道我們的意大利早已不是昔日的意大利了。現在的意大利已經是用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勞動，和自己的熱情去創造他自己的前途。」

因為希臘在阿爾巴尼亞殺了意大利的調查員，而戰爭的恐慌又一時緊張起來。意大利給希臘以二十四小時的最後通牒，與奧國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給塞爾維亞 (Serbia) 的最後通牒一樣蠻橫。希臘就求助於新興的國聯。而莫氏却對於國聯加以嘲笑。至終是希臘屈服在意大利的面前，而訂定了賠款的條約。其賠款的數目為五千萬意幣。莫氏以後就把這筆賠款移作救濟小亞細亞的難民之用。

自從倫敦 (London) 協定而後，美國就加入歐戰，俄國發生了赤色革命，而意大利的損失也很可注意。它參加歐戰總動員的兵士，不下六百萬，內中有三分之一被開到前線作戰。傷亡之數共有一百七十五萬，而戰死者不下五十萬。意大利本一磽瘠之國，而債臺高築，實難維持。於是法西斯的意大利就向各國要求，進行修改協定。

意大利認為法國在令人討厭。因為二國之間發生了很大的利益衝突。意大利想擴大疆域，早已對於突尼斯垂涎。但法國業已佔領該地，且對於意大利的十三萬居民頗感不安。因此意法間就發生了不少的外交波折。奧爾度在凡爾賽會議席上要求擴展北非意大利的屬國利比亞（Libya）的邊界。克雷孟梭却立即反對，認為這是於法屬殖民地的邊界不利。至終意大利所得的屬地，只有佐治亞人的高加索。所以將該地給意大利者，尚有兩種用意：（一）防止蘇俄佔領該地；（二）使意大利佔有，藉以阻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擴展。

法國供給南斯拉夫（Jugoslavia）以經費和軍火，而莫索里尼却屢次聲明說，這種舉動是故意與意大利為難。倫敦海軍會議的結果很小，其大原因是因為法國不承認意國的海軍在地中海平等所致。其根本衝突之點，即在兩國在地中海互爭霸權，而法國不願使意國成為第一等的海軍國。但莫索里尼却無論如何要開放地中海，不要使任何國家擁有優越的海軍，以致妨礙與鄰國交往的直布羅陀海峽和蘇彝士運河的交通。

新仇舊怨使意法的邦交益趨於惡化。當意大利統一之時，法王拿破崙第三就從中屢次加以破壞。他曾進兵羅馬驅逐新政府，直至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普法之戰，法王方才退兵。到了莫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在意大利主政，法國對於意國的政治犯就大加保護。於是意大利為報答計，便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殺南斯拉夫王的幫助犯，不施以引渡。

這一切的世仇便愈結愈深，而使大戰後的意法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德法兩國的悲劇，在歐洲舞臺上表演已久，而莫索里尼除了在德奧事件外，一向是援德而抑法。他要使德國因戰敗所受的一切不平等待遇快快消除。法國的佔領魯爾（Ruhr）也是使莫氏大不滿意。他又主張取消一切的賠款和債款。他認為歐戰後幾處新劃的國界是「不但不道德，而且與經濟的恢復與安全很有妨礙。」

莫索里尼在軍縮會議上的主張，是減少增大的軍備，和維持歐洲領土的原狀。他這種主張失敗後，他便主張准許德國重整軍備。他種種的舉動，是想制止法國在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南斯拉夫人中的霸權。國與國間彼此締結同盟和進行諒解，竟置國際聯盟於不顧。因為國與國間的利益衝突，使軍縮會議完全失敗。歐洲中部的小國，依然在東西受敵的恐慌之下。德國的國社黨想併吞奧國的計劃已公然暴露，於是德意的關係就大受影響。一九三四年的暑期在德奧間所發生的事變，適足以停止德意間過去的一切合作。

設若法國不犧牲一部分的利益，而引誘德意發生衝突，則德意兩國因利害相關之故，仍必繼續合作。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有二：（一）維持地中海的海軍勢力平衡。（二）破壞法國與南斯拉夫間的同盟。設若莫索里尼能在這兩點上達到目的，則歐洲中部的小協約國（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勢必瓦解。那時歐洲的局勢就必陷在緊張的空氣中。

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結果，是戰爭還是和平，現在尚無人知道，只有拭目以待吧了。莫索里尼時常說，意



大利民衆本有生活的權利和願望，但可惜意大利乃一磽瘠半島之國，實不能供應它的四千餘萬民衆的需求。且每年增加的人口不下五十餘萬。這五十餘萬人口，在過去都是向海外殖民的，但現在一方因為國內禁止出境，一方又因為海外殖民不甚受異邦的歡迎，便只好在國內謀衣食了。莫氏又復努力獎勵人口的增加，而對於開墾和建設工廠亦極其努力。他與各國訂定的商約不下二十餘件，終於使意大利在原料方面足以自給。

莫索里尼每談起外交政策，就想到意大利缺乏殖民地。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只有以下的五種方法：（一）他可以增加意大利的生產量去供給一切的需要（但這種方法恐非意國長久之計）（二）他可以使意大利的生殖率減低（但莫氏曾聲明這是他所不肯做的）（三）他可以使生活程度降低（但莫氏常說，他願奮鬥到底，不願使民衆的生活程度降低）（四）他可以設法使別國將土地割讓給意大利（五）如他國不肯割讓土地時，那就只有出於武力的一途了。

巴黎的時代報在國際唯實主義的性質中相信：

「凡世界上藉條約而劃定國界的一切民族，無人肯自動地放棄其尺地寸土……設若不假戰爭的手段，誰肯作任何條約的修改。」這幾句話實在和歐洲大陸的歷史極其吻合。

法國的斐加羅報曾警告着說：「設若不能保證我們那友邦和協約國的重要利益及自主權不作任何的犧牲，則法意的關係將永不能改善。」無論國家的表面聲明是如何的和平，而從邏輯方面看來則終

於不免一戰。莫索里尼之能否引領他的民衆跳出戰爭，姑置之不論；然他的外交政策却早已把意大利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他那使意大利誇耀一時，而前途無量的迷夢，已實現了一部分。設若戰爭不能避免，他恐將從意大利的救星，一變而爲使意大利民衆滅亡的罪人了。

### 第三章 國社主義的德意志

#### 『專制病狂』

自從歐戰發生，德意志民族的生活，就趨於極端的反常狀態。復加之以慘敗的結果，故國窮民困，已到了極點。雖與各敵國言歸於好，但強鄰壓境，並未緩和。現在多數的歷史家，都認為把德國判作歐戰唯一的罪魁，實處理有所不當；且徒足以增加德國民衆的疾首痛心吧了。只以凡爾賽條約中的賠款一項而言，已使德國財盡力竭，而不得不對於賠款方案重作了三次的審查。世界列強的經濟專家，都認為這種賠款的數目太大，實非德國所能擔負，便漸漸使之減低。而德國民衆在此經濟重擔之下，早已罹於萬劫不復之境。現在已應驗了克尼斯(Kernig)和胡佛(Hoover)的預言，他們說凡爾賽條約要使歐洲的經濟破產；同時對於世界的經濟制度也大有不利。

德國雖用濫發紙幣的方法，將國內戰債付清；然全國的中產民衆，却因此而罹於萬劫不復之境。在國社黨未專政以前，德國的恢復原狀業已絕望。因為購買力減低，而農業就凋零不堪，於是農場的出產，尚不足支付國稅、債和薪金之用。在這樣的境況之下，人民對於政府就怨聲四起，而全國洶洶了。

全國責難之聲既起，而對於現有的共和國制度就議論風生。共和制度能收拾現在的殘局嗎？現在的

恐慌是否由共和制度而來呢？那辱國的戰敗條約，和使德國以後三代權於萬劫不復的賠款，都是由于共和制度的執政者所簽訂。它的各部大臣只知道向殘忍的強鄰獻媚，他們同強鄰天天開會，但毫無結果可言，而德國的窮困流離却依然如昔。強鄰壓境，迫德國償還那無力償還的戰債。德國業已償還了九，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早已力盡血枯，他們還是貪心不足。復加以國稅和各種捐款的總額，已超過了德國日就減少的進款的三分之一。長此以往，德國將無生活的盼望了。

共和政府之一次一次的選舉，却愈選愈壞。衆議院中因為政黨的紛歧，竟無法維持。兩大勢力的領袖竟在地板上動武；其黨徒便在大街上開火。這位年邁的總統，連一位佔國會大多數的內閣總理也找不出來，只好去修改憲法，用命令派定內閣總理。因為時勢所迫，他在實際上業已允許三任的內閣總理有獨裁之權。所以即在希特勒之前，業已實行獨裁制，而所謂共和國者，早已名存而實亡了。

自從共和政府的初創，大多數的德意志民衆就對之不甚表示同情。威爾遜總統引導着同盟諸國，本想使德國在共和政體下，而得到長治久安。不料共和政府成立了有十五年之久，其所貢獻於民衆者，不過是些災禍吧了。德國的一班民衆只知道命運不佳，對共和政府乃加以憎惡，却不知其所以衰落的原因究竟安在。

共和政體自不能免其咎，而社會民主黨黨員更應負其責。這種新的政體是由他們肇始，而大部分的制度也是由他們決定。自共和政體得勢以來，他們在政府中就佔了大多數的地位。但平心而論，他們的成

功之處，也不能一概抹煞。歐戰以後，德國治安之所以尚能維持，不能不算是他們的力量；而且他們在大城中對於工人住所的改良，在歐洲可以稱為第一。

他們雖有成績，但根本的錯誤却更為嚴重。他們的領袖缺乏訓練，且有很多的人極不誠實。他們的失敗並不是萬不得已，乃是內部不堅而自行退讓。他們並不是腳踏實地的革命家，他們並沒有把他們的敵人完全壓倒。他們只是盲目信任民治；於是便陷入了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覆轍。

在大戰以後，德國的道德生活一落千丈。共和政府故意地放寬了社會上的法律制裁，而這樣的現象在普魯士的境內為尤甚。淫佚之風充滿了當時的文學、藝術、刊物和舞臺。人慾橫流，政府不加以禁制。在柏林的大街之上，娼妓們不分晝夜的公然羣集，而妓院之設遍地皆是。那著名的『El Dorado』之內，藏着二十多位男娼，裝飾得和女人一樣。咖啡店、跳舞場和密室，都是為男女淫奔而設。一般宗教和道德的維持者，却目擊心傷，而作世風不古之嘆。因此他們就對於主治者大為不滿。

共和政府在德國主治十五年的工夫，使德國的經濟破產，道德淪亡，秩序大亂；於是德國人就都害了以得加摩勒爾（Friedrich Murrer）所說的『專制病狂』了。他們真的早已思想專制，而厭惡共和。用歷史眼光看來，每經過一次的民生荼毒，便有領袖挺身而出，去負起解放民衆痛苦的使命。在這危急之秋，希特勒便應時而出了。他經過了十三年的革命奮鬥，興登堡（Hindenburg）便委他擔任內閣總理之職；而他在衆議院中更得到了多數的擁護。

希特勒革命運動的大旨，都載在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的政黨方針中。本政黨的名稱普通簡稱為國社黨（Nazis），係由希特勒和他的同志所一手造成。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國社黨在牟尼克（Munich）召開全體大會，向世界宣布了二十五條黨政方針，茲撮要錄之如下：

一、聯合一切的日耳曼民族去組成一個偉大的德國，而以各國所享有的民族自決權為基礎。

二、使德意志民族與其他國家的權利趨於平等，並取消凡爾賽和聖日曼（St. Germain）的和平條約。

三、要擴展領土和殖民地去養育民衆，並移殖剩餘的人口。

四、只有日耳曼血統才能作德國的國民，不管其信條怎樣，都有作公民之權。

五、凡非德國公民而住在德國境內的，不過稱為客民，而受外國法的保護。

六、凡在德國境內的一切大小的區域中，無論那一種官職，只准賜給德意志的公民。

七、政府的第一種任務，就是提高德國公民的實業和生活程度。如果遇到必要時，得排斥一切的外國人。

八、凡非德意志人，一概不許至德國境內殖民。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移殖於德國的外人，必須立刻離開德國。

九、凡德國的公民，都享有權利與義務平等之權。

十、公民的第一種本分，就是在其社會的結構之下，去盡心竭力為大眾謀利益。

十一、取消一切不勞而獲的進款。

十二、沒收一切戰利品。

十三、凡已組成托辣斯 (Trust) 的一切營業，都收歸國有。

十四、總批發的買賣，應當利益均分。

十五、擴大老年人的給養制度。

十六、要創造和維持一個健全的中等階級；立刻把總批發公司的房產收歸社會所有，且用低價租給小本營業的人。

十七、土地的改革，要以適合於國家的需要為原則；如有益於社會，政府可以無賠償的將土地收歸國有；取消一切土地借貸的利息，且制止對於田地的一切投機行為。

十八、凡對於公共利益有害的行為，都要嚴加檢舉。無論他是何教、何派、與何國、何族，凡一切反對國家的罪犯，盤剝重利者，和發不義之財的人都處以死刑。

十九、那服務現實世界秩序的羅馬法，應加以補充，作為全德國法律的系統。

二十、為使德國人盡其能，地盡其利起見，必須注意高等教育而收進展之效；把全國的教育系

統再重新加以建設；凡一切教育的課程，都必須適合於社會生活的需要和國家的思想，國家的一切改革，先從學生知識的栽培做起。

廿一、爲提高全國人民的健康起見，必須去保護母親和嬰兒；禁止兒童勞工；並用法律去強迫民衆體操和遊戲，以增其身體的效能。

廿二、取消雇兵制度，而易以國家軍隊。

廿三、爲使國家出版事業鞏固起見，凡一切的報紙主筆和操德語的助理人員，都必須是德國人。非德國人的報紙，非經特別許可，不准刊行。凡與德國報紙及其經費有妨的外國出版事業，一概禁止。凡與國家利益有礙的報紙，一概禁止。凡使國家生活瓦解的藝術文學，都施以法律的壓迫。凡對於以上所規定各項有所不利的機關，皆加以制止。

廿四、凡在德國境內的一切宗教，都予以自由之權；但必須以下列二者爲條件：（一）對於國家沒有危險性質；（二）與德國民族的道德觀念不相違背。

廿五、要創造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中央國會在全德國和其他各機關，有無上的主權；且組織各種職業和各種階級的議會，藉以執行在聯邦中的各邦政府所公布的法律。

## 一黨獨裁的政府



世界大戰結束時，希特勒在醫院中所療養的眼疾亦愈；他這眼疾是在歐戰的前線因受了英國的芥毒氣所致。他痊愈之後，就回到他居住的城市牟尼克。他作政治活動的蓄意已久，便與幾位親信志士相交；他們的國家主義，使他們對於凡爾賽條約萬難容忍。於是他們對於訂定凡爾賽條約的共和政府痛加咒詛。他們不是紙上談兵，却實際組織起來，去推翻政府和廢止條約。他們努力反對民衆所深加痛恨的政策；德國單方的軍縮，賠款的支付，道斯與楊格的賠款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法國的佔領魯爾，拿鐵路當作抵押，和「敗壞德國文化與生活」的一切社會趨勢。他們於一九二三年在牟尼克開始政權的角逐，而一般報紙皆嘲笑他們爲「啤酒館的革命」。於是其領袖被捕下獄，而財產經費被沒收；這個青年的政黨就一蹶不振了。

希特勒從獄中被釋出後，不數月之久，就握到了政黨的無上之權。他所主張的「全權歸領袖」是以他自己的哲學和政策爲基礎。在他所著的我的奮鬥（My Battle）（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中，他曾說：「從本青年運動的特性和組織兩方面看，它們都是反對議院立法學說的（Anti-parliamentarian）。凡主張領袖不過是執行大多數民意的公僕之一切的原則和組織，都在本運動反對之列。無論在大事和小事上，本運動都以領袖有無上權威爲原則；既有無上權威，亦必須完全負責……團體的職責，是要使具體的思想實現。這種具體的思想完全出自一人的心裁，而再施諸大衆，且使它從理想而見諸事實。」

希特勒每次講演，都有數千人去聽。他的黨員先時增加的很慢，後來就成千成萬的加增起來。按照着

希特勒黨綱的記載，在一九二五年的黨員爲二七，〇〇〇，在一九二六年爲四九，〇〇〇，在一九二七年爲七二，〇〇〇，在一九二八年爲一〇八，〇〇〇，在一九二九年爲一七八，〇〇〇，在一九三〇年爲三八九，〇〇〇，在一九三一年爲八〇六，〇〇〇，在一九三二年的初期就差不多有一百萬了（一〇〇〇，〇〇〇）。他所用的方法，實使他的朋友感動，仇敵振怒。於是非難蜂起，而見諸武力的，亦所在多有。

在多事之秋，德國非正式的軍隊早已到處皆有。其最大用意，乃在混亂凡爾賽條約所限定的德國軍隊數目。而在實際方面說來，各政黨的領袖，見德國業已捲入了革命的狂浪，非武力不足以制勝。共產黨的軍隊最多，約有數十萬，在共和政府下作種種非法的暴動行爲。社會民主黨的兵力有數萬。保守黨和君主立憲黨的軍隊，多係久練疆場的老手，而天主教黨的軍力亦頗充足。

國社黨爲對抗起見，非要充足實力不可。其軍力的擴張頗速，不久即足以同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爭霸。於是他們的衝突就在所不免。藍衫國社黨的騎兵竟大獲勝利。他們就從事在街市上維持治安的工作。於一九二三年的夏季，藍衫軍就在巴威（Bavaria）大破紅軍，而這樣的敵對行爲自免不了殺人流血。如在某一地方的兵力不足時，即由牟尼克派軍往援。在可堡（Coburg）之役，希特勒親率八百人參戰。

其軍隊非有特別命令，是不全副武裝的。只有有功的人才佩短劍。凡「S.S.」軍隊的兵士都着黑衣，好和「S.A.」隊的兵士分別出來。「S.A.」軍隊能指揮二百五十萬人，而「S.S.」約有五十萬。他

們的實力合起來，適足以控制全國。他們努力「淨街」的工作，而那最吃虧的乃是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員。國社黨和敵人的傷亡者不下數千，而戰死者亦有數百。

及至一九三四年，「S.A.」軍隊的兵士過多，而紀律不嚴，便漸漸成了重要的問題。有很多的軍事領袖因為反對政府的行爲，而被開除。全體的兵士都重新受嚴格的紀律訓練。至於「S.S.」軍隊，則援意大利黑衫軍的前例，在平時他們就充當警察職務，而名爲國家民團。當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S.S.」的領袖叛變時，他們出而不亂，盡力不少。

興登堡對於共和政府的態度，可以說是「不偏不倚」。他對於威馬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是始終如一。他因爲在衆議院中沒有佔多數的政黨，以致內閣總理無從產生，萬不得已才用命令使勃魯寧（Brüning）巴本（Von Papen）和斯賴赤爾（Sleicher）出而組閣，且授以全權處理一切。那時名義上雖非獨裁，而實際上與獨裁之相去，其間已不能容髮了。然而這位總統依然拒絕按照希特勒的主張而使之組閣。直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選舉，使國社黨和保守黨與君主立憲黨在衆議院中佔了多數，保守黨和君主立憲黨的領袖出而從中調停，更因得巴本之助，希特勒才得作內閣總理。

當時政界領袖並無意使希特勒獨攬大權。所以國社黨在內閣中只佔少數。但希氏的主張却完全不同。他堅持他在一九二三年下獄以後的學說和政策。他的主張在「好漢可以獨行天下」（The Strong man Strongest Alone）中會說：

『最足令人注意的，是世上偉大的成功，皆非出自羣衆之手，乃由一人所造成。凡出自羣衆的成功，在其最初之時即種下了瓦解的種子；其結果是所得不償所失……所以中央政府永遠不要建設在多數的團體身上，而使其基礎不固。它必須使它在一種強而堅固的運動之下。本運動成功之日，即其他一切運動失敗之時。』（見 *My Battle*, P.219）

希特勒接受組閣的條件是：在他內閣主政的四年期內，要有全權處理一切。如接受此條件，議院憲法就必須加以修改。但議院憲法的修改，非經過衆議院三分之二人數的票決不可。那時的共產黨早已成了非法的組織，且業已下令解散。所以共黨在衆議院的數十張票的表決權都被取消了。但要想得到三分之二人數的贊助，仍須獲得天主教黨代表的同意。這事復得馮巴本之助，而終於成功了。於是那可注意的反對派，就只剩了社會主義的民主黨。

本修改議院法的議案名爲：『拯救議會與國難的立法設計』（*Legislative Project for Saving the Nation and the Reich from Distress*）本議案的正文說：業已經衆議院的表決和上議院的贊助，『修改憲法的立法議案當即照准。』又在威馬憲法中補充說：『議院政府亦有權發行議院法。』此即政府有權用命令制定法律。此外政府復有增減預算案的全權。本議案的效力期間，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止。

命令法自公布之日起，即爲有效。只有原來的立法手續，衆議院和上議院的組織，以及總統的地位，是不得由命令法隨便改變的。但在本議案之下，總統自動的放棄了他原先的批准與否決之權，而對於任免

閣員以及內閣總理之權則仍保留。且至萬不得已時，那請全國公民票決之權 (Placitum) 則仍未放棄。然而自從興登堡總統死後，希特勒已併吞羣雄，而把大總統和內閣總理的職權合了起來；於是興登堡所保留的總統之權，早已名存而實亡了。

希特勒爲使他的政權更加鞏固起見，便進一步把數邦中的議院行政權完全取消。於是普魯士、巴威、薩克森 (Saxony) 和圖林根 (Thuringia) 諸邦的立法團體都被封閉了。這些立法團體都是產生一切行政人員的機關，而向選民直接負責。但現在在各邦的一切重要行政官員都由希特勒所委派，且只向希氏負責。因爲各邦的立法團體都被解散，希氏便用顧問會去代替一切。普魯士省長的官職，是和閣員同一等級的。所以赫爾曼戈林 (Hermann Goering) 是內閣中的一位重要閣員。舉凡一切上下的重要位置，都被希氏的親信黨員佔去。德國民衆看到這種集大權於一身的情形，有的則認爲滿意，有的則置之不理。有很多的人認爲這種行動是使德國團結堅固的好現象；因爲過去有很多的政治組織，是太散漫、重複和不經濟的。

希特勒依然努力壓倒一切政黨，而使全國完全在國社黨的統治之下。他們因爲要去解散共產黨，才和共黨發生了不少的巷戰。據國社黨的報告，其最勁之敵即爲共黨，而共黨的勢力也的確令人可怕。在一次選舉之中，他們就得到了六百萬張票。他們在衆議院的代表人數常是佔第三位。而他們在柏林的選舉票數，却比任何政黨都多。共產黨的暴動最烈時期，爲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有數千德國人因之而傷亡。

及至國社黨興起，便佔領了他們的司令部，封閉了他們的出版物，把他們很多的領袖和黨員逮捕下獄。有的人竟被鎗斃，而很多的人受鞭笞。還有些因逮捕而逃跑的人，都被擊斃了。

有很多的共產黨員都加入了「U. S. A. L.」軍。也有的為國社黨的經濟政策所誘，而加入了國社黨。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共產黨業已瓦解，然究其實際，其潛勢力尙未可蔑視。在柏林的赤化區域中，有一位共產黨曾於一九三三年對他美國的一位朋友說：「我們的黨員還有一百萬，頗足為將來再興的種子。」

國社黨與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亦頗激烈。但社會民主黨不多用武力，故雙方的武力衝突尙少。希特勒認為德國過去二十年中一切戰敗與國恥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多由社會民主黨所招致。所以他大罵社會民主黨為非德國民族的，破壞德國文化，大半的領袖都是猶太人，猶太人的工具，崇信議會主義者，叛教者，縱慾者，腐化官僚，階級鬥爭的信徒，和分化德國人的罪人。

社會民主黨初時尙認為合法，但不久即大遭逼迫。其領袖有數千之多，都被逮捕和鞭笞。它有數位重要的領袖逃出國外，在布拉格（Prague）設立機關，指導政黨的活動工作。政黨的機關報被封閉。而這自從共和政府成立以來，在競選一方面最有力的政黨，今已破碎無餘矣。

其他有組織的重要政黨是天主教黨和保守黨。保守黨所主張的，是要恢復歐戰以初的原狀。它的黨徒多半是君主主義者，大地主，老軍閥，大工業家，知識階級，和中上階級。希特勒所以能夠一躍而為總理，多借本黨領袖之助，而這政黨今已自動的解散了。

天主教黨的創始，是由於各教會聯絡起來去保護本身的利益，而反對俾斯麥的政策；他們認俾斯麥是與教會不利的。它和社會民主黨是維持共和政府之最重要的兩大勢力，且選出了幾位內閣總理。社會民主黨中之信仰馬克斯主義者，本與天主教的信仰水火不能相容，而今竟能合作，實屬可怪。它們的合作，一直到希特勒成立了四年獨裁為止。天主教黨雖對於希特勒的獨裁加以認可，但它的壽命也未見延長。其解散的大理由是政教分離，不准教會干涉政治。

希特勒用一種選舉衆議院代表的新方法，把一切異己的政治勢力完全剷除。他這種選舉方法差不多是從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學來的。國社黨先將一切候選人印在票上，而後將票分發給選民。選民除了在票上填寫「是」或「否」二字外，別無他事。選舉的結果，自然都是國社黨中的人物。有一位外國報紙的通訊員，曾罵那些被選的人為「當選的怯弱者」。

### 經濟自給政策的得失

讀者每讀國社黨的黨政方針（參看『專制病狂』）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和十八各項，如不參考其他的言論，就往往認為德國的經濟政策是一種急進的改革主義。然究其實，其經濟的擴展却從未走上左傾之路。它經濟的範圍包括的很廣，小工業、商店的主人、小本營業者、農民、消費者和負債者，都在其範圍之中。從這種經濟計劃的全體看來，可以名之曰『都不滿意』（A consensus of discontent），因

爲它要顧全一切，恐一切都不能顧全。

到了那經濟改革的方策見諸實行時，而各方面的利益就發生衝突了。至國社黨內的糾紛亦極嚴重，甚至對於政黨方針中的數點，不得不加以限制。差不多凡富於過急性的要收回，除非使國民經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恐急進的行動是無機可乘的。至左派的赤色經濟政策，如等到各種的經濟方法都失敗後，或還有反動的餘地。

希特勒國社黨的經濟政策是以政黨方針的第十項爲根據。按本項的規定，每個國民的主要職責，就是在既定的制度內各盡其職，努力爲社會謀幸福。這種主張的大意，是不但反對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更是反對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級自私自政策。所以國社黨引以自豪的，就是它的不分階級主義。至於一切主張階級鬥爭的政黨，總要努力加以攻擊。

國社黨所常用的德文字『Gleichschaltung』具有特別的意義。如將它譯成英文，可用『adaptation』或『coordination』二字來代替。再將英文譯成中文，便成了『適應』或『調和』了。就好像把一盤機器的汽門加以堵塞，而機器的全身都要發生影響一樣。設若把這種主張應用得好，那就輕則全國的經濟界失掉了自主力，重則成了國社黨化了。實際說來，這種經濟辦法，是要使這新的一黨獨裁政府的理想、計劃和權能，都駕乎社會的種種組織之上。

在黨政方針的第二十五項中，曾提到『各種職業和各種階級會』。在國社黨之整個的經濟機構中，



這種「會」的組織很覺重要。這種辦法，自然取法於莫索里尼的「社團」經濟制度不少，其實也是德國固有的特色。

其經濟機構包羅萬有，把全國經濟界一網打盡。本經濟機構在各分區之工業團體的部分，是由工業中各種職業的代表所組成。廠主、經理、工人、書記員、和技術人員，都有代表在內。由幾分部而組成一工業區部，其代表也是由各種職業的領袖所選出。在這上面還有一個全國的團體。於是工業界各種不同職業的團體，再聯合起來而成爲工業會 (Industrial Chamber)。本工業會中所包括的工業團體，有機器、電料、製革、紡織、鐵絲、食料、陶器、玻璃、化學品、抽水機、和紙業等。此外還有手工業會、商會、交通會、銀行會、和保險會。這些各種會都藉着經濟部 (Ministry of Economics) 與政府打成一片。經濟部和各個會聯合起來，去制定全國的經濟計劃和命令。

以上就是國社黨在經濟制度方面所夢想出來的堡壘。至於其最後的操縱之權究將誰屬，尙無明文規定。自下而上的一切領袖，是由各會的會員選舉呢？還是由國社黨自上而下直接委派呢？現在依然是個辯論未決的問題。

按國社黨思想的傾向而論，自然是走向國家統制之路，而一切的團體都要在希氏一人的發號施令之下。大約當各種會組織得頗有可觀之時，政府就要從各種的職業界中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來，去統理一切。該委員會的號令就可經過各個團體的負責人員而通行全國。且將效法意大利的社團辦法，凡由會

所制定的規章，都有民法上的效力，自上而下應一致遵行。

黨內對於經濟政策的主張既是紛歧，而國外經濟的壓迫又很緊張，在在都足以使德國的總理和政  
府走上保守之途。沙赫特（Schacht）以一身而兼德意志國家銀行的總經理和經濟部的總裁，却完全沒  
有革命的趨勢。議會的計劃會祕密研究了六個月之久，而至終的結果是唯希特勒的馬首是瞻。

國社黨雖對於整個的經濟組織尙無具體動作，然對於工業商業的局部改革，却早已着手辦理。政府  
業已在各種經濟界內，從事改革和扶助的工作，漸漸走向由政府統制的道路。從各方面看來，它並不是去  
犧牲了大多數的民衆，而庇護少數的資本家。它乃是不分彼此，而一視同仁的。自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二十  
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制定的法不下一百四十七條。茲選擇一部分議案的題目列下，使人讀了頗覺  
有維新氣象。以下種種都是要改正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使之對於民衆有較好的貢獻。

- 一、團結製糖業。
- 二、修訂證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的章程。
- 三、調整儲蓄銀行。
- 四、修訂炭鑛規章。
- 五、組織銀行監督。
- 六、注意取消抵押品取贖權的手續。

- 七、注意結賬時賬目的隱匿。
- 八、注意減低資本的進款。
- 九、保護小木營業者。
- 十、調整米穀專賣公司。
- 十一、處罰一般使資本走漏的人。
- 十二、重訂零售雜貨店中的最低價目和最低利息。
- 十三、修訂國營公司的董事部。
- 十四、在家庭住宅中提倡公共利益。
- 十五、調整德國工業義務銀行。
- 十六、調整百貨商店和支店。
- 十七、禁造製造雪茄烟的機器。
- 十八、修訂商業法典。
- 十九、調整國內麥粉製造廠。
- 二十、調整聯邦銀行委員會的權能。
- 廿一、規定登廣告的辦法。

廿二、調整製造廠的合併辦法。

廿三、使城鎮的短期債務變為流通公債。

廿四、規定穀米的價格。

廿五、提倡國外貿易的輸出品。

廿六、調整取消農業抵押品取贖權的手續。

廿七、調整價碼的折扣辦法。

廿八、設立聯邦事務所統制外匯。

廿九、調整碳酸工業。

三十、施行所得稅法。

卅一、調整油、脂、動物肉類、牛奶、蛋、蜜、園藝、水菓、可可茶、白蘭地酒、冰淇淋、糊牆紙、亞麻線、肥料和種子的銷售。

卅二、調整各公司聯合訂定的『同業合同』。

卅三、成立強迫的『同業合同』。

全國工商業大機關的重要人員，多被換上了國社黨的黨員。又設立委員會，處理一切最高行政事宜。大公司中舊日的領袖多被撤換。有的人因剝削平民而受審判。有很多的人被捕下獄。其經濟改革和統制

的政策，可以說是仍在推進之中。

經濟部的大臣有權直接訂定同業間的合同，且能強迫一切工商業去注意這一點。於是他就有訂定市價的權力。至一九三三年，市價較前漸次穩定，其實賣總額的百分之四十的價碼，是由同業間的合同所訂，其餘的則由其他的協議所規定。非法的改變市價，往往被處以下獄之刑。舊業的擴展和新業的設立，往往得不到許可。也時常有些營業被迫封閉，和縮小範圍。新的百貨商店是不准設立的。在數邦中，即舊的百貨商店也加以重稅，且作種種反對的宣傳。

強迫工業多用人工而少用機器。在玻璃和製糖工廠中，要一律強迫用人工把大薪金減低。只有主人、經理人和得到許可的專門職業人，才准刊登廣告。他們最重要的一種政策，是要把工業散佈各地，藉以制止大城中人口的猛增。把農業和工業連在一起，使分配的方法簡單，並使各鄉區差不多都能自給。官立的專賣公司和市價的條例，都不利於大的批發公司。有十五個區業已組織起來，去自行收發雞蛋。

德國這種新的經濟政策之能否成功，要看它是否能夠在這世界經濟恐慌中打開一條出路而定。對於德國經濟有研究的人都相信，這種經濟的改革，與世界經濟的恢復大有關係。

德國的經濟狀況雖然困難，却非絕望，工業的產量自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三二年止，減少了一半；但在一九三三年却加增了百分之十二。及至一九三四年的秋季，較前又加增了百分之二十。政府獎勵結婚，家具工人因之發達。國社黨黨員多穿藍衫，而製造藍衫制服者就日見加增。全國貿易之零售總額，在一九

三一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五；在一九三二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至一九三三年却加增了百分之五，及至本年的十二月算起，業已加增了百分之七。至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前，其加增的數量較諸一九三三年又高得多了。

在一九三三年，失業的人數就從六，〇一三，六一二減到四，〇五八，〇〇〇。但至一九三四年的夏季即減至三，〇〇〇，〇〇〇。到了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底，失業的人數就只有二，二六八，〇〇〇。U. (ER) Weekly Reports, November 28, 1934) 他們使失業人數降低的方法，不一而足。在公共工作方面，他們築路、修鐵道、掘運河、修港口、開墾土地和設立電力公司，並用了許多的人。政府又津貼房屋主人，而免其修理和擴充房屋稅，因此亦增加了不少的雇工。立定規章，減低僕人和未成年人的所得稅，而僕人的雇傭數目就增多了不少。除非女工業已結婚，且其丈夫有職業，即不准辭退。有職業女子的數目，加增了百分之一一·二，而男子的數目加增了百分之二七·一。

政府的財政一時極為拮据，而成了經濟的重要問題。國稅之重頗足發生危險。政府因廣興土木以救時艱，致與預算不符，就不得不出賣官產，借用保險金，使國家銀行負債，而暫行彌補。德國的國外貿易久已獲利頗多，且成爲國內經濟力的後盾，但受了近來國家主義的國民經濟的影響，以致一落千丈。不但各國的關稅高壘，和時常發生的抵制德貨的糾紛，足以隨時使德國處於不利地位，而德國的馬克金價亦適足影響其他國外的市場。

德國的外債早已成爲嚴重的問題。在一九二九年，其外債爲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但至一九三三年則已減爲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外債之所以減少，自然不外局部的償還，和由國家銀行收回公債券；但其兩大債務國之貶低其金鎊和金元的價格，實爲其最大的原因。德國之忽然停止繳付外債，使各國對於德國的感情益行惡化，而國際貿易亦更受影響。國社黨使德國自給的經濟政策，使國內的貨物供給減少，而價格提高，於消費者大爲不利。設若德國對於世界的局勢繼續不變，則德國民衆的生活程度將處於不利之境了。

### 『領袖』的原則和勞工

希特勒自從事政治生活以來，即對於馬克斯主義工人聯合會（Marxist trade union）大不滿意。該聯合會在德國有組織的工人中，爲一最大的團體，其他的工人團體多係天主教性質，數目雖多，但無統制之權。希氏之反對馬克斯主義，當自他寓居維也納（Vienna）之日起。他於十七歲即至維也納城，並在該地從事藝術生涯。嗣後他爲生活所迫，就擔任普通工人工作。他先充當泥水匠，後又作建築畫圖工作。他漸漸對於馬克斯主義者的希望和技術加以批評，而對於工人在馬克斯主義上的忠心尤爲不滿。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述說他所以反對馬克斯主義的原因。他認爲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的原則，「是使民衆否認個人在人羣中的價值，且反對國家與民族的重要性；這適足以破毀了整個的人類的文化和生存的意義。」且馬克斯主義者「只知對於世界主義發生狂熱，把民衆的利益和國民經濟皆拋到九

霄雲外了。』馬克斯主義工人聯合會「完全成了政黨的利器，去煽動階級鬥爭，」而忘却了它本來是保護工人的社會利益和經濟生活的功用了。

希特勒的個人言論和政府的明令，都是以工人的利益為前提。而工人聯合會、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却聲明工人的利益從此犧牲了。至於德國的新勞工陣線（New Labor Front）之能否為工人謀較多的利益，吾人尚須拭目俟之。

希特勒充當總理後三個月的工夫，即下令解散一切工人聯合會的組織，佔領了他們的司令部，奪取了他們的經濟和保險的機關，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他們的領袖們所受的待遇，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所受的是一樣的殘酷。

各種職業界的工人和雇員，都加入這個新勞工陣線。在每個工廠或機關中都有一个團體。此種組織快要普遍全國了。各地方的勞工組織，都在國社黨各地分部的指導之下。這種組織，名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職業團體（National Socialist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s），簡稱為國社職團（N. S. B. O.）國社職團的各地分團所開始的工作頗為努力，甚至發生了很多的越軌行動。於是不久政府就不得不下令禁止一切非法的行動，但木已成舟，中途勒馬，頗非易事了。後來又復明令，凡一切越軌行動，都嚴加處罰。直至一九三三年終，這場風波才告一結束。

德國的新法令認為罷工和工廠停業，都是非法行為。工人聯合會既已解散，而聯合訂立合同的原則



和實行，亦自取消。新勞工法典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公布的，但到了五月一日才發生效力。該法典對於工人薪金，依然保持原狀。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德國的生活指數加增了三·二，至十月又加增了二·一。

這新勞工法典顯然是以國社黨的哲學和方針為根據而努力去調整雇主與工人間的關係。本法典規定國家的利益高出乎一切其他利益之上。他們反對勞工與雇主利益衝突的原則，而拿彼此利害相關的學說來代替。他們主張一切生產的勢力都是憂戚相關，大家應當彼此合作，以謀羣衆的利益。

關於新法令的題旨姑置之不論，只就其開端數段文字看來，對於工人就無多大的利益，茲錄之如下：

「在每個營業的機關中，主人就是該機關的領袖，一切用薪金雇來的工人都是跟從者。主人和工人必須要按照着機關的宗旨，彼此向前努力，務期達到國利民福而後已。」

「營業機關的領袖，有為其服從者決定本機關的一切事務之權，但其權限應受本法令的限制（包括薪金時間等等。）」

「領袖應當為他的跟從者謀利益，而跟從者既然是該營業機關中的店員，自當向領袖効忠。」（見 Act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Labor）

凡雇用二十人以上的營業機關，該機關的領袖就該由跟從者中選出個「信託議會」（Confidential Council）來，「去在該機關中加增彼此的信靠心。」一個議會的職責，就是「去協商加增工作效率率」。

一切方法，去執行機關中的各種規章，去提倡和執行工業上的各種安全方法，去增進機關與雇員及雇員與雇員間的關係，並促進機關中一切人員的幸福。』且『本議會必須調解本機關中的一切糾紛。』

在每年的三月間，領袖即將信託議會的會員名單提出，再經過該營業機關的國社職團承認，便交與從者投票表決。設若跟從者不贊成領袖所提出的名單時，就須由勞工信託人委派一切會員。凡一切有薪金的工人都有被選為會員之權。但按其規章，却有以下資格的限制：（一）須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二）在本機關內有一年以上的歷史；（三）有公民資格；（四）曾加入勞工陣線；（五）『具有種種德國的人道特性，並完全獻身於中央政府。』信託議會的會員，每在德國的勞工節（五月一日），便在跟從者的面前宣誓說：『要努力盡其職責，完全為本機關和國家謀利益，絲毫沒有自私的心。要在本機關的同人中以身作則，務使人人都能各盡其職。』

按照本法令的規定，在各區中委任了十三位勞工信託人。他們都是政府的官吏，而在勞工大臣的監督之下。他們重要的職責和權能是：（一）去監督信託議會和決定糾紛問題；（二）去任免信託人；（三）受理信託議會的上訴案件；（四）去駁斥領袖和機關的一切非法行動；（五）去監督法令；（六）與社會榮譽法庭合作；（七）把社會的進步情形報告政府。

勞工信託人可向顧問會請教。顧問會的會員是由各種職業界的專家所組成。有四分之三的會員是由勞工陣線所提出，而其餘的四分之一是由勞工信託人提出。領袖和信託議會在顧問會中的人是各佔

一半。信託人也可以委派一個專家委員會，以作他山之助。

這種組織再加上社會榮譽法庭，就更為完善了。無論領袖或跟從者都可以上訴於該法庭。地方法庭的主席，係由司法部所委任，而經過勞工部的同意。該地方營業機關，得有一位領袖和一位信託評議員在法庭中作陪審。本陪審官係先由勞工陣線選出，而後由法庭主席委任。

由上觀之，這種組織可以說是包含一切，而頗為詳盡。此社會榮譽法庭原為領袖和跟從者雙方所設。一切案件都要慎重處理，務使其公平而後已。民衆的利益是在領袖和跟從者之上的。政府的權力在在都高於一切。在政府的統治之下，雇主或雇工固然單獨的得不到自由；即雙方聯合起來，也不能逃出政府的拘束。國社黨這種組織的計劃，其將來有多大的成功，現時尚不敢預料。但就目下而言，雇主與工人的關係業已較前轉好。他們努力的改進，乃在剷除一切階級鬥爭的精神和策略。

### 增加農民階級的力量

提高全國農民的人口，乃是國社主義的基本政策。農民是一國的精英，一個民族的前途如何，全視其農民階級的情況而定。德國這種政策，不單保護農村經濟而已，尙有其他深意存於其中。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的新政府成立的宣言中，曾聲明「去拯救業已被蹂躪十四年之久的農民」——一個回到田園的運動。在希特勒的就職講演中，他說要犧牲一切，務使拯救農民的政策得以完成。希氏於四月間在農業

代表前講演，又復舊事重提，且更爲堅決和明顯，茲錄之如下：

『我把現在的個人經濟現狀和政治的轉變加以觀察以後，我就找到去維持我們民族的最重要的原素。本問題的先決方針，即在於救護農民階級。歷史告訴我們，國家即無城池，依然可以存在，但無農民，而國家還能存在者，却不多觀。如果一國有富強的農民階級，則國力必源源而來，於是國家的一切困難終必勝過，而那些致命的厄運亦必消逝。設若一個國家常以有力的農民階級爲基礎，則農民們必供給它一切維新的力量。任何政府如果忽略了這個重要的國基，勢必轉瞬即行傾覆。』（錄自The New Germany Desires Work and Peace, Pp. 27—28）

德國的農民實有日不聊生之勢。他們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出產品入款總數爲一〇，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入款總數，則降到六，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他們在一九三〇年的債務總數爲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每年所應付的債務利息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由此觀之，只就其負債的利息一項而論，其數已達其每年入款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了。

農業部長赫累達爾（Her Darro）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在他的指導之下，新經濟農會大見進步。本農會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已在政府登記。該農會予工業商業以一種極大的便利，因它把農產品的推銷和分配上的許多障礙除去了。它的總會是設在下薩克納（Lower Saxony）的一個古城中。農業部

長便是該會的領袖，他差不多有全權處理一切。

德國政府對於農民的經濟狀況努力協助，所以提高關稅，去保護一切農產品。希特勒尙未登上政治舞臺以前，國內所產的麥子，因關稅高壘之故，竟比芝加哥市場上的價碼高了兩三倍。這樣一來，農民雖然獲利，而消費者却要吃虧了。受關稅保護的農產品，有大麥、玉米、小麥、牛奶、黃油、酪餅、雞蛋、家畜的皮油、和菜蔬罐頭等。在麵粉廠中所用的原料，至少要用百分之九十七的國貨。因此就把農產品總售量的指數，提高到九〇·六。而該指數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僅爲八〇·九。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農產入款總數，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政府又用立法的手續，把種田的機器和肥料的價碼減低，農產肥料卡爾特公司把售價減去了百分之七，田地稅的總額減去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農民的債務亦大見減低。在布魯寧和馮巴本組閣之時，業已將利息率減低了百分之二，而以四年爲期。但現在却依然續降，差不多快要減到一半了。政府復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毅然成立了一件議案，要把一切債務減得與田地的生產力相等。這樣一來，政府就對抵押銀行大爲不利。國內利息差不多現在已減到百分之四·五，而國外的利息已減到百分之四。

最近又有一種立法案通過，凡祖上遺傳下來的田產，一概不准作債務的抵押。但現在業已抵押之款，已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多。於是政府就規定去發行一種公債票，好替他們清算，同時

也要債主表示讓步。

要想改進農民的狀況，必須施以農業的統制。要想使全國人民的食料無過剩或不足之慮，最好是使禾稼的生產量平均。只因爲農產品的價碼提高，而穀米的產量竟一時大增，超過了國內的需要。且其各種的出產品亦極不平均；例如菜油的產量最多，而國內的需要尚不及百分之一；再如羊毛，國內的消耗量尚不及百分之九；而煙葉的產量，則只能在國內銷售百分之三十。他們改正的方法，就是禾稼耕種的多少，務以國內需要的數量而定。

爲要使農民的生活安定起見，政府已公布了一種法律：凡家宅須由長子承繼，家庭管理權亦操在長子之手。抵押土地借款，已爲法律所不許；只有契約一項作債務的保證。這實在使放款的人大都不滿意。出售的禾稼，如滿了一百二十五公頃的田地之多，就必須由政府管理。於是政府的統制範圍就日益擴大，而農民的獨立權限，即漸歸於消滅了。農會除了支配一般普通的農業外，尚聯合森林、漁業、園藝、農村合作社等團體，而對於其出產和售銷等事宜加以干涉。這種聯合的組織就名之爲德國社會中的農業部分（*The Agricultural Section of German Society*）。這種組織的大用處，是在平定市價，禁止將田地抵押，而使一切都以國家利益爲前提。這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行爲，務使農業適合全國的利益，而在政府的統制之下。

## 使德國民衆的思想標準化

德國教育的最大的努力，就是要使全國民衆的思想都要國社黨化，而一致效忠於國家和政府。德國本以客觀的科學精神著名，但現在却一變而與法西斯的意國和共產黨的蘇聯爲伍，而完全成了主觀者，以爲只有德國人才稱得起世上的完人。

爲求國社黨的政府鞏固起見，便在內閣中設一宣傳部長，以啓迪全國的民衆。約瑟革培爾（Joseph Goebbels）在國社黨中實稱得起第三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宣傳方面，實在是富有天才。希特勒命他在宣傳方面，不要好高務遠，務要實事求是。所以希氏曾寫道：「一切的宣傳工作，必須要平民化，要使那知識最低的一般民衆能夠接受。……：……：其中心的目的，乃是使全國走上一個思想的系統，所以不應當過於高深，使民衆難以接受。」（錄自我的奮鬥第七十六頁）

要想把宣傳的宗旨達到民衆的腦海中，自然有一定的方法。希特勒不但對其學說加以發揮，即對於應用方面亦詳加說明。他說：「一般普通的民衆，都好像女人一樣。他們的思想行動不在理智的支配之下，乃完全受感情的左右。但他們的情感並不複雜，是很簡單，而且富於永久性。其作用亦甚單純，而往往都是走上兩極端；不是反就是正，不是愛就是恨，不是真就是假，而從來沒有既是此，而又是彼，彼此亂混的。」「宣傳的人口才既好，再加上一種像耶穌門徒一樣的品格，」就必更使人受感了。民衆的自主力是非常的羸弱。他們的「意志力和判斷力並不健全。」（錄自同上二百零二頁）

「民衆的集會是必需的。因爲他們從會中得到一種青年運動的意識，而對於社會團體留下一種深

刻的印象，這適足以使很多人得到鼓勵……萬衆一心的能力，深入每個到會者的心中。往往人們初加入民衆大會時，是躊躇不決的。但既經加入而後，則心地堅決；他覺得他已成了社會的一分子了。」（錄自我的奮鬥第二百零二頁至二百零三頁。）

於是希特勒和他的同志，就藉着這種團體集會，而作宣傳的工作，其成績是非常的大。那民衆最大的集會是國恥日（紀念凡爾賽條約）努連堡（Nuremberg）的騎兵總動員；國社黨的感恩日（多半爲農民）全國勞工日，全國競選等。

宣傳部部长復從事一種團體的組織，想藉這團體去操縱德國民衆的思想。這個團體就名爲「德國文化會」（The Reich Chamber of Culture）。該會分六部：音樂、創造的藝術、戲院、文學、出版、廣播電臺。凡關於國社黨的宣傳事宜，無論誰都必須強迫作一致的行動。凡一切對於民衆的宣傳，都必須先經過政府的修改和批准，而後方能施行。

該德國文化會的每部，都有權去支配其所轄範圍內的一切的機關和營業等等。它不但有政治的權，它更有法律權，去開張、封閉和處理種種的營業。德國的戲院就完全在其統制之下。德國的報紙因爲在這絕對的統制之下，以致變得非常的呆版，而失掉了民衆的歡迎。有一位著名的報界主筆稍加請求，即大受斥責。於是前者之在柏林的五十萬訂閱報紙的人，今竟停而不看了。馮巴本對於報界曾發表意見，認爲建設的批評當可容納。但國社黨對於他的言論，置若罔聞，依然進行着壓迫的政策。有很多外國的報紙和雜



誌都不准在德國境內銷售，希特勒絕對的主張，非把一切報紙完全放在國社黨的範圍之內不可。所以他說：『必須要下最大的決心，對這種民衆教育的工具施以統制，而使之有益於國家和政府。』（錄自同上第一百零九頁。）

教育部對於各種的宣傳品加以不少的改革。有的並不是什麼維新的東西，反回到了德意志的舊的帝國時代裏去了。但無論是新是舊，他們總以達到訓練民衆愛國爲目的。所以希特勒在我的奮鬥第十頁中曾說：『一個人只有藉着教育和學校的課程，去明瞭他本國的文化經濟，而特別是他祖國的偉大政治，他才真正的覺悟，他之得爲這樣偉大國家的一個國民，實在是應當引以自豪的。我只爲我所愛的而奮鬥，我只對我所敬重的而發生愛心，但要使我敬重，却非先有所明瞭不可。』

一切學校中的課程和書籍，都是以達到這種愛國的目的爲宗旨。他們自幼稚教育起，即用升國旗和歡呼希特勒等簡單的行動，去訓練兒童的愛國心。他們那尚武的精神，在校歌和軍歌中所表現的實在太多了。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在國社黨和民主政體未成立以前的作品。國社黨中之不主張用武力的黨員們，認爲只要把德國從歐戰後的窮困中拯救出來，他們就心滿意足了。至於因尚武而危及隣邦，則非其所願。他們對於學生和整個民族的身體健康，是非常的注意。至於其軍國主義，待後再加討論。

## 國社黨的婦女與青年

國社黨對於家庭的制度問題，是主張完全依照德國的舊日習慣。只有少數的男女和青年，對於這種主張表示反對。社會民主黨只因為對於家庭未加以保障，以致為國社黨所乘。至其他的政黨，對於家庭亦無若何的扶助，任一般淫蕩的戲劇、電影和文學把道德觀念軟化了。所以希特勒一看到「那些戲院、影院和舞場中的宣傳廣告」，就大斥為「都是些誨淫的媒介」。他主張必須把社會從「色慾的趨勢中拯救出來，而予以迎頭之痛擊。」

在希特勒的著作中，有些重要的地方，人們稱為「國社黨的聖經」。該書否認身心不健全的人生育子女；反對健康的人實行節制生育；對於造成小家庭的經濟情形加以攻擊。國社黨主張政府應常用最新的醫學方法，使那些有遺傳病的人不要生育，但使那些健康的婦女多多的生育。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一種禁止生育的法規見諸實行。於是「改良人種法庭」亦繼之而設。在該法庭中，設一位庭長，一位衛生官，和一位醫生。其工作專以研究遺傳性和衛生為職責。凡一切有遺傳性疾病人，都在本法的支配之下。其所規定的禁止生育之病症：為先天的智力不足，精神錯亂，先天的癩痢症，盲啞，生理上的畸形，和因酒癮而中毒等等。這種法庭的聽審，完全是保守秘密的。如遇兩造有何洩漏風聲之處，則處以重罰。

在這種法規之後，尚附帶着一種說明：本法規係指重要的遺傳病而言，至於輕微的精神病和遺傳症，則不在其列。又對於阻止生育的手術加以解釋說：「這種手術，完全是與人無害的，它對於男女雙方的身

體和性交的快感，並無任何的傷損之處。」犯罪的人亦列在本法的範圍以內，不過只限於犯姦淫和搶劫者；但非犯法至三次以上，則不施以割除生育機能的手術。

國社黨雖然對於身心不健全的人限制生育，但德國的人口却必須加增。國社黨黨員認為那些身心健康的人的家庭，至少要有四個小孩方算合格。只有這樣，德國的人口方有增加的可能。他們認為在城市的口口的減少，實足令人驚異。所以必須在國內提倡早婚，且予早婚者以種種的便利。

自從歐戰以後，有很多的女子因無錢不能出嫁，因為按照着德國的風俗，凡女子出嫁必須用大筆款項去購辦妝奩。於是政府就預備了一千馬克，專借給每個結婚的女子。這種一千馬克的借款，是不取利息的，只每月償還百分之一。如遇新娘連生貴子，則該款的償還日期即行縮短；因為每生一子，即將該款取消四分之一。凡未結婚的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必須課以獨身稅，並拿這種稅的收入，去充作新娘的結婚資金。新娘從這筆款下，每歲所借到的數目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他們復採用集團結婚的方法，藉以減省經費。在一個禮拜堂中，每次往往有數十對舉行婚禮。於一九三四年的春季，在普魯士的三十六個大城中的兒童生產的數目，共為九，九五四。這與一九三三年的生產率相較，已增加了百分之二三·四。而結婚率則增加了百分之五二·五。因為對於男子的職業問題加以注意，而女子的職業問題就大受影響。女子既在職業上發生了困難，就不得不走向家庭之途。這適足以使獨身的婦女放棄了不結婚的主張。且女子之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亦受了限制。限定將來到大學肄業的女生，只佔大學生的百分之十。

德國的婦女對於這種限制，竟無甚為難之處。因為所謂女性主義和婦女解放運動者在德國的婦女中，尚算不得什麼時髦。所以她們對於國社黨的婦女論調，不但不發生反感，反表示贊同。「婦女的職責就在家庭」原來是德國社會的習慣。美國紐約時報的柏林通訊員鄂圖塔里司他（Otto Tolischius）曾把國社黨婦女聯合會的領袖的言論錄之如下：「威馬政府（德意志民國）雖以政權賜予德國婦女，但並未獲得她們的歡心……於是國家社會主義即繼之而起，去拯民衆於水火之中。雖然有很多的婦女認為國社黨的舉動是有點粗野，但與往昔相比實較合於婦女的心理，因這能使婦女走向她們的真正工作。其真正的工作為何？即家庭是家庭實為社會的基礎。」

夫勞賽彼爾（Frau Schöberl）認為母親的責任乃是女子最高的天職，且謂：「婦女本是一國文化的看護人。她藉着仙人故事、傳奇、戲曲和風俗，把這些文化灌輸在小孩的心中。於是這文化即造成小孩對於國家和種族的終身態度。國家社會主義實在是德國婦女的救星。國社主義絕不是對於婦女有何摧殘，乃是使她們得到最高的發展。」塔里司他亦曾說：「女人對於國社黨的婦女計劃，較之男子更為熱心。」兒童的教養，並不只限於家庭和學校之中，政黨亦負起了重要的責任。其訓練之期，約自童年直至十八歲。國社黨訓練兒童的直接工具，就是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Jugend）。本團團員是男女兼收。它除了招收自己的團員外，更有權解散或合併其他的團體。國社黨對於青年訓練的目標，就是要養成他們身體上和道德上的魄力。這種訓練的目標，雖帶些軍國主義的精神，但現在尚未公然的加以注意。

希特勒青年團的訓練，大部分是郊外步行和禮拜日的露營。其最大的努力是在養成青年的勇氣、忍耐和意志力。其最高的目的，則在使青年遵守紀律，和養成犧牲的精神。有很多的家庭，自然覺得兒童出外受訓練，減輕了家中不少的麻煩。但也有很多的家庭，認為因着受訓練，把兒童的光陰都佔去了。加入青年團的兒童，每禮拜除了六天在學校讀書外，還有兩次的特別訓練，而於禮拜日又去宿營，差不多沒有多大的機會到家中去了。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教育部就將學校的課程減少，而每禮拜只有五天，並將青年團的訓練，改到禮拜六和禮拜五的晚上。這樣一來，兒童就可以每到禮拜日回家去了。

德國青年的運動，因為缺乏了素有訓練和才能的領袖，以致大為不利。好的領袖自能予兒童以忠心和熱情；而壞的領袖，反給兒童以不良的影響。女孩的訓練程序，自與男孩不同；當局雖然注意她們的體育，更希望體育和她們的身體性情相合。這種政黨對於兒童的訓練，在德國並不是創舉。自從歐戰告終，共產黨和社會黨就早已實行了。而基督教和天主教有見於反宗教勢力的日益擴大，也從事組織青年，施以宗教的訓練。

當國社黨初起之時，它抓住了大學生的心理，以致一般大學生如醉如狂地擁護它。他們那一時的愛國熱情，把歐戰後的厭惡戰爭的心理又推翻了。於是在一九三三年，便把一般思想自由，而態度和平，和信仰國際主義的教授都趕跑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司法委員會在政治經濟教授會上聲明說：「凡贊成國社主義的德國奮鬥者，必須整個的對於國社主義的哲學加以承認。」

## 社會保護的制度

德國在國社黨以前，就早已有了種種的社會保護制度。追溯其起源，當自俾斯麥時始。這位大政治家，看見了社會主義正在方興未艾，即思設法救濟。於是就用種種的立法案，去救護工人的疾病、意外危險、年老和失業等等。其成績日益昭著，竟成了世界之冠。及至共和國肇興，對於這種種的社會保險工作，不但一仍其舊，反加以擴充；且較諸原先更爲負責。即以工人的住處而論，已比昔日大爲改進了。歐戰後的失業恐慌，促進了社會保險的制度。除了政府的資助而外，復加增了已得職業的人的稅率負擔，藉以保護失業工人。於是無數的失業工人，就得到了不少的社會保障。

當國社黨崛起之際，就對工人應許，要減低他們失業的人數。他們用每個人都要捐助的方法，得到了數萬萬馬克的鉅款，復將此款用公平的方法分給失業的人。國社黨將工人聯合會解散，而將其社會保險的特長應用於新的勞工陣綫中。但此事至今尚無若何重大的改變。然按照國社黨的計劃，却想要把老年和保護母親與兒童的制度，加以擴大。據德國人的一般經驗和現狀而論，將來的社會保護制度，必有有增無減的趨勢。

## 宗教與種族主義

國社黨的黨綱第二十四條聲明：「國社黨對於正確的基督教加以贊助。」無論本條的規定作何解釋，國社黨的行動却引起了宗教上不少的糾紛問題。有的問題固然易於解決，但有的問題却很難處理。自從希特勒把許多邦的獨立行政權取消後，於是二十八個國家的基督教會就無所歸依。他們不得不立刻組織全國教會協會，以資維持。這種全國協會，本來是宗教領袖所久已渴望的一種組織，不過那時不能實現而已。現在竟藉此機會而得組成，實避免了不少的糾紛。

自從這種教會的新組織產生後，便引起一個新的問題。這問題就是，本組織將採用主教制呢？還是民主制呢？教會中的兩派，對於本問題意見雖然紛歧，但不久就走上了妥協之路。教會中的國社派，願意採用國社黨的「領袖」原則。但另一派，則為教會的靈性生活計，深恐受了政治的影響。至終就由兩造表決，採用了主教制。於是關於組織問題的一場風波，就暫告平息了。

由國社黨中又激起了兩個最大的問題：一個就是採用國社黨主義的問題；一個就是那種族主義的信條（Credo of Racism）因這兩個問題，就使教會中的兩派發生了很大的紛爭。有一部分基督徒，因受了國社黨的宣傳，就另行組織團體，而呼自己為「日耳曼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這些人多半是信義宗教會的基督徒，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國社黨的言論。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竟決志要使教會變成了國社黨的奴隸。他們的人數日益增加，至終他們在基督徒競選方面佔了多數。所以在全國主教選舉的時候，他們便大獲勝利。國社黨的一切出版機關和播音電臺，都為他們作了宣傳的利器。那時日耳曼基

督徒的候選人爲謨爾 (Miller) 希特勒會對之大加讚許。

當謨爾被選爲全國的主教以後，即置教會憲法於不顧，而任意爲他自己的勢力廣置黨羽。凡和他意見不合的牧師，即加以開除。於是有數千宣教師便組成了牧師的緊急聯盟 (Pastors' Emergency League) 一方面對於全國主教加以反抗，一方面對於其同工施以保護。

只因爲國社黨要把那亞利安人的種族主義 (Aryan Racial Doctrine) 引用到教會的行政中，以致教會中的黨派愈行惡化。按亞利安人的種族主義的原則所規定，凡其祖父母非屬於亞利安血統者，即應另作別論。這種原則不但應用在教會牧師的身上，且亦援引到一般平信徒之在教會中擔任職務者的身上。於是一般著名的主教、牧師和學者們都羣起加以非難，因爲這種種族的偏見，實與教會的法則和世界一家的福音不合。他們不但要非難，而且拒絕施行。

國社黨把亞利安人的種族主義的解釋，高舉到科學的範圍中。其實這不過是一種種族偏見和唯我獨尊的醜態的表現而已。他們的科學解釋是：人們只有絕對効忠於種族自豪的本能和情緒，才能使一個民族得到奮進的能力，而對於整個的人類有所貢獻。要想研究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操縱時代的能力，必須要追本求源，甚至超過了歷史的記載，而深入於其傳說與神話之中。有一個國社黨的領袖曾加以解釋說：「國家社會主義是主張政府只能在一個民族的統制之下，才能勵精圖治，而臻於完善之境。所以去改良和保持一個純潔的種族，是政府的第一天職。」我們若把這種族主義說得合乎邏輯一點，就是去保持



一個純潔種族的來源，而不使它和其他種族的血統及文化混合。德國的負責人對於其種族的大言不慚，實引起了全世界的嘲笑。

一事未平，而一波又起。全德國天主教竟和國社黨訂約，把一切的基督徒青年團體都歸併在希特勒青年團中，以致每禮拜要受兩天的訓練，而每月又要受兩個禮拜日的訓練。這適足以把兒童的餘暇時間完全佔去，而使他們和家庭割絕了。關乎兒童的體育訓練以及參加露營之權，都交在國社黨之手。

因為意見的紛歧，一九三四年的春季，就發生了不可救藥的教派的分裂。福音承認會（The Synod of the Gospel Confession）於是年的六月，在巴門（Barmen）正式成立，而與全國天主教完全脫離了關係。本會的行政會議的主要人物，有巴威和浮特柏格（Wurttemberg）的主教，以及德國各教會中著名的牧師、學者和信徒等。

尼姆爾（Niemöller）是柏林的一個大教會的牧師，被全國天主教謾爾開除了。但他毫不介意，依然繼續着宣道的工作。每當禮拜日他在教堂中講道的時候，會堂的聽衆擁擠不堪。聽衆都一靈相感，而心心相印。政府雖然聰明，實亦無法可施。當尼姆爾牧師一收到開除命令時，他即刻到總會去，告訴他的上級人員說：他過去只有一次曾違犯過命令，再加這次便是第二次了。他們加諸他身上的罪名，就是他不是一個好德國國民。這就是國社黨對於反動分子所慣用的罪狀；但現在竟加諸尼姆爾之身，實有點名不符實。

但自尼謾爾作全國天主教以來，尚有一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這功績就是在各學校中又恢復宗教教

育的課程，復使德國趨向那日耳曼民族所最愛的詩歌、尊榮、忠誠、紀律、愛國、愛家、和俠義之風，以及良風善俗等等。

德國改良教會的會友約有十萬人。此外還有很小的一個宗派，主張將舊約取消。尼謨爾對之大加譴責，甚至斥為異端邪說。在這兩派中的牧師，約有一千人，而在新教徒會中的牧師則有一萬八千人。在牧師的緊急聯盟中的人數約有六千。在這一切教牧中，未受全國主教委任的，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數。希特勒的勢力達不到他們的中間。那出而調停的代表，因為調停不利，也就辭職了。而希特勒却堅持，必須把國社黨的主義貫徹在教會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尼謨爾實在有些騎虎難下了。福音承認會中的領袖和會友，人數既然衆多，其勢力又很浩大，以言推翻，實覺不易。如想藉武力去施以壓迫，又恐徒勞無功，增加幾個殉道者而已。

國社黨與天主教的糾紛，雖是很尖銳化，但不如基督教的錯綜複雜。教皇之權高於一切，內部既無紛爭，外侮自然不易。合全國的天主教的力量，而與國社黨的種族主義相角逐，實成了希特勒的勁敵。德國的高級主教們，竟公然斥之為異端邪說，而教皇亦曾發表意見說：『凡加入國社黨的，都不是好天主教徒。』在國社黨掌權的初年，天主教與政府曾訂立條約，但現在雙方的惡感却與日俱增。天主教絕對的主張，要對天主教的兒童施以宗教教育。教會的宣教與行政之權，絕對不准政治加以干涉。

天主教青年團的問題只好暫擱，因為一切交涉都歸失敗。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社黨的軍人之

侮辱神父，和希特勒青年團的虐待天主教的青年人，都在在成了交涉的問題。天主教的職工大會，因受了國社黨的暴動干涉，以致閉會。有些天主教堂的職員，因為反對政府，以致被捕。幸經過審判之後，而下獄的尚為數不多。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天主教的一位領袖克勞斯爾（Krauser）不幸被殺，在維也納的天主教教長，也被奧國的國社黨員所殺。這兩件案子，因交涉的不利，業已走上停頓的狀態。

首當國社黨種族主義的攻擊的，就是猶太人。但猶太人所以大受攻擊的原因，究竟在那裏？這實在是應當研究的一個問題。查德國的人口約有六千萬，而猶太人的數目就佔了六十萬。且這六十萬人都集中在大城之中，覺得人數愈見增多。他們既然久居城中，就把城市的幾種職業都壟斷了，即以柏林的律師和醫師的職業而論，為猶太人所佔據的已有一半以上。而在戰爭時他們也時常藉戰爭而漁利。

在歐戰時，德國的經濟發生了恐慌，而猶太人即利用從外國輸來的款項，去用賤價收買德國人的住宅、公寓和工廠等等。德國的貨幣濫發政策，使中產階級受了莫大的影響，而猶太人亦實不得辭其咎。那為國社黨所憎惡的馬克斯主義的創始者，也是一個猶太人。在馬克斯主義黨中的領袖，有很多也是猶太人。而共產黨中的主要人物，却差不多都是猶太人。在德國經濟恐慌時，猶太人的營業能力究竟比德國人高。有很多愚妄的猶太人竟在德國人面前誇耀其金錢勢力。這足以使那久已懷恨的德國人對之更加深惡而嫉視的。

在戲場中、文壇上和電影院內，猶太人也大佔勢力。華爾忒李浦曼（*Walter Lipmann*）在他所著的

倫理學的導言 (Preface to Morals) 中曾說：『近代的文明好像酸質，慢慢兒把古代的文化蠶食殆盡了。』猶太人的確在德國已慢慢兒蠶食起來了。他們蠶食其政府，蠶食其教會，蠶食其家庭，並蠶食整個德國舊有的思想。

他們對於猶太人所聲明的罪狀，雖不無根據之處；但未免太捕風捉影，或過甚其詞。且他們所受的懲罰，也實在過於嚴酷。猶太人在德國的人數，與全國人口相比不過百分之一，而德國人傾全國野蠻武力以與周旋；所以他們要求自衛，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希特勒既自爲總理，自應防患於未然。然他不但加以阻止，反向其僚屬恣意慫恿。於是這場猶太人的大禍，即如太平洋潮水般的洶湧而來，而猶太人遂遭受了毒打和暗殺之苦。『把猶太人殺盡滅絕』的口號，已成了全國各地的談話，歌謠和文壇的家常便飯了。外國報紙的記載，雖不免有誇大之處，然按某外國領事的報告，只在他的轄境以內，就有七十件猶太人的案件發生。受此次排猶運動的慘無人道的虐待者，自不下數百人，而被殺者亦有數十。然經過此次的大暴動，而猶太人之被害者尙屬不多，亦云幸矣。

這種排猶政策尙不止此，它亦將所有職業包括在內，凡在德國境內的一切大小的政府職位，都不准猶太人佔據。一切教書的和法庭上的職業，也都在禁令之中。猶太人在大學和高中裏讀書的學生數目，亦受限制；其限制的數目爲全校人數的百分之一，和其人數與全國人口的比例數相等。普通一般猶太人，多半沒有選舉權。國社黨和政府，都努力把猶太人擯諸職業之外。政府復以身作則，去提倡不買猶太人的貨

物。凡猶太人之在文字界中充任主筆的，都被取消。電影院和戲場中的猶太人早已絕跡。他們對於猶太人予以研究學問的職業，還算破例的優待，但只准其佔全國的人數的百分之一。至這種嚴格的條件，也有例外的優待辦法。凡曾在德國軍隊中効力的猶太人，以及曾擔任其他足以引起注意的服務者，則不受本條例的拘束。在柏林的猶太律師，有一半為政府所開除，但不久都回復原職了。

從各方面的局勢看來，這種暴動將日漸消沉。有很多外國人，因不滿意於德國的這種蠻橫，起而不買德貨。於是很多的德國營業，就不得不想救濟之法。至一部分注意道德的人，也對於這種無理性的舉動表示不滿。真理自在天壤，公道未可埋沒。從各方面的觀察，這種非理性的蠻動，必不能持久。其沒落之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然而世界各國起而反對國社黨的猶太人，也未免太薄於理智而富於感情了。他們這種以暴易暴的舉動，適足以加增德國人恨惡猶太人的心理，把糾紛的時期來延長了。在世界各國有很多著名的猶太人，都認為如別國的猶太人不起反動，則此風潮必更易解決。

雖然多數猶太人的小本營業還能敷衍一時，但其全民族的經濟生活，實已零亂不堪了。其在精神方面所受的壓迫，更令人難以忍受。然而猶太人的確對於德國有深深愛戀之情。他們之中實在有很多人，寧願在德國犧牲，却不肯離德而他往，這實在更使他們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如果他們離開德國，將何所歸依呢？他們之中有數千人，在知識方面頗有造就，尚可寄身他邦。但六十萬民衆將到那裏去呢？在波蘭邊境雖然尚可容身，但生活實痛苦不堪，無人肯往。餘如帕勒斯丁每年只能收容一萬猶太人，而十年的工夫也

不過收容十萬人。

有一位青年猶太人，年方二十歲，曾說了以下令人可憐的話：『如果我的民族迫於不得已而離開德國時，我一定要作最後離國的一人。我的家庭住在德國，已有二百五十年之久。我生於歐戰時，有二兄皆開往前綫作戰，一戰死，一受傷，而終生成了殘廢。我們累世所蓄積的財產，在德國貨幣貶價之時，業已損失淨盡，幸賴小木營業尚可維持生活。雖然我的小木營業也或者因受了摧殘而倒閉，但我却總能找着一條生路。我雖然被迫而離開了我那自幼玩耍的街道，然而我這二十年的快樂回憶却不能忘記。柏林實在是個美麗的城市，而四郊的風景則更令人神往。我的祖先皆卜葬於此。我最低的希望便是死在此地。』

### 德國爲何整軍？

除德國的排猶運動而外，其引起世界各國之最大注意者，即爲其軍國主義。歐洲自來就是一個火藥庫，危機四伏，無論何時，都有一觸即發之勢。然國際和平的運動，則依然有人提倡。軍縮問題，曾在目內瓦作了不少的周旋。然至終都爲那些野心的軍國主義者所破壞。

國際和平雖一時高唱入雲，然德國的國社黨却毅然走入了軍國主義國社黨的領袖們雖然窮兵黷武，但一般民衆則尙無多大表示。以多半民衆的觀點而論，他們都不願意最後訴之於戰爭。那最足以證明最後的和平尙露一線的曙光的，即武裝的國社青年說：『如我們得與法國的青年聚首一堂，而交換意見，

則儘可以想出和解的方法，而不至於彼此殘殺。」威廉泰倫（William Telling）曾在倫敦時報發表了一篇公正的言論說：

「以云德國的一般工人和中等階級的官吏，都有作戰的決心，我實在不敢置信。那一般青年的國社黨員，都傾向於社會主義；至於歐戰前的好勇鬥爭之心，則不多觀。他們的主要的目的，就在把這數年來雜亂無章的國家，重加整理。」

然無論如何，德國人總免不了有一種危險的心理作用。而這種心理作用，早晚必成事實。只要略加煽動，它就容易演成流血的慘案。推其究竟的原因與醫治之法，自不外一種民族文化的問題。要想解除國際糾紛，非根本從事文化的建設不可。如欲對於這種心理作用作根本的明瞭，我們必須對於凡爾賽條約加以研究。所謂凡爾賽條約者，是一種「勝者王侯，敗者囚」的單面契約。而這種單面條約，竟又作了國聯盟約的基礎。

歐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終止。戰爭雖止，而糾紛猶在。其善後的辦法，唯有三點：第一就是德國人所要的和平。如歐戰為同盟國戰勝時，則德國即執和平會議的牛耳，而為所欲為。那和平條約對於協約諸國的殘酷，將較之凡爾賽條約加之於德國者，更甚百倍矣。如諸君不信時，請看德國強迫俄國所結的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基（Brest-Litovsk）條約，即昭然若揭了。

第二種辦法就是互相和解。這就是美國大總統威爾遜的中心努力點。他匹馬單刀，親至凡爾賽，甚至

以後把生命都犧牲掉了。但威爾遜對於國聯的原意，乃是要使它成爲一種大公無私，而真能解決國際糾紛的機關。可惜他這種意念，早已爲那狡猾的外交家克雷孟梭（Clemenceau）所洞悉，於是他便大施其自私的外交手腕，而向威爾遜提出了現在的國聯盟約。法國就假此盟約爲名，而收一切戰勝之利。這種和平，實在是戰勝國的單面和平，它的基礎並不以平等爲原則，乃是用武力把那多年的國際糾紛假自私自利的手段解決的。

第三種業已實行的方法，就是這凡爾賽條約，根據國聯盟約的規定，凡一切受壓迫和不滿意的國家，都可向國聯申訴。這種辦法是一般夢想國際和平的人所久已渴望的。現在國聯已設，而那些戰敗國和不滿意的戰勝國，也都派代表出席國聯了。但國聯依然國聯，而工作却毫無進展。其故究安在呢？因爲歐洲的政局，唯武力的馬首是瞻。至於弱小國家，既無武力作後盾，欲求其有效，事實有所不能。

威爾遜總統協同英國的屬國與美洲的諸國，復得了歐洲諸小國之助，才建議不但迫戰敗國應當縮軍，即戰勝國亦當同樣的減縮軍備。但這種建議，除了在凡爾賽條約上加上一筆「注意」軍縮的報告外，別無其他成功。一直把德國的軍備減到無能爲力之地，才准它加入國聯充當會員，而戰勝國則不但不減，反而日益增加。自歐戰而後直到現在，已將近二十年的工夫，德國的周圍的強鄰如法國等，其空軍的設備蒸蒸日上，甚至在四十八時內，就可把德國的工業完全毀壞。德國處此空軍的威迫之下，雖欲有所自衛，然爲條約所不許，只有坐以待斃而已。



此外更有賠款的威迫，魯爾的被佔，殖民地的喪失，上西利喜阿（Upper Silesia）的公民票決，以及德國人民所受的種種壓迫，遂使德國人捲入了國家主義的狂潮，而產生出像希特勒那樣的專制魔王。他已經使德國退出了軍縮會議，更引領德國退出了國聯。他認為如國聯不把戰勝國的利益從盟約中除去，則德國就永無加入國聯之一日。它必須增加軍備，藉以自衛。這種新的政策，實得到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擁護。

### 紛擾不清的外交

因為德國的復興，全世界都受影響。業已屈服的德國，今竟一躍而起。久已絕望的民衆，今竟死灰復燃。協約諸國想用賠款的手段，阻止國社黨的復興，而其結果竟適得其反。如果沒有國社黨的鼓吹，這種國家主義的狂潮，恐也不能激起。如果沒有歐洲列強的軍備競爭，則國社黨尚不至如此的窮兵黷武。

殖民地問題，是德國大抱不平的原因之一。按照着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十四條中之第五條的規定：一切殖民地的分配，必須詳加研究，而大公無私。然而當德國代表去簽訂凡爾賽條約時，則其一切的殖民地都不翼而飛了。如協約諸國肯自動的將殖民地交回德國，則德國人的怒氣自必大為降低。

德國和波蘭邊界的糾紛由來已久。到底其邊界應劃分到什麼地方，恐怕除上帝而外，無人能知。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之互相驅逐於埃爾培（Elbe）和維斯杜拉（Vistula）之間，已有數世紀之久。按照歷史與地理而言，波蘭人對於科雷特爾（Corridor）的要求，似較有根據。因為科雷特爾省的古名為波美爾

資 (Pomerz) 此名即係波蘭名字，且根據波蘭和德國的地圖與統計。在該地的居民，以波蘭人爲最多。

利雷特爾之隸屬於德國的版圖，係自大啡特烈 (Frederick the Great) 始。大啡特烈於十八世紀，聯同奧俄兩國瓜分波蘭；於是該地即受了德國的統治。如以時日計算，此地歸於德國時，尙在美國獨立之前。然即在今後的國際間，武力依然是公理。勝者王侯，敗者囚。只看誰打過誰，就是誰的。

然而自從希特勒一躍而爲總理之後，他便公開的聲明，科雷特爾實不值得德國人抹馬利兵爲之一戰。在柏林大學有一位歷史教授，認爲德國人之與希氏表同情者，約有百分之九十。自從國社黨執政以來，德波間的國際關係，實在改進了不少。至終他們就訂定十年的不侵犯條約。在這條約中尙附帶着，凡學校的課程中有與兩國的親善不利之處，都完全取消。這實在和兩國的關係大有裨益。因爲德國人從來就看波蘭人爲退化的民族，且認爲侵佔其土地是應當的事。

我們現在再看一看德法兩國的關係，就覺得愁雲瀰漫，實在找不到一條出路。德法本爲世仇，法國在過去的百年內，即受了德國四次的攻擊。有兩次是因拿破崙被德國驅逐出境，而復侵入法國。第三次的戰爭是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這次戰爭實因法王受了俾斯麥之愚，竟糊裏糊塗地宣戰了。自然這第四次戰爭即是歐戰。我們再看一看希特勒的話，就知道兩國的關係實在難以調停。他在我的奮鬥第二百九十一頁中曾說：

「德法之糾紛，由來已久，然究其原因，則禍端之發，肇自法國，而德國不過以自衛手段對待而已。如此

而言和平，則和平終不可期。且世世代代，德國都是被迫而一步一步的後退。自今而後，德國如欲圖生存，自不當再從事自衛的等待；必須萬衆一心，從法國找到一個最後的解決。我們到底能否達到一種最後的解決，實在是一個問題。」

希特勒因職責有關，就進一步向法國表示：只要法國肯把薩爾流域歸還德國，則德法之間的和平即能成功。法國知道如一不慎，則德國即成勁敵；所以就努力壓制德國的軍備，使之罹於萬劫不復之地。於是這兩國間的僵局，便成了整個歐洲和全世界的生死關頭。在此騎虎難下的情形之下，最好的辦法，只有第三國家出而努力調停。這實在是英美兩國的責任。

關於德奧的問題，希特勒自幼即認為兩國既同係日耳曼民族，自應合爲一國。所以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說：「奧國的日耳曼族，應當回復到它的德意志祖國。這乃是同種同族的自然趨勢，並非由於經濟條件使然。……即這種結合與實際情形無甚裨益，或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非結合不可。蓋因同血統的民族，自當隸屬於同一政府之下。……」

在歐戰以後，國社黨未興起以前，只要德國肯予奧國以行政自主之權，則奧國即有過半數的民衆願意加入德國聯邦。只因受了凡爾賽條約的拘束，以及法意等列強的干涉，以致不能實現。但現在竟因國社黨的積極行動，使奧國百分之六十的民衆發生了反感，而合併問題乃成懸案。

國社黨與奧國人同謀，以致將奧國的獨裁總理刺死。這不但引起了全歐洲的反感，而莫索里尼與希

特勒亦因之而發生了意見。本暗殺案無論是否由於希氏的主使，但他既身為總理，而又掌獨裁之權，則職責所在，自不應辭其咎。

## 第四章 經濟復興的美利堅

### 引言

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無論有什麼轉變的傾向，然而要具體地給它下一個定義，就不是容易的事。即勉強地替它起上一個名字，也恐不很恰當。因為美國的情形與蘇俄、意大利和德國大不相同。在美國沒有一個政黨是有具體的黨綱，清析的哲學和一定的政策。即以一九三二年民主黨在芝加哥發表的言論來看，也沒有什麼明確的東西。羅斯福競選時的演講，雖有一線的曙光，但其言詞既很渺茫，而用意亦頗複雜；究其內容，則都是無可無不可的表示。如斯大林、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等的絕對的主張，實一無所有。在一九三二年的總統競選上，共和黨的失敗，和民主黨的成功，固然是意中事。因為經濟的條件，使之不得不出於此途。民衆受經濟恐慌的壓迫，業已四年。一切酸甜苦辣，都載在袖珍日記中。窮極思通，實非偶然的事。

美國的國家入款，差不多減去了一半。民衆的收入，差不多損失了四分之一。失業的工人，約有一千二百萬。存戶因受了銀行業不景氣的影響，有五十萬萬的金元無法提出。城市不動產的押款，約有三百五十萬萬金元之多，而農民的負債亦有十二萬萬金元。於是民怨沸騰，而哀鴻遍野。再加上政府的稅率日益繁

重，使人民更不能聊生，因不能納稅而受罰者，亦所在多有。有的則棄家蕩產，營業倒閉。再加上社會上和信  
用上的喪失，而整個的經濟機構即破碎無餘了。

全國民衆的這種驚惶失措的心理，使他們在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中不得有所表示。胡佛大總統可以說這是命運不佳，或者天公爲難。他在就職之初，就遇到經濟恐慌的厄運。一連四年，而日甚一日。他的政黨既不能領導上下兩議院，而民怨又復無法抑止，於是國家的大勢就非改變不可了。

這次的競選，羅斯福差不多得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數。美國大總統的就職演講，自一八六一年的林肯而後，最引起民衆之注意的，可以說就是羅斯福的這次演說。這實在是因爲民衆有迫於不得已的需要，而切願羅斯福用他的無限的行政之權，去挽回瀾於既倒，而拯民衆於水火之中。

羅斯福行政的最大目標有二。這兩種目標，在他尚未被舉爲候補總統時，就可以看得出來。再加上他的競選的演講，就更爲明顯了。這兩種目標是並駕齊趨的，茲簡述之如下：（一）促進經濟的復興，而使之趨於鞏固；（二）在美國的經濟制度中，建設永久的社會統制，將國家的收入，分配於一般平民中，務使公正平等。這兩種目標，在他的行政方案中，以及種種的立法手續上，都更詳細地羅列着。

### 一個局部的和社會性的聯合

美國的政治，不像共產黨、法西斯黨、和國社黨那樣，先破壞而後建設。舊的俄國帝制，早已破壞無餘。意

大利的皇室雖然尚存，其實不過爲法西斯黨掩飾門面而已。德國歐戰後的自由憲法，早已爲國社黨變成了獨裁的工具。至美國經濟復興的政策，則不但對於憲法無所異議，且連修改也少有提出。前者對於憲法雖提出了幾個不利的議案，但現在最高法院中則尚未解決。這幾個議案的原則，按院長的宣讀，可以列爲以下數端：（一）『公共的需要日見注意；』（二）『必須使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利益走上了協妥之路；』（三）『要利用社會的組織，使人民的利益和機會均等；』（四）『要用合理的方法，使經濟的機構達到了爲一般平民謀利益的目的。』這四條原則，很合乎羅斯福和他的同僚的口吻。

在蘇俄意大利和德國的一切立法權，差不多都由內閣用命令規定一切。至所謂全蘇維埃會議，也不過聆取少數執政者的報告而已。在莫索里尼治下的議院制度，早已等於虛文。而德國的衆議院，也只有唯希特勒的馬首是瞻。然而在美國的情形却大異於此。華盛頓的國會，雖然最近有一次因爲總統的權限過大，而有辭職的趨勢，但它的權限至今還是很大。每次的開會，動輒數月之久。各方面的辯論，還是滔滔不絕。至彼此反目，揮拳動武的事，仍是所在不鮮。

在德意與蘇聯的政黨，都是突然而起，掃蕩羣雄，稱霸一時的。在美國的民主黨，雖然把共和黨打倒而登上舞臺，然其所以能夠登上政治舞臺的原因，則非完全依賴政黨的力量，而由於時局的趨勢使然。因爲時勢的要求，民衆就離開共和黨，而走向民主黨。至其造成時勢的最大動力，還是由於各方面的經濟利益的共同趨勢而來。只因爲農民、工人、都市的失業者，以及知識階級的種種自由團體的利益要求，而羅斯福

遂得一躍而起。

然而羅斯福的困難，也實在不少。在民主黨中，南北兩派的領袖的經濟學說和主張既然不同，而進步黨員的意見亦復紛歧。經過了數次行政會議的折衝，在國會中才取得一致的行動。他們中間有很多人，認為僅謀經濟復興尚感不足，政府應有更進一步的表示。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和努力社會事業與宗教教育工作的人，則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向羅斯福總統請願，請其不顧一切自私自利的反對勢力，而向他的既定政策邁進。他們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幸，都是由於制度的不良而來。要想免除這社會的不幸，非從事救濟無數受害的民衆不可。

羅斯福總統顯然地對於這種請願發生了反應。所以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國會中曾說：『要顧全整個的民衆……在業已毀滅的組織之上，再去重新建造一種新的機構，藉以迎合近代的文化趨勢。』只因為他有這種改進的觀念，才得到了大多數選民的擁護。他之所以競選成功，是因為民衆對於他個人發生了信任的緣故。設若他不能成功，而使選民失望，則他的下臺即在意料之中。美國的政權完全操在選民之手。這也許是美國政治軟弱的一大原因；然而無論如何，尚不失民主國的精神。

### 經濟的實驗室

美國的經濟復興政策之最大的努力，是專注在經濟的改革方面。這種的經濟改革，影響了政治的原



則和個人的權利，引起了民衆的注意。其所及的經濟範圍，不外乎利益的盈餘，工人的薪金，和納稅及債務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經濟的分配和用途。這些經濟的復興者，盼望在已有的經濟制度中去實現他們的經濟政策。

羅斯福對於他的經濟政策，曾屢次加以聲明。在一九三〇年，他在他的著作中寫着說：『應當把經濟的組織重新加以改正。』『除去一切經濟的根本錯誤。』革命的潮流已把近代的生活改變了。『舊的制度業已崩潰，要想再開倒車，是完全辦不到的事。』他認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業已整個地瓦解，非從根本上重新加以改造不可。』他認為國民經濟的分配方法，應當『把工人的薪金提高，把資本的收入——特別是投機營業——減低。否則我們的不健全的經濟制度，必不能延長其壽命。』

羅氏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對國會曾發表了一個『國民經濟計劃』。在本計劃中，他言明何者應當保留，何者應當除去，茲節錄如下：

『總而言之，凡由近代社會所產生出來的一切重要有價值的東西，都要保留。凡社會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即我們不去打倒，它亦必自倒。我們所應當保留的，是機器的發明，機器的生產，工業的效率，交通的便利，和普及的教育……』

『我們所應當除去的，是那些不需要的工廠的擴展，自然財富之無意義的消耗，用自然的獨佔營業去剝削一般消費者，守財奴所積壘如山的錢財，童工，用別人的錢去作投機的買賣。』

李治柏格 (Richberg) 是政府中的一位要人。他曾代表政府參加紐約的商會，而發表言論說：「工廠的主人和經理們，必須使他們的工業社會化，且必須以國民福利為前提。否則政府對於私有工廠，便非加以統制不可。」

塔格萬爾 (Tagwell) 在他的著作中曾發表了以下的意見：「美國資本家的盈餘利益未免太大，非加以限制不可。因為資本家將這大量的盈餘拿去，不是供一己的使用，就是存儲銀行，而使銀行從中漁利。而那一股胼手胝足的工人，終日勤勞，生活依然不足，竟無人顧及……」美國的農業大臣也曾發表意見說：「商人的主要任務，並不是只去漁利。」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柏爾利 (Berle) 也曾說：「近代營業的宗旨，並不是只去漁利，乃是去協助一國民衆的生活和他們的發展。否則道德墮落，而國民經濟勢必破產。」

在這冗長的勞工經濟復興政策中，有一段話說：「工業對於工人則日益減薪，對於機器的設備則付之以重利。但工人既日受壓迫，而終至於失業，則機器雖多亦無用了。為謀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見，我們必須設法把這一切的危險除去。現在的工人，實無力去償付他們的年老和失業的保險費。至小本營業也無力去償付他們的火險費和竊盜險費了。我們的經濟復興政策就是要去給工人一種保障，使實業家把他們和資本看得一樣的重要。一切的失業和減薪等，不但使工人本身無保障，且對於整個的工業都發生了莫大的危險。」

關於經濟復興政策的理論已見於前。茲將政府的改革略分六大端列之如下：(一)政府業已使存戶對於銀行又發生了信用。且對於銀行的盈餘用途加以指導；(二)政府在各方努力，要對於經濟的制度加以監督；(三)政府對於負債者例外優待，而對於債主則施以拘束；(四)工人的地位業已加增提高；(五)農民的入款，亦已被提高，使它能與其費用相等；(六)用各種的方法，去使全國失業的民衆找到一條出路。

在美國各個生產和分配的機關中，都掛着全國工業復興運動的藍鷹標記(The Blue Eagle of N.R.A.)。在『公平競爭的法規』的施行之下，有二千四百萬人找到職業。這種法規，是由各種工業協同工人和消費者的顧問，合商而訂定，並將其合議的結果交政府批准。一經大總統批准以後，這法規就發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大總統認為本法規是『國會所議定的立法案之最重要的一種』。按本法規所應執行的職責有二：(一)務使失業的人得到工作；(二)去計劃一種長治久安的辦法。

政府因為努力要作全國經濟的復興運動，自然免不了侵入私人的經濟範圍。然而不但沒有引起了社會的反感，反而得到了社會的一致贊同。即那些工業商業與財政界的巨頭，亦表示歡迎。這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所有恢復社會繁榮的計劃都歸於失敗，所以不得不對於政府的扶助努力加以歡迎。美國商會對於全國經濟復興運動的立法案，是盡了十二分力量予以推動。而一般民衆則盼望政府對於工商業加以進一步的干涉。

於是美國的一切大營業，都努力向着全國工業復興運動邁進。芝加哥的報紙在一九三三年的秋天曾發表了一篇社論，說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就是一個革命的選舉，而芝加哥的文壇刊物上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在政府的經濟改革方針中，革命的色彩已顯然流露於外。羅大總統對於經濟計劃善後的用意，就是要使政府對於全國經濟制度加以統制，並奠定永遠鞏固的基礎。

這種全國工業復興運動，除了一部分非反對不可的人而外，差不多都加贊同。在它的法規之中，它對於最低的工作時間和薪金，都加以規定，且使之合理化。它對於童工加以禁止，而對於工人的集體契約，則勉強執行。凡一切祕密的減價、漲價、饋贈等之商業上的不公平行為，都加以禁止。

這種經濟政策的目的，是在對國民經濟重新予以分配。其分配之法自不一而足。其最顯而易見的，如工人之最低薪金的規定，以及扶助負債者的辦法。所以有人曾說過預言，謂羅斯福的政府，將成一個負債者的政府了。因為去救濟負債的人，政府自然要籌撥巨款，勢必引起一般人的怨言。然而政府的救濟方法却非常的公平，上自破產的商業巨子，下至無家可歸的流離小民，都是一視同仁。因為使金價降低，而把國內物價提高，所以一般有錢的人，也受一點相當的損失。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使人人滿意，是很難的。

要想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該對於進款大而承繼多的人加以重稅。凡超過一千萬金元的富翁，死後便課以百分之六十的稅。政府因為債臺高築，勢必被迫而採用以下的三種方法：（一）加課資本稅；（二）發行紙幣；（三）遇不得已時拒絕付債。

美國的這種經濟復興政策，無論如何的解說，都不會牽涉到共產主義方面去。除了二者都用「計劃經濟」一個名詞外，餘者都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這種全國工業復興運動，無論發展到若何的地步，共產黨決不承認這是他們共產主義的一種。因為共產黨對於經濟的立場，乃是要作整個經濟的主人。所以蘇俄自從一九一七年，就把一切都收歸國有。除了政府而外，別無雇主。工人除了被政府雇用而外，也別無雇用之人。工人聯合會對於政府的命令，絕對無權反抗。一切的消費者，都按照着政府的定價而購買貨物。蘇俄全國的經濟，都由蘇俄政府一手操縱。

羅斯福的經濟復興政策，頗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但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却拒之於千里以外。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在他們的週刊新領袖 (New Leader) 之中，對於經濟復興政策的基本原則的攻擊，不遺餘力。他們認為在經濟復興的政策中，只有田納西發利議案，可算是「經濟復興政策中之唯一的含有社會主義色彩者。但可惜這正好像一朵鮮花，生在亂草荒蕪的園中。而這些亂草，又被大公司的富商們用水澆灌得非常茂盛。」

美國的社會黨又對於經濟復興政策加以攻擊說：「對於社會制度不根本加以改革，而只求將其盈餘略加分配，聊以塞責，欲求社會的健全，是根本辦不到的事。如一個政府不根本負起改革之責，而處處討好於人，那就非腐化不可的……我們絕對不要一個政府在資本家的銀行中有很多的股票，而使守財奴從中漁利。我們是要將銀行歸社會公有。我們絕不要一種大而無當的經濟復興政策。我們所要的，乃是

把國民經濟歸社會公有，而使一切工業都在工人和消費者的管理之下，不是爲漁利，乃是爲實用。總而言之，我們所要的乃是社會主義，決不是津貼政策。（錄自諾曼多馬（Norman Thomas）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在新領袖中所發表的言論。）

如拿美國的經濟復興政策，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經濟主張，以及德國國社黨的經濟計劃相較，則三者尙有不少的相同之處。這三國政府都承認財產私有制。他們都是主張一切實業的目的，乃是爲國利民福，而非專謀私人的漁利。他們對於盈餘的原則雖不加以否認，但却努力加以限制。三國的政府都想用政治的力量，對工業商業加以干涉，使之走上計劃經濟的目的。但依然爲一切營業留下競爭的機會。美國的全國工業復興運動的法規，和意國的社團辦法及德國的會議制度，都有相同之處。總而言之，這三國都是要想造一種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使之對於全體的民衆有更大的貢獻。

### 勞工的戰略

美國之勞工與雇主的關係，極覺紛歧。所以在羅斯福施行經濟復興政策的前二年，頗感棘手。而這種糾紛，因了原因複雜和利益衝突的緣故，以致使這經濟復興的政策不得不慎重將事。

在經濟復興政策中之最堪注意的一點，就是要把全國的工人組織起來，而使之與雇主相抗，務求達到平等對立的原則，否則工人必致無力與雇主訂立集體契約，而那經濟復興政策上所載的，使營業利益

均沾的原則，就覺無法實現。現在政府的扶助下，工人的團結已向前推進。美國的工人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在一九二〇年，以納費的會員而論，有四，〇七八，七四〇人。但到了一九三三年，則納費的會員只有二，一二六，七九六人。及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則增至二，六〇八，〇一一人。如再把那些因失業而不能交會費的會員們計算在內，則共有五，六五〇，〇〇〇人。此經濟復興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三年內使工人聯合會得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會員。

勞工戰略的最要點，就是在尚未組織工會的區域中，把一切勞工都團結起來，直到現在，美國南方的大工業，如鋼鐵、汽車、油料、橡皮和紡織等，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起見，還是對於獨立的工會加以否認。他們堅持不與工會的代表訂立合同。按照全國工業復興運動的第七條所規定，是要一切工業都與工人訂立集體合同。本條款即稱之為「工人的特許狀」（Labor's Charter），茲將其條文錄下：

「工人有權組織工會，並選出代表去訂立集體合同。凡工會的組織、選舉代表、集體合同，以及種種的活動，都不准雇主加以干涉、拘束和壓迫。且不准雇主藉雇用工人的手段，而勉強工人加入公司聯合會，或禁止其加入工會。」

於是雇主們就努力組織公司聯合會，以與工人聯合會對抗。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就作了以下的聲明：「在美國的公民，凡事有自主之權，他可以選舉任何人，去作他的代表。他為維持個人的利益起見，可以延聘律師，作自己的辯護者。他可以隨便加入任何團體，且可以團員資格，去選舉任何代表。美國代表制度的

基本原則，就是多數制。所以無論是誰，只要得到大多數票，就有權作該團體的領袖。除此而外，別無善法。無論在工業或政治方面，必須各人負起各人的專責，而後工作方有進展。這早已成了美國民衆生活的原則，而爲全國所公認的。」

格林 (Mr. Green) 對於這些反對工人的雇主們大加斥責，認爲他們是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羣衆的生活。他發表了以下的言論說：

「公司聯合會本想破壞了工人的團體組織，和阻止他們的集體合同，但歸於失敗了。於是他們就提倡比例代表制，想分化工人的勢力。他們說，多數制是於少數人大爲不利的，所以每個團體都應當按照比例數去推舉代表，或去訂定合同。這種比例制不但分化了工人的聯合勢力，且各團體因利益的不同，勢必自起糾紛，而聯合的陣線就不打自倒了。所以工人聯合會必須堅持大多數的制度，再加以政府的監督，並萬衆一心地聯合起來，與雇主交涉。」

當工人與雇主的交涉失敗時，工人便努力的組織團體，選舉代表，以謀徹底地予以抵抗。這實在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勞工政策。自從公司聯合會拒絕了工人的集體合同，美國的聯邦主義者刊物 (American Federationist) 曾記載着說：「公司的經理之權，竟對於憲法和公司法都加以干涉。至其經理權的範圍，竟伸及到勞工的選舉代表以內……」

工人在工人聯合會的指導之下，便作進一步的要求。他們要求委派工人代表，直接參加全國工業復



與運動的執行工作。他們認為有法而不行，是紙上談兵，無補實際。所以法律的十分之九，是在乎執行的問題。

工人又要求，每禮拜只作五天工，而每天六小時，共合三十小時；且薪金依然不減。工人聯合會於一九三四年冬季，在舊金山召集大會，決定加以請求。凡一切的工人都贊成這種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工廠多雇用工人，這實在是救濟失業的一種良策。而反對者却認為，如果這樣，勢必使全國的消費量減低；且工廠的成本既大，而物價勢必騰貴，一般民衆將無力購買。於是消費的需要日益減低，而工廠亦必倒閉，同時工人又罹失業之苦了。

工人與雇主雙方相持不下，而最吃虧的便是那些消費的民衆。他們漸漸的發生了覺悟，並設法對於時局有所挽救。羅氏的經濟復興政策，早已對於他們加以注意，所以才規定設立消費者的董事部，而以顧問的地位自居。消費者的人數，比較工人和雇主要多得多。如能把他們組織起來，而加以監督，則他們操縱政治的力量，較諸二者都大。即在他們尚未組織起來時，他們就發現了他們的困難之所在，他們也能夠把任何的政黨打下臺去。所以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推翻了共和黨，而把民主黨捧上了舞臺。

工人和雇主的糾紛漸漸推展，而使政府慢慢兒走上進退唯谷的地位。雙方的爭執，彼此各不相讓，把政府鬧得不知如何是好。工人和雇主都要求政府予以實力的援助，而政府則徘徊歧途，莫知所止，只好從中加以調解。如調解失敗，其唯一的補助方法，就是去防止任何殺人流血的慘案。

聯邦政府的立法案，也不過只以調解和防止慘案發生自任。但若一個政府要想破釜沉舟，去實行計劃經濟時，則非作進一步的干涉不可。因為工人和雇主如果勢成僵局，則整個的經濟計劃必歸於失敗。有些經濟復興者，的確要想破釜沉舟與雇主為難，但持政掌權的人則不願挺而走險。但若經濟復興政策中的主要「經濟計劃」宣告失敗，那麼所謂經濟復興就無復興的可能了。

今日的計劃經濟，已成了各個政府的當務之急。它們要對於全國的經濟制度，施以社會統制的方策。美國的經濟復興政策，並不是出於羅斯福政府的單獨行動，乃是全國的選民在選舉時早已走上了這種趨勢。他們的心意雖佳，但不願意政府在他們身上施以強制。然而我們曠觀全世界的集產制度，那就不是由於強迫而後成功的。現在要毫無勉強地走上了社會統制之途，那實在是一件辦不到的事。

要想實行計劃經濟，非付以代價不可。蘇俄只因為要實行計劃經濟，才弄得舉國沸騰。雇主和工人之因此受禁錮者，幾於所在都是。

即以莫索里尼的社團經濟而論，雇主和工人雖能夠凡事都直接協商，然而最後的決定權，還是操之於政府之手。一切工人的罷工與雇主的閉廠，都為法律所不許。如雙方找不到妥協之法，政府即出而調解一切。如調解失敗時，則交法庭處理。其最大的統制和強迫的理由就是，如局部的破壞經濟，勢必影響全國的民生。他們認為政府的利益之是否保全，專在乎每個人之是否盡職。所以他們就用法律的強制執行，去處理一切勞工與雇主的糾紛。

德國國社黨的經濟政策的施行，雖然爲日尙淺，然其鋒芒之處，則已畢露。政府的經濟獨裁之權，業已漸漸地加諸雇主和工人之間。一切的工人罷工與雇主的閉廠行爲，皆爲法律所不許。而其最後解決之權，則操諸社會榮譽法庭和勞工信託人之手。究其實際，一切薪金、工作時間、和物價等，都由政府所決定。政府的確有權統制雇主、工人、和消費者。

但在我們的美國，直至今日，雇主和工人的自由行動之風，依然盛行一時。他們拒絕了政府的強制干涉。而執政者也恐怕因強制執行，而引起了嚴重的結果，於是雇主和勞工雙方，便彼此相持不下。工人要努力組織團體，要想脫離雇主的束縛，而自由行動，而雇主却拚命掙扎，要想維持原有的習慣，而挽救瀾於既倒。雙方的爭執既然相持不下，而國民的經濟自然大受犧牲。總統到了萬不得已時才出面調停，設法使之休戰。但雖然暫時息爭，而雙方却依然枕戈待旦，待機而發。

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的勞工計劃，根本加以咒詛；因爲他們並不採用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和戰略。社會主義者也對之大不滿意，認爲這實在是近代經濟制度的一種障礙物。即在政府中也有幾位要人，認爲這樣的政策是不徹底的。但美國的工人聯合會，却不顧一切的批評，要忍耐到底。他們盼望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加增，也或者總有一日能不受政府的統制，而爲工人獲得適當的利益。

但這經濟復興政策，自然也有不少的成功。其最顯著之處，厥爲禁止一切童工和封閉騙人的商店，且立定了集體合同的原則，使工人的生活得到適當的標準。這一切的規定，總必有一日爲各個團體和一切

民衆公認爲最良善之舉。

### 對於農民加以引導呢，還是加以統制呢？

美國的農民受到了兩重的痛苦。一方面債臺高築，不能償還；一方面農產低落，連生活不能維持。在歐戰時代，一蒲式爾 (bushel) 麥子價值兩個金元，一百磅牛肉價值二十金元，地價因之而昂貴異常。而現在每蒲式爾麥子，只售從兩角五分至五角金錢，每百磅牛肉只賣到四塊金洋。因爲農產的低落，有無數的農場都變成了抵押品；因爲貨幣的停滯，有數千家銀行都要倒閉。昔日的自耕農，今竟成爲佃戶了。

農民每歲勤勞之所獲，尙不敷其用。所以非把農場抵押，卽須負債。但他們所必需的貨物，依然非用不可；但錢却無從而來。因爲入款減少，而國稅都不能繳納。有很多的地，只好交回政府當作償稅之用。農民既無力購買貨物，而鄉間的商店自必倒閉。國稅既不能繳納，城鎮的國庫自然一空如洗。雖然聯邦政府對於小學教育加以資助，但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因缺乏現款而關門的鄉村學校，共達二千處之多。

農民激於一時之困，而大感痛苦。歐戰以後，他們的經濟狀況就漸漸的退步。當他們的經濟狀況最好時，因爲用途的浩大，沒有什麼積蓄。一到經濟恐慌時，他們就債臺高築，而入不敷出。當胡佛大總統當政時，他想使農業部收買農民的餘剩物產，以資救濟。然而這一片好心竟弄得民怨沸騰。因爲他收買農產物的原故，以致農產品隨之而增加。農業部既無力繼續收買，農產物卽一落千丈，而更無法維持了。因此就激怒

了人民，即那常常擁護共和黨的北部農業諸邦，也想推翻共和黨，而擁護民主黨了。

經濟復興政策要想救濟農業，非得到農民的合作不可。要想得到農民的合作，必須任用一般很有能幹的人，對於農業部負責。現時在農業部任職的一般人員，對於農業恐慌的原因的觀察，雖不敢說十二分的高明，但也可以說是頗堪嘉許。凡他們所提倡的救濟方案，都是由經驗而來。他們的財能和眼光，較諸前任的人實在好得多了。因此，他們的努力便得到了相當的結果。

農業破產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入款的減少，一方面債務稅率和費用的增高，使所入不敷所出了。所以救濟的唯一方針，就是加增農民的收入，使他們每歲所獲，足以供給衣食，不至變賣財產。

要想復興農民經濟，有幾種重要的副產品，自然應當注意。至所欠的債主之款，也應當設法償還。那久已氣息淹淹的保險公司，必須快快復原。有很多的銀行，因為農場的抵押停滯，以致資本不能流通，也應當趕快設法救濟。如農民的經濟恢復，則其購買能力也必提高；於是工業的銷售量必因此增加，而男女的工人也因此恢復了工作。

蘇俄、意大利和德國的農業救濟方案，是要努力去增加農產品；而在美國的農業救濟方案，却是努力去減低農產品。只因爲農產的需要減低，以致剩餘的農品堆積如山。當歐戰時代，歐洲各國的需要陡增，美國的國外市場，因之大見發達。但歐戰一停，各國的農產品即恢復常態，且較前增加，這對於美國的農業實大爲不利。美國在歐洲各國的顧客，都努力加增國內的生產以求自給，所以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都把麥子

的關稅提高，甚至只就關稅而論，已較芝加哥的麥價爲高。美國自從受了經濟恐慌的影響，穀米在國內的銷售量驟減。只因爲失業的人數日益加增，而一切食物的需要就一落千丈。銷售量既減，農產物的餘額自增，於是人民就不堪聊生了。

農產既無人購買，而價格自不能提高，即著名的經濟學家和久歷商場的營業專家，也束手無策。他們在各方面，要想推銷他們的咖啡、麥子和棉花，但終歸於失敗。於是農業部就放棄了推銷的政策，而努力減低生產量的運動。在一九三三年的種棉農場，約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英畝，而在一九三四年即減去了四分之一。因受了某種的影響，棉價竟得提高了一半。

一九三三年之耕種麥子的田畝，雖然因投機者的鼓動而忽見增加，但至終較經濟恐慌以前減去了一半。在一九三四年，於一百二十萬種麥的農民中，就有一半人數將其田畝減去了百分之十五。藉着這減低生產量的方法，便把農民的收入提高，其結果是很滿意。

只因爲政府加以現款津貼，農民才肯把棉、麥、玉米、煙葉等等的生產量減低。這樣的政策，自然不但使政府耗款，又因物價的提高，使消費者也須多出錢。但一般農民不知降低生產量是於他們有益，很難對於本政策表示諒解。所以要使本政策繼續實現，政府勢必採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否則一般農民一見農產品的價格提高，將必競相耕種；於是產量一多，價格復落，而把銷售之路又堵塞了。

美國救濟農業的當局者，對於這事頗爲重視。他們便請求國會，如獲得農民們三分之二的人數贊同

時，對於原先的議案就可加以修改，並強迫一切農民都要守生產量減低的條例。如遇農民不遵守時，即課以重稅，而使之毫無所得。於是爲了統制棉花的生產量，就有一件議案通過，即對一切非法生產量之增加的收入，科以百分之五十的罰金。（本議案名爲 *Bankhead Law*）

這樣的辦法，是完全給農民以一種自主之權。而所謂藉法律對於農民加以統制者，直至現在尙未有任何效力的發生。於是華勒斯君（Mr. Wallace）對之就大爲不滿。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他在講演中曾加以批評說：

「社會必須藉法規以資維持。對於法規的唯一爭點，就是我們是否要改變法規，和誰有權去改變法規的問題。在一個文明國中，要想得到無上的自由，非受法律的限制不可，否則私心滔滔，社會必至破壞。如大多數的民衆，既已決定了一種法律，則少數的民衆就必須遵從。這就是所謂民主政體。這也就是我們所應當視爲最重要之點。這實在是我們所盼望的社會之永久基礎。」

減低種棉量的法律，如得不到種棉者三分之二的贊助，是不會實行的。在一九三四年，種棉和養豬的農民之對於這種減低生產量的辦法表示贊助者，有一百一十萬人。直到現在，雖然尙無法律上的強制執行，然而經過三分之二的農民的票決，即有強迫的可能。

南部的農民，較諸北部和西部的農民對於本議案更爲負責。中西部的人則依然維持第一年的服從態度，因爲他們看見，只有這樣的辦，才可以加增收入。但也有很多的人，對於這種計劃並不熱烈，也不作永

久的擁護。然而從大體上看來，南部和北部的人差不多都對於這種法案表示好感。

他們的對它表示好感，是自然的事。因為藉着減低生產量和減少借款等，他們全國所省下的款項不下十萬萬金元之多；又因物價的提高，他們的農產的收入又增加了十萬萬多金元。他們藉着取消抵押品取贖的手續，使無數的農場又復歸於農民。因為聯邦政府予以經濟的資助和擔保，農民又省去了不少的利息和費用。農場信用行政部向農民放款，以資救濟；其所放的款項，佔了全美國農民債務的四分之一。在十五個月中，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止，一共放出的債務共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而得到款項的農民約有一，〇五七，〇〇〇之多。

美國的救濟農民政策，與蘇俄的農業革命相較，實有天淵之別。美國的方法是和平的引導，而蘇俄的方法却是當頭棒喝。美國的農民與意大利的農民問題相比，亦不可同年而語。美國的問題是怎樣去減低農產量；而意大利的問題，却是怎樣去補救農民的生產之不足。但兩國的農民行政方略，却都是採取指導的方法，而避免一切強迫的手段。農民的負債，雖在德國和美國弄得民不堪命，但與意大利的小資產農民却無大關係。

國社黨的德國，也在努力加增農產，而使國家足以自給自養。因此德國政府便對於一切農產物的產量加以支配，且壟斷其分配之權。政府作為收買的人，這實在是使農產鞏固的一個善法。在德國並不和美國一樣，無大量的剩餘農產品堆積如山，專待國內和國外的銷售。但它却和美國一樣，由政府出而救濟



農民的債務，且減低其利率。

### 教育為最重要的利器

如美國能夠腳踏實地的，用教育去改革民衆，則美國人民的生活勢必大見改變。因為教育本是一切社會轉變的先聲。由此看來，教育之對於經濟復興政策的重要，實際如指掌了。

美國的教育與蘇俄不同。在蘇俄有很多的民衆是目不識丁的，在美國一字不識的人則寥寥無幾。在美國的一切正式教育，差不多都不在聯邦政府之手。全國的教育是非常的散漫分歧，一點也沒有一種共同目標的趨勢。但美國政府的教育部也不能加以支配。美國的輿論，根本就不贊成像共產黨、法西斯黨以及國社黨那樣的統制教育，它却藉着教育向全國民衆灌輸具體的革命思想。

文字機關本來是造成全國輿論的樞紐，而美國政府對之也沒有加以統制的趨勢。美國的言論界自從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起，對於經濟復興政策就加以不少的攻擊。例如紐約的論壇的先驅（New York Herald Tribune）、芝加哥新聞日報（Chicago Daily News）、禮拜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都對於政府的攻擊不遺餘力。如這些報紙是在蘇俄德國或意大利出版時，不但報館早被封閉，而主筆也早就充軍了。至這種對於政府的肆意攻擊，不只在大城中的機關是如此，即全國各處的出版機關對於政府加以反對者，約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多。據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美國新聞報（United States News）的

記載，全國報界之反對全國工業復興運動的，約有百分之六十五。

在經濟復興政策初施行的數月間，一切的報館主筆都對於羅斯福表示客氣。他們的用意是想給新任總統一個機會，使他得施展其全副的精神，而與經濟的恐慌相搏鬥。那時一般的輿論也都緘口不言。但經過了一年以後，他們就忍耐不住了。於是敵人的軍隊就下了總動員令。在這一一切的批評之中，塔格萬爾的言論，可以說是最煽動聽。他的言論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當着美國的初聞界主筆們開會時發表的。每個主筆都對於這位青年人的言論很表同情。他的言論很長，此處不能詳載，只就其首段看來，亦頗足以見其精神的一斑了。茲錄之如下：

「總統的施政方針，只有藉着各報紙和各雜誌的批評和討論，才能得到修正和實現。我認爲人類總是人類，誰都樂意聽人的讚許，不願受人的譴責，誰都願意得到別人的同情，而不願受人的反對。即以我們現在所已經推行的全國運動而論，也是如此。然而我的確相信，那發自人類天性的政治科學，如拒絕了一切專家之合理的批評，它勢必變成了無價值而且不誠實的東西。大總統的施政方針，既然一切都可以公諸全國，而無不可對人言之處，我就不得不向你們慶祝，因爲你們藉着各文字機關的批評，已引起了全國民衆對於國家大事的注意。我自五體投地，無甚意見可以發表，但我尚有一件事是認爲遺憾的，就是你們的批評未免太晚了；如當着這種經濟復興政策正在國會中醞釀，或初次施諸實行時即加以批評，那就最好了。因爲在那個時候，政府對於你們的批評和建議是很容易收納的。但時至今日，一切的批評皆成了亡

羊補牢之舉如說和全國經濟復興運動合作，實已太晚了。」

這樣的批評如狂潮般的湧來，實在使執政者有些心煩意亂。似乎爲保持行政的便利起見，應當施以法律的禁止。羅斯福大總統認爲，憲法的第一次修正案所給予的保護權，業已足夠了。而芝加哥的新聞日報就在社論上大肆其攻擊說：「在光天化日之下，報界自有全權對於任何問題發表自由的言論。如政府想加以限制，本報決不承認。」

有幾位長官的屬員，按照着政府的規章，就不隨便把政府的事情告訴新聞記者。於是一般新聞訪員，就認爲是政府對於新聞界施以壓制，而大爲不滿。當言論洶洶之時，羅總統便把報紙上所辯論的幾個要點寫出來，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全國主筆的聯合會中宣讀說：「所謂言論的自由，就是發表意見的自由。無論在新聞欄或社論欄中，都有自由發表之權。在華盛頓的聯邦政府，現在還沒有禁止言論自由的趨勢，卽以後恐也沒有這種傾向。」

全國的言論自然對政府加以批評，而政府也有權從事辯護。凡政府的一言一動，都爲全國人所共知。一時的言論，除了在報紙上大加討論以外，廣播無線電臺以及種種的宣傳機關，也都窮於應付。如在共產黨的蘇俄或國社黨的德國，則恐有發生暴動之慮。但在美國則引不起人們的爭鬥之心。兩相比較，足見美國民衆的反應力很覺薄弱。

羅大總統對於保護經濟復興政策之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藉着廣播無線電臺向全國播音。但這種廣

播電臺，在獨裁的國家爲政府所獨佔，而在美國則爲人民所共有。在獨裁的國家，人民只有聽取政府報告之權，但在美國人民則有自由選擇之利。

那些創造獨裁政體的人，要對於教育絕對施以統制，而使全國的青年祇有一種思想。只因爲要使後起青年人的思想統一起見，蘇俄、德國和意大利不但對於學校施以統制，甚至把家庭、教會和一切的機關也都拉在獨裁的範圍以內，而使一切青年完全受了他們的黨義的訓練。

在蘇俄的共產青年組織，遍於全國。他們要使一切兒童和非共產黨的家庭脫離關係。他們的成功是很有可觀。除共黨的青年組織外，不准有任何的青年團體存在。凡在十八歲以下的兒童，絕對不許教會加以組織和訓練。至在意大利的青年團體，也完全在法西斯黨的統制之下。

在德國的希特勒青年運動，要把日耳曼血統的青年一網打盡。國社黨便勇往直前，費盡了種種的心機。德國的新教徒的青年組織，雖尙未解散，然兒童在學校中的時間，差不多完全爲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所佔有，更無餘力再顧及自己的團體工作了。至天主教和國社黨的糾紛問題，至今依然勢成騎虎將來如何解決，現在還不得而知。

但在美國的青年團體——例如童子軍、男女青年會、天主教團體、愛普務德會（Epworth League）和基督徒奮興會等等——則除了應付例行公事以外，無人特別對於經濟復興運動加以注意。這種在宣傳方面的散漫現象，是遍於全國，一般機關實在應當負起教育和指導之責，而使全國生活趨向一定的方針。

這經濟復興政策在教育民衆方面，並沒有經過什麼努力。它不但不能教育民衆，反而和民衆互相爭吵。這實在不是一種長治久安之計。

美國的民衆，實在應當重新施以教育。凡一切資本主義的信徒必須知道，這種資本制度如不改變，那就走不通了。昔日的資本主義的制度，已成了過時的東西。這已成了美國多數民衆所共認的事實，也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趨勢。凡在資本主義中的知識分子，必須知道這種趨勢已成了燃眉之急。以先覺覺後覺，實在是今日的急務了。下面的一段文字，的確是美國商會所不樂於聽取的：

「我們現在的經濟痛苦，是否能夠促進了我們那社會的進步，端在乎美國一般經濟界領袖的態度如何。近代的新人道主義與新經濟的趨勢，都是人類良心的自然產物，如美國的經濟巨子肯立刻覺悟而急起直追，我們的社會必因此而得到進步。總而言之，改進我們社會的基本條件，就是資本家要減低盈餘而使工人和消費者多有所獲；勞資雙方對於紅利應當有均分之權；失業準備金、疾病救濟和老年卹金等等的制度，必須普及全國。國家的盛衰，全視人民的強弱而定。如建設一種好的制度，而把全國民衆的生活提高，整個的社會必因之而大見進步。美國本是地廣物博，再加以科學發明機器精良，其出產之多，自不言而論，資本家應當把營業之所獲，均分於社會。須知今日美國之唯一合理的經濟制度，就是要為全國民衆謀利益。」（錄自Frederick M. Daveenport, Washington, May 3, 1934.）

那些反對資本主義，而走向過激之途的人們，應當知道要想把整個的社會制度完全一脚踢翻，是不

對的。須知道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很多的民衆都是擁有財產的人，而一般無產的人，也想努力有所積蓄。而且拿我們今日的生活程度，與昔日的生活程度相比，實大見進步。『我們的工業供給了很多的民衆，而其出產之豐，爲前所未有；且勞力少而收穫多，這都是空前的事情。』（錄自Industrial Discipline 第一三六頁）況由我們的民族的性情而論，必不肯把今日的一切社會的生產組織破壞，因爲即在這一九三四年的恐慌之秋，我們的生活依然較爲舒適。

那些過於崇拜自由的人，也當對於自己稍加約束。他們實在是過於小心了。他們一聽見國家對於民衆加以干涉的呼聲，就如同大難臨頭。其實在今日的經濟復興運動下的美國，與蘇俄、德國和意大利相比，其所得到的自由，實在是很豐富的。

至於美國那些資產階級的人們，也應當深自警覺。不要紙上談兵，要絕對的遵守原則，和腳踏實地的切實去作，否則恐終脫不了蘇俄、德國和意大利的專制覆轍。關於這一點，威斯康新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校長，曾發了一篇很正確的言論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絕對的過激主義和盲目的保守者，都是不能加以容忍的。近來有多少的國家，都是把社會弄得分崩離析；我們既有前車之鑒，自不當再作後車之覆。我們必須應用冷靜的頭腦和建設的眼光，去觀察一切。我們切不可爲舊日的習慣和急進的學說所蒙蔽。』

這最後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是否要去學習那犧牲的智慧。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美

國人的道德，實在是一落千丈。有人請一位門第很好的高中學生，把他所理想的社會寫成一篇文章。在他的文章中充滿了權利和自私的言語，而通篇竟無隻字提到本分和服務的事。這篇文章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態度的代表。這就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於資本社會加以攻擊的要點。

於是我們就得到了以下的結論：美國的民衆如果不自動地對於自己施訓練和負起責任，來對於羣衆謀利益，則將來必有一種暴動的政黨要興起，強迫全國不得走向社會利益之途。二者不可得兼，美國必須選擇其一。美國的農業部長華勒斯（Henry A. Wallace）曾發表以下的言論：

「只有完全公平正直，而把國民經濟分配於全國各種階級的民衆中，才知道那真正的富裕是什麼。我們只有努力使一切的民衆，無論是居城和居鄉，都能足衣足食，那我們就算成功了。於是我們就可在光天化日之下，俯仰無愧。然而我們若耍貫徹始終，却非空虛的夢想所能辦到。我們必須要下決心，去犧牲到底。因為我們一和那困難的環境宣戰時，就往往畏難苟安，得過且過，並走上自暴自棄的道路。但我們現在却不可再作虛空的幻想，要把握住自己和環境。」

一切教育的機關，是負着何等偉大的使命的。藉着它們，便能夠把全國的思想和意志統一起來。這些機關就是小學、大學、種種的學校，教會及其附設的機關，男女的俱樂部，工人聯合會與商會，出版、電影、播音，與戲院，以及那最後而最重要的家庭。如經濟復興主義者能利用這些機關，而作大規模的宣傳，則其收效殊未可限量。

## 政府與家庭

美國的經濟復興政策，對於家庭努力加以扶助。它用大筆的款項，去救濟家庭的困難。雖所費頗大，然在美國却是創舉。經濟的恐慌日益加重，而家庭的破產日甚一日，如政府不再加以救濟，恐民衆的道德愈趨愈下了。

自羅斯福總統掌政，女子在政治上的地位大爲提高。在經濟復興運動中的政治地位頗高的婦女，約有三人。有一位充任內閣閣員，有一位充任公使，而其餘的一位爲造幣廠的指導。這不但與莫索里尼的蔑視婦女態度大不相同，且與希特勒的婦女政策亦有天淵之別。在蘇俄雖然大倡婦女解放運動，而其婦女之能如美國婦女身任閣員者，尙不多觀。

政府又對於扶助青年的工作加以努力。有大量的款項支出，專爲救濟學校之用。全國之新校舍的建築費，就有一半是從政府的公共建築部支出。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建築校舍的費用約有二萬萬金元之多。除此而外，政府復爲大學生籌備了不少的求學津貼。藉這津貼而能繼續讀書的學生，約有七萬五千之多。政府又設立民衆收容營（Civilian Conservation Camps），專收容二十五歲以下的失業青年。刻已有八十五萬男子在該營中，其薪金爲每天金洋一元。本款約有六分之五是作爲養家費，而其餘的小部分作爲本人的零用。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在森林方面。他們的這種戶外工作，對於他們的健康大有補助。這種



辦法，使多少的失業青年不致流離失所。自本營開辦以來，在十八個月中已用去四萬四千三百萬金元。

然而在美國民衆失業的人數頗爲衆多，只此尙談不到救濟。所以政府就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召集了一個會議，去討論這以下的情形：『美國在二十五歲與十六歲之間的青年，約有二千萬人之多。在中學肄業者，約有二百萬，在大學肄業者，約有一百萬。在民衆收容營者，約有二十五萬。除此而外，尙有一千六百五十萬，還不曾找到寄身之所。大概有很多的人總是在失業的掙扎中。』

他們職業的問題既一時解決不了，政府就只好設法使他們繼續讀書，同時注意他們品格的訓練，以免流入歧途。有一位大學學生，向他那畢業班的同學臨別贈言說：『我們走到社會之中，而社會却不用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實在是危機四伏。因爲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乃是一國的精英，如英雄無用武之地，再加上饑寒的逼迫，勢必挺而走險，而趨於革命之途。歐戰後德國的大學畢業生，只因爲無事可作，才振臂而呼，加入了國社黨的革命。

二十世紀革命的爆發，都是由於一般人找不到出路所致。蘇俄的工人因無出路，才附和共黨領袖，而舉行暴動。法西斯的青年因欲尋求出路，才作了莫索里尼的戰士。羅斯福總統的經濟復興政策是否成功，端看他能否拯救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

## 對於社會保護政策要急起直追

在美國政府有組織的社會保護機關不但發展的很慢，而且毫無系統。聯邦政府在過去的時代，並未對之加以注意。有幾個州政府對於工人的意外危險和疾病等，有保險的設備。也有幾個州政府對於老年和母親的卹金有相當的補助。只有一個州政府有一點救濟失業的傾向。總而言之，美國在社會保護政策方面，與德國和新西蘭相比，實大見落伍。嗣後英國也跑到美國的前面去，而最近的蘇俄更使我們望塵莫及了。

美國在社會保護方面落後的原因，是不一而足。就其榮華大者而言，約有以下數端：(一)美國地大物博，工人生活頗為富裕；(二)一切實業家對於工人的待遇頗好；(三)有很多的私人團體，例如宗教團體、紅十字會、免費醫院、孤兒院、和救貧院等等，都能減少許多民衆的痛苦；(四)有很多的私人營業機關，是設有保護工人的組織，而工人和雇主的感情頗為融洽。

美國的社會主義的發生，也較其他的幾個國家為晚。但現在的一般民衆已對之漸漸的加以注意。所以這經濟復興的政策，已對社會保護工作早有計劃。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勞工司司長曾作一次播音的演講。她說現在的社會救濟經費，已成了空前之舉。她又指出了以下的事實，請全國人共同努力，施以救濟。

以全國的工業而論，每歲就有二萬五千人死在機器之下。有十五萬人受了永遠的傷，而暫時受輕傷者，竟有三百萬人。如再將工業以外的意外危險算入，則其傷亡的人數，將較諸工業的傷亡之數多上三倍。

差不多佔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再以超過六十五歲而不能自給衣食的男女而論，也有六百五十萬之多。

在經濟復興運動之下，救濟政策業已草定。關於工人的住處問題，羅總統曾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國會中演講說：『我們有很多的房屋都已經太舊了，不宜於人類居住，應當加以修理，使之適合於近代社會的居所。為人民的健康和安着想，也應當快快設法改良。』

在近代的趨勢之中，工業商業之集中於城市的傾向，業已過時了。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對於城市的過於擁擠，加以反對。蘇俄於一九三二年，使數百萬民衆離開了城市，而美國對於城市工人的房屋自然加以改善，而對於鄉村農民生活的改良則更加以注意，以便使城市和鄉村的人口得到平均的發展。所以政府就決定為一般無地可耕的農民購地安家。

按照政府的計劃，要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在三十州中買到二百五十萬英畝之地。按照統計的數目，需要救濟的農家，約自七十五萬至一百萬之多。政府想把田地買來，好使這些人移去耕種。在本項下，政府第一次所發出的款，為二千五百萬金元。約至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便可買到一百萬英畝，而每畝的價格約為五元。在這二千五百萬款項中，要想用四五百萬元作為公園、林場、和遊戲場的建築經費。

### 宗教的前線平靜無事

在美國的經濟復興運動下的宗教地位，較之在德意蘇俄的獨裁下的宗教情形，可以說是安適得多了。宗教在共黨的政策中，毫無地位之可言。共產黨要用各種的手段，把宗教置之於死地。莫索里尼認為宗教的確有相當的功用，不過非把它活動的範圍限定不可。希特勒對於宗教的態度，雖與莫氏大同小異，但他的跟從者却直接對於宗教的教訓和行政加以干涉。

以德意美和蘇聯的四個政治領袖而論，他們的宗教信仰亦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母親，想使他從事祭司的職務，但他却非常的反對，而至終成了個無神主義者。莫索里尼在他的自傳中，承認他是一個信仰很深刻的天主教徒。但按其外表的行爲而論，却不合乎教會的體統。希特勒亦出身於天主教的家庭。從他的言論中，看出他是一位有神論者。他和宗教中人亦有很多的來往。不過他的信仰是以他自己的經驗為基礎，而與教會的主張不合。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是聖公會的教區委員。他很有守禮拜的習慣。當他在海軍船上的時候，他親自主領禮拜事宜。

蘇俄的教會自然和共產黨是勢不兩立。意大利的天主教，則對於法西斯黨無甚意見。至德國的教會和國社黨，則正在糾紛之中。當羅斯福總統競選時，教會對於他的幫忙很多。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都對於他加以扶助。他在地特力脫（Detroit）曾作了一次競選的演講，聲明他在社會的、經濟的、和工業的種種立場上，是和全國的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猶太教的立場相同。

教會對於羅斯福總統的經濟復興政策亦頗贊助。有幾位關員，也在教會中很活動。蘇總統同他的關員也

很樂意和教會合作。對於國內問題，教會自與政府無甚異議。然對於國際問題，教會就與政府有不同之處；因為教會是看世界各國都是兄弟。教會對於政府的大海軍政策很不贊成，因為教會是主張軍縮主義的。教會對於政府的不加入海牙國際法庭，亦不滿意。教會主張美國的殖民法不該優待白種人，而限制有色種人；政府應當一視同仁，而一律平等。然而美國的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都是各自為政，彼此不相干涉的。故永無什麼糾紛發生。

### 又走向了國家主義之途

經濟復興政策的國家主義色彩與法西斯黨和國社黨相較，實相去太遠。然它的確走向了國家主義方面去了。即以武備而論，它也要和世界爭霸，大有「唯我獨尊」之概。

經濟復興的運動，實和威爾遜的世界主義，大有背道而馳之勢。即以一九三三年在倫敦所開的世界經濟會議而論，美國的國家主義色彩，已成了空前的特點。於是這會議便受了國家經濟主義的打擊，毫無結果而散。

政府對於戰債的問題，依然是把國家主義的色彩表現得十足，但這次却是不聰明了。其結果是我們既未得到戰債的賠償，也未達到什麼解決的辦法。凡一切有學問的人，都認為戰債的數目未免太大了，求其償還，實非易事。但事實雖然如此，如有政黨起而提議，則其他政黨勢必立即反對。其結果是非徒無益，反

而有害。

美國由於政治的和經濟的國家主義的主使才要放棄斐律賓羣島。其放棄的動因並不是真正要使斐律賓獨立，乃是要想藉獨立之名，而把斐律賓的土產從美國市場中驅逐出去。因為在斐律賓所產的糖和脂油等，輸入美國銷售的數量很大。如不驅之出境，必於美國的土產不利。

羅斯福大總統曾公開的說：「我們要坦白的承認，在任何事上，必須把我們國民的利益放在前面。」這實在是羅大總統掌政的中心原則。再看他的就職宣言，就可知道他的講演的一斑了。

「我們的國際貿易政策雖然是重要，但以今日的時局而論，却成了次要的；因為我們的第一要務，就是快快將國民經濟建設起來。我認為去從事當務之急，乃是最實際的政策。我對於國際經濟恐慌的危局，固然是十二分的注意；但如國內的恐慌沒法救濟，我就無暇顧及國際了。」

美國的大海軍主義，也是國家主義的一種表現。美國政府的負責人曾正式的聲明，要在兩年內加增四萬一千四百萬金元的軍備。這樣的龐大數目，早已成了世界第一。任你口齒如何流利，而向歐洲和遠東講論什麼和平主義，他們必不肯置之一信。我們的經濟復興的國家主義，雖沒有像法西斯黨和國社黨那樣的狂熱，雖沒有像蘇俄那樣的戰戰兢兢，如大戰臨頭，雖沒有在城市中實施防空的訓練，雖然沒有訓練兒童軍事化，然其同為國家主義，則毫無問題。我們的國家主義，是完全由於國內的恐慌而來。

這並不是羅大總統經濟復興政策的一種什麼新發明的政治思想，它乃是戰後一種普遍的國家

主義的經濟政策的產兒。所以華爾忒李浦曼 (Walter Lippmann) 說：「這種國家主義業已把威爾遜的國際合作原則趕跑了。」雷門富斯迪 (Raymond Fosdick) 也曾說：「國聯之整個的基礎，現在已發生了動搖；於是不數年後，那國聯的國際主義，勢必和舊的國家主義彼此相角逐。」

### 委曲求全的外交政策

在經濟復興運動下的外交政策整個的表現出一種國家主義的面孔來。它並沒有什麼革命的色彩，不過把舊的外交政策胡亂拉動一下吧了。美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從來就以委曲求全為能事。政黨雖然變遷，而政策則依然如舊；自來就沒有有一個政黨有具體的主張。這樣一來，適足以把世界列強鬧得頭暈眼花，而不知道美國到底要玩那套把戲。

美國的新舊外交政策，都是充滿了自相矛盾的現象。即以對美洲的拉丁民族的國家而論，也是胡秦、莫衷一是。今日講互惠主義，明天講干涉政策，而後天又置之不理了。直到現在，美國依然是玩這一套把戲。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羅斯福總統曾作了以下一段迎合他那些拉丁親眷們的講演：

「以我們美洲的各國而論，當務之急，是先去解決自己國內的秩序和法制的問題。如因一個國家的問題不能解決，而影響到別國時，則各國就不得不關心了。因為我們既然是鄰邦，動輒彼此相關，所以一國的糾紛擴大，就成了全美洲的問題了。」

威爾遜始終爲國際主義而奮鬥，他終於因此而犧牲了性命。美國的決定不加入國聯之行動，其聰明與否，姑置之不論；但無論如何，其上下兩議院的不能合作，已在世界各國失掉了威信。現在民主黨的領袖，已成了我們全國的行政元首，對於國聯會發表意見說：『我們是要與之合作……但合作的範圍，是只限於那些不帶有政治色彩的事件，和爲全世界民衆謀利益的問題；凡一切政治領袖的作用，代表某種階級的利益，以及雜有帝國主義者，本國一概拒絕合作。』

不但威爾遜在國際上失掉了信用，即羅斯福大總統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他在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經濟會議中，實失掉了個人的信用。爲局部的交換意見起見，羅總統曾請各國的重要代表至白宮，彼此歡敘。在一九三三年的五月七日，他又在播音電臺上演講，在他講詞中的第三個題目就是：『要鞏固世界的幣制，而使各國的物產和貨物再彼此流通。』在本月之中，他又努力的聲明說：『在經濟會議中，應當把世界幣制建立鞏固，而把目前的紊亂狀態除去，使之走上軌道。』但不數月以後，當世界經濟會議正在倫敦開會時，美國政府竟正式的通知說，凡世界共同的幣制穩固政策，美國一概拒絕參加。這實在給予該會議以一個重大的打擊。於是世界各國就對於美國大加諷刺。

美國與國際間的幾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貿易、戰債和軍縮。關於國際貿易問題，雖不住的談判，但毫無結果。而戰債的情形，則較前尤爲惡劣。至於軍縮，雖有修正的議案提出，却不能通過。美國雖在軍縮中有很多的提議，但都成了紙上談兵。只有對於蘇俄的承認，實在可以說是本政府的一種勇敢行爲。然因此而引



起的糾紛，也不在少數。即以美國人在蘇俄的宗教活動和自由而論，除了舉行禮拜儀式而外，其他的依然未曾達到目的。差不多蘇俄對美國恢復邦交的大用意，就是在阻止日本侵略西伯利亞的邊境。

總而言之，美國的經濟復興與外交政策，還是一套舊的把戲。甚至重新回到首任大總統華盛頓的孤立政策中，而與威爾遜的國際主義實覺風馬牛不相及了。經濟復興與外交政策只想委曲求全，而對於世界革命的思想從來就沒有夢想到。他們只求囿於一隅，而限在美國的國境中，就心滿意足了。然而美國的經濟恐慌，却與世界經濟有連帶的關係。如不想在國際方面有所努力，而只求偏安一隅，恐國內恐慌亦不易解決。

(完)

# 青年叢書第一集目錄

第一種	甘地自傳	吳耀宗譯	實價七角
第二種	海倫凱勒自傳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三種	中國青年職業問題	何清儻著	實價四角
第四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三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五種	宗教經驗談	徐寶謙編	實價四角
第六種	性的教育	潘光旦譯	實價七角
第七種	科學偉人的故事	張止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八種	一個偉大的運動	普體德編著	實價二角五分
第九種	實驗宗教學教程	曾寶霖編譯	實價二角五分
第十種	社會福音	吳耀宗著	實價七角
第十一種	時代轉變中的上帝觀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十二種	今日之蘇俄	沈秋濱譯	實價九角
第十三種	性的道德	潘光旦譯	實價六角
第十四種	蘇俄公民訓練	鄭某彥編譯	實價七角
第十五種	我所體驗的基督	王攪生譯	實價七角
第十六種	社會主義新史	沈嗣莊編著	實價八角
第十七種	改造中的蘇俄	楊丹葆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八種	蠻荒創業記	沈嗣莊譯	實價六角
第十九種	反利潤制度	張止章譯	實價一元
第二十種	穆德傳	張止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二十一種	宗教與人格	康文淵編著	實價七角
第二十二種	耶穌傳	趙紫宸著	實價七角
第二十三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四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二十四種	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	楊繼譯	實價六角

- 第五種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
- 第六種 科學的宗教觀
- 第七種 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觀
- 第八種 近代科學與宗教思想
- 第九種 農村工作經驗談
- 第十種 世界名人小傳
- 第一種 心理與生活
- 第二種 創造的人生
- 第三種 第二次大戰與中國
- 第四種 思想的探險
- 第五種 創造的社會
- 第六種 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
- 第七種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楊 續 實價六角  
 吳 耀宗 實價四角  
 張 仕章 實價六角  
 應 遠濤 實價五角  
 徐 寶謙 實價四角  
 子 熙 實價五角五分  
 華 丁夷 實價五角  
 何 照東 實價四角  
 章 乃器 實價三角  
 艾 迪 實價七角五分  
 張 仕章 實價四角五分  
 應 遠濤 實價四角五分  
 吳 雷川 實價九角

- 第八種 瑪薩里克自述
- 第九種 世界偉人的宗教信仰
- 第十種 基督教與階級鬭爭
- 第一種 忠的哲學
- 第二種 性生活的控制
- 第三種 祈禱的科學
- 第四種 基督教史略
- 第五種 時代的末期
- 第六種 社會生活的發展與訓練
- 第七種 未來的文明
- 第八種 耶穌的思想及其背景
- 第九種 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 第十種 現代潮流中的上帝觀

何 子恆 實價六角  
 姚 賢 實價六角  
 王 一鵬 實價四角  
 楊 續 實價六角  
 子 熙 實價五角  
 陳 茂才 實價三角五分  
 鄭 中 實價五角五分  
 白 石 實價四角五分  
 楊 續 實價六角  
 華 丁夷 實價四角  
 辛 可維 實價三角五分  
 張 仕章 實價四角  
 應 遠濤 實價四角五分

所

版

種一第集二第書叢年青

潮主大四的命革

有

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原 著 者 考 爾 登

節 譯 者 馬 鴻 綱

校 閱 者 青 年 協 會 編 輯 部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二號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1

**Four Patterns of Revolution**

By

Ethan Colton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 60 Cents

Postage Extra

June, 1937

